

輯十第書叢論公

10

民于對落陷市城  
鄉音影的濟經族

# 紀念「七七」抗戰二周年

白石

二年來的抗戰，已經證明我政府持久抗戰的國策，絕對正確。從中日戰爭的各方面——軍事，政治，經濟——的對比上看來，在這敵我相持局面的第二期中，已顯示了我國各方面的優勢；即在軍事上，也已由日方的主動，逐漸轉變為我國的主動了。抗戰的總形勢，確已展開了光明勝利的前途：

A. 軍事方面，日本的華南進攻已經不能再進展一步。鄂中戰爭日軍雖然渡過漢水佔領了潛江，但日軍的連絡綫，已被我軍各個截斷，成爲各個包圍的形勢。而日軍在鄂中戰役的消耗，已在二萬人以上。山西方面日軍發動東南北三路進攻，南路一時曾佔相當優勢，但至今又慘遭失敗。而中條山一役，幾乎喪師殆盡。至於各淪陷區的我們的游擊戰，不特顯出空前的活躍，且能與正規軍起機動性的聯絡和呼應。（可參考何部長的報告，美聯社重慶十三日電）即就四五兩月日軍陣亡者的數目來說，已達十萬五千七百三十七名和二年來日軍死亡八十餘萬的總數相比較，已可見我軍作戰力的增強，與日軍作戰力的減退。

B. 政治方面：中國的抗戰國策，更爲堅定。全國的各黨各派，也更爲團結。下令通緝汪精衛，這便是杜絕一切和平陰

謀與謠言的表示。實施國民精神總動員，也便是國內團結一致的更進一步的表示。而在日本，由於中國的堅強抗戰，法西軍閥與政黨間的對立與矛盾，在對德意軍事同盟上，更表面化起來。致使法西斯軍閥不得不向外蒙挑釁以造成自己一派的加入德意軍事同盟的主張的優勢。同時又不得不在中國揚起反英運動，封鎖鼓浪嶼與天津租界，排除各國在華利益，以求與日本財閥的合作。但正如日本某作家所說，由於日本的傷兵的復員，在日本國內已揭起了廣大的反戰運動。日本國內的政治裂痕，雖然還沒有到爆發的時候，但已有了爆發的基礎。

C. 經濟方面：我們的孔院長有明白的指示：

「我們最大的成功，莫如貨幣戰爭的勝利，自去年三月間，日人在華北成立『偽聯合準備銀行』發行偽票，企圖奪取我外匯基金，破壞我法幣的信用，我為防止日人的奸計起見，實行管理外匯，一年餘來，成績大著。日人見所謀不遂，乃更用種種手段，破壞我法幣政策。始則在其佔領區域內壓抑我法幣的價格，日來便索性禁止我法幣在市面上流通。殊不知我法幣準備充足，信用卓著，最近我外匯比率加以調整後，日人更無所使其技倆了。其次日人在經濟方面所潛伏的危機，第一是國內生產停滯，第二是人民痛苦增加，由於軍需工業的無限制膨脹，所有國內的資本勞力均被吸收，而以原料輸入減少，普通工業的生產量大為削減，因之出口貿易蒙受極惡劣的影響。至於農業生產，向來就很貧乏。現在更是江河日下。去年度所有稻米蠶繭等生產，均大為減少。至日本人民痛苦增加的原因，多由於負擔加重，與物價飛漲所致。據可靠估計，日人在最初一年半的侵華戰爭中，已實際耗去軍費一百十九億九千餘萬元。這一筆龐大的軍費，無論日本財政家如何妙思應用，其結果總須由日本人民身上搾取。以數千萬人口的小國，每年負擔如此巨額戰費，其人民寧不痛苦？加以生產減低，幣值低落，日常生活必需品價格飛漲，遂至終歲勞碌，不得溫飽，因之反戰運動，潛伏滋長，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我們相信，孔院長這一估計是絕對正確的，祇要看上海的日幣跌價已經可以證明了。

但在這第二期抗戰中，日本的新進攻的新政策是什麼呢？那就是以近衛聲明為根據的「建立東亞新秩序」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的本質意義，就是日本在第二期戰爭中，由於前方的軍事的失敗，想從鞏固其佔領區域轉來充實他軍事力量的一種陰謀。在這一陰謀下，他一方面製造傀儡，一方面首先掀起反英運動，直接間接排除各國在華利益。汪精衛便是在這一陰謀下被製造的頭等傀儡。他躲在侵略者反共烟幕的後面，分散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他以上海為根據，組織所謂「中國國民黨救國特工總指揮部」。他又收買若干文化人，出版「無關於抗戰」的文藝雜誌，和作為他們收羅的青年的某某刊物。他還派丁某以三十萬元錢收買上海幾家抗日報紙的外國發行人。上海文化界從五月以來遭到二年來未有的挫折，這便是傀儡汪精衛承奉他主子命令出來搗亂的結果。我們知道反汪便是反對「和平」堅持長期抗戰國策，而上海是汪精衛的活動的中心，我們為確保二年來抗戰中所爭取的勝利的基礎，並使之發展，必須以反汪工作為我們的中心工作之一。

在反汪工作中，我們必須首先杜絕「和平」幻想。汪精衛在其最近發表的「抗戰之真相」一文中，竟將他屈辱投降的「和平」與憲法中「講和之大權畀予政府」及中山先生所標榜的「忠孝信義和平仁愛」八德中的「和平」相提並論，這顯然是有意歪曲，淆亂聽聞。和平之對待名詞，便是侵略。中國的抗戰，是反侵略戰爭。反對侵略才是保障真正的和平。和平決不是屈辱求降所能求得的。和平祇有從艱苦的奮鬥中爭取得來的。日本侵略中國，已有三十餘

年的歷史，政府每和他講和一次，即每損失一次廣大的利益和土地。日本在沒有以革命來否定它那帝國主義的本質以前，被侵略的中國，是決沒有可能與他講和的，講和是使日本帝國主義得到喘息的機會，準備將來得再來一次新屠殺。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的道路，必須以中國為它獨佔的市場——即整個滅亡中國。但新中國發展的道路，在今天必須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脫却半殖民地的地位。而堅持抗戰正是我們推毀日本帝國主義，使其內部發生革命，成為一個日本真正人民大眾的國家。同時，又是我國奠定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建設基礎的必經的路。一切和平的幻想，那不過怯於鬥爭，甘為人奴的沒出息的想頭，我們必須予以斷然的打擊。

#### 四

同樣，在反汪的工作中，我們必須校正所謂「共同防共」或反共的觀點。這裏，我們重新提出蔣委員長在答復近衛聲明中的談話「反共即是滅亡中國。」蔣委員長說：「所謂共同防共，是要中國和他締結防共協定，是要在華北駐兵，劃內蒙為防共特別區。——我們可以說日本不過以防共的名義，首先控制我國的軍事，進而控制我國政治文化以至外交。——世上一般輿論，或者以為日本之所謂防共其意義在防蘇俄，實際日本所謂締結協定，目的不在防共，也不在防俄，而實在借此名義以亡華。」而且如其澈底瞭解共產黨所崇奉的馬克思主義來說，他們也不主張在半殖民地的中國的今天來實行無產階級的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文章中，我們非常明顯的可以看到中國今天革命的任務：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正如中山先生要在這一革命過程中，不使中國走上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路，因而引起社會革命，提出了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及「容共」的各種政策的用意一樣：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存在正是幫助這一革命任務的完成的。祇有孫中山先生的叛徒汪精衛在今天會提出反共的口號。而且他們以非常簡單的公式，將一切

極於抗戰的民族英雄，都加以共黨的頭銜。在各黨各派各階層聯合抗戰的今天，對於這種誣蔑，是應該用更積極的行動來打擊他的，同時對今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有懷疑與不理解的，也必須予以嚴格的校正和說服。

## 五

但同時由於日本的進攻的力量銳減，反映在我們的隊伍裏的還有速勝論的觀點的抬頭。我們分析速勝論的觀點，是向二方面發展。其一是，以為目前我們的力量，已經足以制勝日本，於是不想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力求進步，甚至對於民衆運動有加以限制的表現，對於派別的成見，還是不能作澈底的肅清。這一現象的發展，將會落入於單純的軍事抗戰的泥沼裏。我們的最高領袖非常英明地看到了這一點，一方面號召全國民衆，廣大地推行國民精神總動員。一方面下令各級黨部絕對禁止派別小組織。這是對於速勝論者是個積極的校正。其二是在速勝論者以為日本已消失了進攻的力量，甚至忽略了它在「建立東亞新秩序」的號召下，準備將來的進攻的這一企圖，把中日的戰爭看作不久可以結束。將中日戰爭最後勝利的界限，放在恢復「七七」以前的形勢這一目標上。依然無意地做了汪逆的應聲蟲。我們要打破這種速勝論的觀念，必須提出一個積極的口號：「打到鴨綠江邊去！」

## 六

我們為爭取抗戰勝利的迅速到來，必須展開上海的國際反侵略陣綫。上海租界的存在，在今天已成爲日本帝國主義進攻江南游擊隊伍，肅清抗日勢力的障礙物，因之，在我們却成爲保障江南游擊戰與打擊日本帝國主義的壁壘。租界的民主國家的中立立場，在其本質上是反侵略的，即在國際的反日本獨佔侵略的任務裏，上海租界的各國利益，

是和中國人民的利益有共同之處。日本帝國主義在今天首先揭起了反英的旗幟，那企圖是想孤立英國，分離英法，以使各個擊破。綏昌事件與天津英租界之被封鎖及其表現，便是極好的例。因之，我們必須喚起上海的民衆注意，日本帝國主義的反英運動，正是削弱我們國際援助，打擊我們抗戰力量的一種新進攻。在我們一切宣傳上，一切工作的佈置上，必須力求與租界當局合作，並用極大的力量來促進上海國際反侵略陣綫的結成。

## 七

由於上海環境的特殊，我們爲配合政府長期抗戰的國策，必須遵守我們工作的最高原則：「積蓄我們的力量。」在這抗戰二週年紀念中，我們的紀念方式，應力避不必要的形式，以實際工作來作紀念。在這裏，我們應在今天起，展開如下的工作：

A. 加緊團結，爭取最後勝利。從大體上看來，我們的團結的範圍是擴大了，但團結的精神還不够加緊。在任何問題上，我們中間，往往還有人不能從原則上來加以考慮與安排，個人的權利觀念派別的狹小成見，還無法完全打破，因之問題往往停留在人事的糾紛上，使工作無法開展。爲要加緊團結，我們必須養成大公無私，忠誠、坦白，敢作敢爲的精神。不論相互間個別意見上略有出入，祇要忠於抗戰勇於抗戰，都是我們一條戰線上的同志。

B. 勵行節約，保障生活。自從去年七七以來，上海廣大地展開了節約運動。但這一節約運動的主要目的，在於獻金國家，增強國庫。今天上海的環境已經有了顯然的變化，物價高漲到駭人的程度，上海的市民必須切實的節約自己生活上不必要的享用，一點一滴的儲藏起來，準備不時之需。而且上海的貨物，一半以上是用外匯購買來的，我們少買一份用外匯購買來的貨物，就保障外匯少流出一份，同時，也就使政府的經濟力量增多一份。我們今天的節約運動，必須

向保障生活節制外匯的這兩大目標進行。自然，在這裏我們還須喚起上海工商實業界以及租界當局注意：必須立即起來設法平衡物價房租，改善薪給階級及員工們的生活。

C. 用團結力量社會輿論壓制奸商。上海在今天削弱國力的最大禍患，便是奸商，他們或者為私人利益，或者奉主子命令，提出種種方法推銷劣貨，並收買銅元造成市上輔幣不足的不安現象。而更其老奸巨滑的，還為日本組織偽魚市場等等，統制內地來貨。這同樣是叛徒行動。但我們對待奸商，却應有種種不同的方法。祇為貪取蠅頭小利的小奸商，我們必須用政治力量予以說服。對無惡不作的大奸商，我們必須用集團力量和他們堅決的鬥爭，於過去的魚業和肉業的鬥爭一般。至如乘機操縱抬高物價的奸商，我們更須爭取地方公共團體與社會輿論出來裁制。

D. 相互規勉提高民族氣節。我們的工作，固然不忘鬥爭，但我們必須注意鬥爭的方式，相互規勉，也是鬥爭方式之一。在這四面遭受人包圍的上海，同胞們為了生活，無意間也有走上叛徒的路的。或貪圖便宜購買日貨，或迫於事勢使用偽幣。但我們必須提高民族氣節，相互規勸，絕對不做叛徒，不賣買日貨，不通用偽幣。

E. 埋頭苦幹加強本位工作。我們說過，我們工作要力避不必要的形式。但我們同時還得把我們工作深入到本位上去。已有的本位工作必須加強，而同時又應注意各職業部門的實際狀況，建立起新的本位工作。一般小市民的愛國熱情，我們必須予以鼓勵，但我們的目標，必須鼓勵他們向實際工作上去。——從無組織行動到有組織的行動，從形式的表示，到切實的苦幹，從浮噪到沉着，這一作風的轉變，是須我們加以更大的努力的！

## 八

總之，勝利的前途是在我們眼前展開了，但我們的抗戰工作也更艱難了。「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我們古先的聖



哲，是如何在做戒我們啊！一切的苦痛，一切的犧牲，我們必需咬着牙忍受，祇要我們能忍受，那麼蔣委員長以及抗日領袖們所提以「時間換空間」的長期抗戰的國策，必然能把我們最後勝利的期望實現的！但要緊的是我們決不能放棄我們一切應負的責任。同胞們，努力吧！用我們的實際工作，來紀念這抗戰一周年紀念吧！

# 城市陷落對於民族經濟的影響

竟日

汪精衛的『城市影響戰力』主張，遠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南京廣播怎樣纔能持久的時候，因為上海陷落，南京受到威脅就拿出來欺騙民衆了。那時他說：『戰鬥能力之能否保存及擴大，除了軍事之外，還有以下的三件大事。』於是接着指出：

『第一是經濟，最近數十年來，中國的繁榮慢慢的移至沿海一帶，這是人所共見的事實。以這樣幼稚的工商業，來做現代戰爭的基礎，已嫌薄弱，如果沿海一旦失去，則以內地凋零疲敝的農業手工業來做現代戰爭的基礎，其為薄弱，更不待言。』

到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二日汪氏在重慶廣播在戰抗中建國的時候，更露骨的說：

『近代戰爭，是經濟戰爭，軍事力量之強弱，有繫於經濟力量之豐歉。我國東部，尤其是東南，八九十年以來，因為國際關係，漸漸成爲經濟重心，一切入口貿易，以至工業及金融等等皆集中於此，就軍事觀點來說，這些地方，固不適於持久戰。』

『而就經濟觀點來說，失了這些地方便是失了軍事上最重要資源，這種矛盾，大約稍有常識的人，沒有不感覺苦悶的。』

在上面幾段文字裏，我們的確看出汪氏的『苦悶』大概是不能立刻公開認賊作父的苦悶罷。至於他是否『稍有常識』却是大大的疑問了。當前要討論的問題，就是：中國經濟重心是否是沿海城市，而中國是否以沿江沿海一帶『這樣幼稚的工商業來做現代戰爭的基礎？』沿江沿海的城市失陷了，是否『便是失了軍事上最重要資源？』而內地的農業手工業是否像汪氏所見到的一成不變的『凋零疲敝』呢？這是目前戰爭中的根本經濟問題，我們不能輕易放過的。

## 一、中國經濟重心是否在沿海城市

『大約稍有常識的人』沒有不知道中國經濟重心，決不是沿海城市罷。研究中國經濟的人，都知道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雖然各種不同經濟形式都存在着，但封建的小商業經濟却佔着主要地位。此種經濟的主要基礎就是農村經濟。所謂小商業經濟就是自給自足經濟。若把中國經濟作為整體來看，則佔支配地位的，不是沿海沿江的城市經濟，而是農村手工業與小商業經濟。美國經濟學專家葛拉斯（N. S. B. Gras）教授，稱現在中國經濟，仍在村鎮經濟階級（town economy）（註一）南開大學經濟學教授方顯廷氏最近也指出：『我國工業本身尙未能完全工業化；手工業遍佈城鄉，在生理上仍佔重要地位；其生產方式憑藉人工而不用動力組織規模，多屬家庭作坊之類。』（註二）

註一 見Gras, N.S.B., Rise of the Metropolitan Community, in Burgess, E. W. (ed) The Urban

Community, 1927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p. 190

除了沿海城市中的工業企業以外，全國各地還存在着固有的手工業區域和小工業。這些小工業是建築在從前的商業基礎上的，所以與從前的小商業聯繫着，而活動的中心人物，也是舊式的本地商人高利貸資本。不過這些手工業中心，若離沿海城市稍近的，有時因大工業的壓力而衰落倒閉，但有時却又有一種活躍的氣象。這因為大機器工業與形將破產的小生產者的手工業之間的鬥爭，在各部門工業和生產方面都帶着不平衡的性質。譬如，在沿海棉紗工廠方面已經是戰勝手工紡織工業了，但在織造方面却還是很厲害的落後於家庭的和手工的織造工業。如中國經濟地理的著者卡贊寧氏指出，百分之七十五的棉織品都是在手工業和舊式的工廠生產的。方顯廷氏調查的報告，也得到同樣的結論，說中國手織工業的生產，仍舊占纖維生產的棉織物的五分之四。同時在縲絲和絲織方面也是如此，縲絲業雖已打倒了手工業的縲絲廠，但絲織方面大部分却還是落在手工業之後。此外，地毯工業，也是這樣；絨線是工廠的製成品，而織造毯子却還是用手工的。（註三）

離開沿海城市稍遠的內地，就有着千百萬個小的手工業，分佈於許多村鎮縣份。這種手工業興起的最大原因，就是破產的農民不能單依靠農村經濟的收入維持生活，於是在商業資本活動的趨勢之下，開設了許多新式的手工業。而同時因為一面在半殖民地的民族大工業發展的委縮，一面在封建勢力統制之下，有着無限制的榨取小生產者的可能。所以凡是有充分原料而人口稠密的地方，小手工業都有很大的發展。而中國內地所出產的商品，主要的是為

註二 方顯廷，西南經濟建設與工業化，新聞雜誌週刊復刊第二號，引自中外經濟拔萃三卷三期，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三一頁。

註三 參卡贊寧，中國經濟地理，一九三七年六月光明書局再版二二一——二頁。

了滿足內地的市場，例如勃克（Beck）教授在中國土地利用研究的名著中，說中國農村所生產的棉花，其三分之一仍保存在農村裏。又如

『四川出產很多的茶葉，並不是爲了運輸到上海和長江流域；而是消費在四川本地的市場和西藏。高斯說，四川出口到西藏的茶葉，每年計四千萬磅。雲南的茶葉（普洱，思茅）同樣也是爲了本地的市場或出口到緬甸。確實的，在中國許多省縣中，爲國內市場的需要生產着茶、大麻、烟草和棉花。山西的棉花——在中國是最好的——只有一部分可運到上海的市場，因爲牠的質量最好，所以在中國的西北各省，都就延用晉棉紡紗或織布了。』

（註四）

中國手工業，就是在沿海大城市中也起着巨大的作用。我們拿中國的最大的城市上海做比喻罷。一般認爲上海工人數在工業企業中做工的達到二五〇至二九，〇〇〇〇人（註五），但在手工業生產內有四萬五千人做裁縫，二萬四千人做理髮匠，三萬四千人做鞋匠，一萬人做鐵匠和銅匠，七萬人做木匠，一萬五千餘人做鞋匠，一萬零七百人做毛刷以及二千人製造醬油，總計共有二十一萬一千人（註六）。如果在這裏再加上銀匠，磁器工人和陶器手工業的工人，麵包師等等那麼手工業工人數在這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中確實到了三十萬人（註七）。

註四 同上，一八七頁

註五 Taylor, Farm and Factory in China p.52

註六 農商部公報一三一期

註七 見馬扎亞爾中國經濟大綱，新生命書局出版三八七頁

南京城內也有不少手工業。

『南京銅匠店，鐵匠店，盆桶店，竹貨店，棕床店等業本地皆謂手工藝店。此等店之老板，即為各該店之主要工人。其店之生意小者，店中或僅有店主及學徒一二人。生意甚盛，稍有資本之手藝店，則有夥友三四人至八九人。此種夥友在作工上為完全工人，不過手藝店之夥友，須兼代店主賣買。』（註八）

如果舉濟南為例，那麼手工業人數遠在新工業工人之上了。在九個磨粉廠內做工的有一千人，在兩個火柴工廠內有一千五百人，在紡織工廠內有三千人，在製造毛綢的作坊內有三千人，在製糖，製紙，製肥皂，製皮以及紡織等等作坊和工廠內有一萬多工人。在多少大生產內共有一萬八千五百工人。而挑擔夫總計有一萬人，拉車的苦力有五千，店員有三萬人，家庭僕役和苦力有七萬人，即是說總共有十一萬五千人。（註九）

在沿海一帶，不獨有手工廠，而家庭工業也很發達，今以江蘇省常熟之放機制為例。

『所謂放機者，乃將布機放與工人之家。例如布廠以布機一百架，招女工一百人，具保將廠中之布機領去，而置之自己家中，隨時織布，隨時交貨。故當地之布廠有採放機制者僅一小事務所，已足辦理，並無廠屋亦不見布機。如工人停止工作，不願繼續時，該項布機，須交還原主。在工人請領布機時，一切原料，均由布廠供給，並由廠家發給憑摺一扣。藉此可以取原料，計工資焉。是項收支，月給一次。廠內支取之紗，重量須與交還之布足相符合，如有短少，須在工資內扣除。』（註十）

註八 南京各種工商業之調查，中外經濟週刊，二二六期

註九 參“China Economic Bulletin” No.107, 1925

註十 常熟之經濟狀況，中外經濟週刊，二二四期

本來大工廠因有種種便利，一般講來，大量生產品的價格，更比手工業製造品便宜，這也就是大工廠可以毀滅手工業的理由，不過因為中國勞動力特別便宜，而手工勞動生產品的價格，比工廠的出品還要便宜，所以下層羣衆都還其購買的能力，因此它至今還保存着很重要的地位。

『上海的工人本來可用便宜的日本棉布做衣服，吃西貢運來的米，在工房裏點美國出產的煤油，用搪瓷的而盆洗臉盆。但是在實際上，貧窮却逼着他們仍舊穿着土布做的棉鞋，使用着泥燒的盃盤，木桶以及用火油桶所做的火爐。大部分的工人所以不得不購買土貨，是因土貨雖然是很原始的很粗笨的，但他的價錢却又比工廠的出品低廉了許多。』（註十一）

這樣看來，無數舊式工廠和小手工業作坊，仍有能散佈在工商業大城市當中的理由，是滿足工人，苦力，和小生產者們的需要。

此外，就煤炭及鐵礦開採而論，由中國小企業用舊式方法開採之產量，亦在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左右，中國本有極稱豐富之富源，如水力（江河），石油，以及各種蘊藏有色金屬等等，但幾乎完全沒有開發及採用。雖然中國人口占了全世界四分之一，而中國各種主要重工業與輕工業的生產量，在世界生產總量中所佔比重，則非常薄弱，例如

煤	○·六%	鉛	○·一%
鐵礦	○·五%	錫	五%
銅	○·二二%	紗錠	三%

從這些數目字中，便可以明白看出中國工業落後的情形。

以上是以各種工業與手工業的個別舉例，來證明中國經濟的重心，並不是沿海沿江城市中的大工業。現在再以全國人口在城市與農村的分配比例來說罷。按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出版的中國評論週報上，托格雪夫 (Torgashoff) 發表一篇文章，估計全國都市人口在十萬以上的有一百二十二個，人口在五萬與十萬之間的有一百七十八個，人口在二萬五千與五萬之間的都市有一百七十七個，而人口在二萬五千以下而有商會的地方有一千八百六十八個，合計中國城市人口約一萬萬，佔全部人口百分之二十二。(註十三)其餘三萬萬以上的人們，全住在農村中。據教會的統計中國有十萬個大鄉村，每村人口由二五〇到二五〇〇人，一百萬較小的鄉村，每村不到二五〇人，總計農民約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但是工業化國家的農民，是佔全國人口少數的，例如美國農民在一九三〇年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二十二，德國農民在一九二五年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三十，而法國農民在一九二六年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三十七。而中國農民比例數的巨大，以及農作物與手工業分佈全國的情形，誰都不能否認中國廣大的人力物力是在鄉村，不在城市。所以中國經濟重心決不會在沿江沿海的少數城市的。

## 二 中國城市在民族經濟中的作用

註十二 米夫英勇奮鬥的十五年 一二頁

註十三 Torgashoff, Boris P. "Town Population in China," in the China Critic, April 3, 1930p. 302



當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中國也漸漸資本主義化了。在沿海各地發展了各種工業企業與商業，而隨着工業而興起的，就是沿海的大城市。但城市的作用，是隨着國家的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適應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全國工業化程度很高，而大城市是工商業的中心，有着很大的作用。而中國的城市，是在帝國主義的強迫之下發生的。外國資本為着自己商業的，生產的和政治的需要，在中國開劈了商埠和租界的網。外國資本決定了鐵路建築的方向。外國資本規定了在何處建立海港和商埠，這種合乎外國資本口味的鐵路，更加促進了殖民地化的趨勢。外國資本又在城市建設了工業，使城市成爲帝國主義勢力的中心和買辦資產階級聚集的中心。（註十四）我們拿中國沿海的城市與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城市比較着研究，更可看出中國城市在民族經濟中的作用有多少了。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城市的產生，有兩個主要條件：第一是四週經濟的發展；第二是需要一個工商業的中心。而工商業所形成的城市，加強了本身的組織與營業的力量，反過來又促進四週經濟的發展。這樣工商業的大都會，漸漸代替了舊有的村鎮與小城市，而取得支配新興資本主義經濟的領導權，使附近的村鎮與小城市都做它的附庸。至於大城市發展的步驟，可分爲三：第一步發展的時候，我們看見一個有希望的中心區域，它靠着水陸交通的觸鬚，去搜集原料，去推銷貨物，於是漸漸組成了市場。第二步接着發展的是工業企業與大規模的交通，在美國這兩層是並進的，而在歐洲則有前後之分。隨後興起了金融機關，靠着金融的力量，使城市與四週結成一個有系統的經濟大綱，而且還漸漸擴充着。（註十五）

註十四 參馬扎亞爾同上，三八四—五百

註十五 關於歐美大城市的发展，參Grass, N.S.B., *The Rise of the Metropolitan Community*, in Bur-

gess E. W. (ed.), *The Urban Community*, pp. 183-191

但是中國沿海沿江城市，不是這樣從容發展的，上面已經指出中國城市是由帝國主義打樣的。他們起初要求開商埠設租界的目的是傾銷帝國主義的貨物，一切交通的設施，也爲着便利他們貨物的運輸，他們根本不希望中國自己工商業的發展。後來進一步在中國城市開設工廠製造工業品，利用外國銀行的金融勢力，一意壓制中國民族經濟的發展。所以沿海沿江大城市中工商業的發展，是帝國主義工商業反而被壓迫得喘不過氣來，雖然在幾十年極力掙扎着，但是始終居於被支配的地位。所以中國沿海城市的發展，不是民族經濟的發展，而是帝國主義的勢力發展。

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城市發展，像一個蜘蛛網，以商業爲中心，然後由中心出發，用交通網，一圈一圈發展開去，使四面區域漸漸變成城市的一部份，使大城市的四週的獨立城市完全消失掉。雖然有不少很發達的城市，但它們不是爲大城市搜集原料的中心，便是發貨的中心，是附屬在大城中的一個機構。它們是商業的工業的或金融的衛星，所發的光彩，是反映着大城市的繁榮。不獨四週城市如此，而圍着大城市的各區，也隨着大城市的發展而專門化了。它們或許是一個礦區，木材區，或是農業區。而各農業區中有的種五穀，有的做牧場，有的種水菓或蔬菜。它們所有的生產，或者全部或者一部分是供給大城市去消費或去分佈到別處，這種以大城市爲中心的經濟發展，當初是自然的，無計劃的，但到後來發展的步驟不是沒有計劃了。近年來大城市中的商會都用了許多專家，各自努力發展它們四週的區域，知道本城市的勢力範圍到那裏爲止，而從事經營，不讓別的城市勢力侵入進來，這叫做『都市意識』。

但是中國城市的經濟勢力握在帝國主義手中，往往一個大城市，內中就劃分了各種租界，各自分裂着進行，並且互相侵軋着、阻礙着、排擠着，使城市的本身就不能有常態的發展着。至於城市四週與城市的從屬關係的範圍，也由帝國主義經營着。他們在開始的時候，已在中國互相競爭，劃定了『勢力範圍』，不許別國侵入，同時強逼中國政府，在他

們『勢力範圍』內，給以種種便利，使他們各自擴充着自己的勢力。所以中國城市的經濟勢力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是完全不同的。歐美各國，以發展城市，為發展本國國民經濟的目的。城市繁榮了，全國經濟也就繁榮了，而中國城市的發展，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經濟的手段，中國城市越繁榮，帝國主義越發財，而中國經濟便越被摧殘。在城市中的中國民族資本家，大多不得不附在帝國主義身上去發展，做了買辦資本，沒有獨立的支配能力，對於城市的發展，就用不着他們費心了。所以雖然

『中國的領袖與別國的領袖一樣。無疑的都集中在都市裏面。但中國的領袖，似乎缺少了一種「都市意識」。譬如天津工商業的領袖，有幾個人知道天津的勢力範圍，包括一些什麼地方？他們有幾個人知道東南到什麼地方，便侵入濟南，南京或上海的勢力範圍？而南到什麼地方，便侵入鄭州，或漢口的勢力範圍？曉得那些地方，是他的都市的勢力範圍，因而出全力去經營這些地方，使這些地方與他的都市，共存共榮，便是我所謂的都市意識。』

（註十六）

政治勢力往往可以影響城市的發展。美國因為一則土地廣闊物產豐富，而又沒有中世紀封建勢力的阻礙，同時在大戰時得到國際的優勢，所以大城市的發展也遠勝任何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只有兩個城市中心，法國至多也只有四個，而美國則有十二個城市中心。歐戰後奧國變為小國，而奧京維也納四週勢力範圍內的區域，也被分割掉，使它失却大城市的地位。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商業地位因政治勢力削弱，也遭受了很大的困難。

影響中國城市發展的政治力量，就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使城市只能在沿海一帶發展着。中國企業家穆藕初氏檢討戰前中國工業所以集中在沿海城市的理由，指出

『過去，中國社會帶有濃厚的殘餘封建勢力，而各省又不無地方觀念。所以我們在內地創辦工業，不免有些阻礙；這一方面使各種工業不能深入內地，形成工業與原料市場隔離，無法突破殖民地性的工業範疇，把民族經濟的基礎建立起來。一方面使工業生產局促在幾個通都大邑，非但工業原料多由國外輸入，把國產農村生產品，滯積起來；且一遇暴力侵略，即陷於不可收拾之境。回溯舊事，實在痛心。』（註十七）

資本主義國家靠着大城市，發展龐大的商業。因為龐大的商業，沒有城市做龐大的集中中心，是不可能的。有了城市，就可集中，城市有堆棧，有冷氣間，有敏捷的交通，有大量的勞動力，同時有大銀行的大量資本來週轉，幾乎所有經濟總機關，全集中在大城市，做全國經濟的重心，與全國各地發生密切的聯繫，領導着發展全國經濟。

中國的沿海大城市，雖然也是各種經濟總機關的集中地，但是因為與內地沒有多少關係，所以這種總機關的最大作用，也不過在沿海一帶，造成了畸形發展的局面。譬如上海是中國國際貿易的最大港口，在戰前對輸出入方面，占了總額過半數，天津占百分之一，居第二位，膠州、廣州與九龍依次占第三、第四、第五位。工業也集中在沿海城市，而上海占總額二分之一。金融中心也在沿海城市，戰前全國共有華商銀行一五九家，上海有六十家，佔總數百分之三十七以上，而『全國銀行之分佈大半集中於上海及江浙兩省，此外各省之銀行除九大都市之外，對銀行總數所佔之百分率，未超過二十分之一者。』（註十八）其實不獨總行集中在城市，而分行也有集中在城市的趨勢。但

『理想中之內地分枝機關，應倍蓰於都市，而事實則適反是。抑尤進者，各銀行分枝機關之分佈，更有特異之

註十七 穆藕初，敬告企業家，上海文匯報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五日

註十八 中國經濟年鑑，第三編一九三六年D三百

現象，即分支行之設置，多集聚於總行之所在地，如上海共有總行六十家，分支行達一百二十八家，然就中總行所在地之分支行數，達八十二家之多，簡言之，即上海一地，共有不同牌號之銀行，計一百零六家；而此一百零六家銀行之本埠分枝機關，共有八十二家，平均幾每一銀行設分行一家，如以分支行對總行之比率計之，尤不止此，此外天津共有銀行六十二家，而不同牌號者，僅三十家。北平共有銀行五十一家，不同牌號之銀行，僅二十家。南京共有銀行五十一家，而不同牌號者，僅二十五家。此足表現中國金融業已有資本集中之趨勢。（註十九）

那末集中在城市的銀行總行與分支行，所經營的事業是否是發展實業呢？銀行界領袖章乃器氏說：

「因為中國還沒有相當長成的工業資本，足以供畸形發展的銀行業底投資，銀行營業底動向，一部分便在商業資本方面發展，而別一部分便在財政方面發展。商業銀行在地產上的投資，恐怕要算在中國發展的頂高。這種營業上畸形的發展，依然還是商業資本的典型。向財政方面發展的結果，在公債投資當中造成新形態的高利貸。這樣，也許可以說：在半殖民地的形態之下，嶄新的事物都會渲染封建的色彩；半殖民地的形態倘使不能掃除，中國社會要走上進步的階段，是不可能的。」（註十九）

中國沿海幾省的經濟，的確受着城市的支配而被蹂躪着，因為帝國主義和中外的工業，所積極需要的是沿海各省河川之地與鐵路區域，這些地方所生產的棉花，絲，大豆，茶，油料，烟草和雞蛋，是專供沿海城市的工業，出口以及消費的需要，而農民因為大量改植供給這種需要的產物，糧食的種植，因之減少。所以廣東，江蘇，浙江，河北，福建等省所消費

註十九 同上D七頁

註二十 章乃器激流集，生活書店一九三六年版四七頁

的糧食，主要的反而由外國輸入的。（註二十一）帝國主義對沿海各省的農村經濟，的確有很大的支配力，所謂沿海城市是經濟重心，不是別的，而是中國半殖民地經濟重心。本來綿長的海岸線與沿海的城市是民族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然而在中國五千餘哩的海岸線，恰變成了民族經濟的鎖鏈，沿海的城市，却變成了民族的吸血疣。

至於廣大的內地許多省，受沿海城市的影響就不同了。在靠近沿海幾省，交通較為便利的地方還有影響，還有牲畜，皮毛，毛革，羊毛，桐油等為出口而生產的，但是沒有像棉花，絲和大豆那樣的大批出口貨了。至於輸入進去的商品，也是越到內地越為減少。例如喬啓明氏在中國農民生活程度研究告訴我們農家向市場購買商品的程度是不一樣的，大概交通發達，鄰近沿海城市的農村，其經濟商業化的程度，必然要大些，而內地交通不便的地方，就表現自給自足的景象了。譬如：平均每家庭由市場購買衣服的百分數而論，在江蘇江甯是一〇〇，安徽宿縣是七二·八，而山西武鄉與河南開封，都只有一〇·二。還有平均每家庭由市場購買食物的百分數，在江蘇江甯是四七·二，安徽宿縣是一七·六，河南開封只有五·一，而山西武鄉只有〇·二（註二十二）至於『西南各省受地理及人事之限制，與外界殊少往來，類多閉關自守，呈十足之中古時代地方經濟色彩』（註二十三），所以我們說中國廣大的內地各省，到處都還保存着食糧的經濟，到處都還有純自給自足的性質，與沿海城市不發生密切的關係，不是沒有根據的。

註二十一 參錢亦石，近代中國經濟史，生活書店一九三九年版一七二頁，及卡贊寧同上，一九〇頁

註二十二 喬啓明，中國農民生活程度研究（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調查）社會學刊，第三期

註二十三 方顯廷，西南經濟建設與工業化，新聞雜誌週刊復刊第二號，引自中外經濟拔萃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三

同時中國內地各省的生產與商業，有許多地方並不『凋零疲敝』。例如手工業『冶鐵事業差不多在中國各地都有』。『甘肅的羊毛手工業是很發達的，在天水縣有幾千婦女織毛布，大都是行銷在市場之上。在伏羌（甘谷縣）興起了許多毛機，毛衣和圍巾工廠，是毛織業的中心。』至於『四川各種生產品都有，上而自絲，大麻和茶，下而至小麥，高粱蠶豆和大豆，凡是中國各地生產的，四川都可生產。四川與各省都有密切的聯繫，同時牠與內部各省的交換（商業）也很達。』這樣的例子不一而足。（註二十四）所以沿海城市，對沿海幾省，雖是經濟重心，帶着領導性質，但對於廣大的內地，是沒有統制力量的。因為由全國經濟而論，城市太少太偏，鄉村太多太廣，中國城市在民族經濟中沒有多大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 三 城市陷落與民族經濟發展的路向

城市陷落的最大損失，就是工業的被摧毀。上海，無錫，蘇杭，天津，青島，濟南，武漢，廣州等地，素為中國工業彙集的大城市，這次戰爭中所受損失狀況，雖尚無確切可靠之調查，但就各方面報告材料中看來，城市的工業什有八九皆已被毀，苟有倖免的，除在外人租界外，亦為日方所佔領。例如上海及其近郊，向為中國工業之重心，戰事發生以後，該區工廠合計被毀者，當在百分之七十左右。今次於戰爭中，華人工業財產所受之直接損失，總額在八億元以上。又如近代工業極發達之無錫，據一九三八年六月亞細亞雜誌之報告，僅存紗廠一家，此外皆已為日軍焚毀。至於非日軍佔領區內之工業，被日機轟炸者亦復不少，而以與日貨處於競爭地位之工業為尤烈。無疑的，這次沿海城市陷落，實是中國工業空

註二十四 詳見卡贊寧同上第四章工業及工業的分佈。

前的浩劫。

但是社會是對立着發展的。一面固然是大部份工業的被摧毀，給中國經濟以嚴重的打擊；而另一方面却又因海岸線的被封鎖，城市的陷落，反而引起了內地獨立民族經濟空前的發展。為明瞭真相起見，讓我們來做一個概括的檢討。

首先要指出的，就是所謂沿海城市的陷落，並不是城市中所有的經濟力量一齊被毀滅，就是上面所說上海工業企業被摧毀的慘狀，也不過是一個偏面的寫照。我們知道：『在滬戰時，上海華商工廠西遷者，約在一億元以上，同時浙皖三省工廠，亦紛紛西遷。』（註二十五）此等工廠都先到長沙，後復深入重慶，而目前的重慶已迅速變為新中國獨立的民族工業重心。而政府為保存生產實力，培植抗戰資源計，一方面組織中央遷廠建設委員會，指導及扶助戰區工廠之內遷；一方面由經濟部協助各省建立新工業。據掃蕩報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記載經濟部長翁文灝對記者談話：『民間工廠經政府協助遷至內地者有三百數十家。』而且有的城市如青島是自動放棄的，據各方面消息，不獨中國工廠機械與熟練工人，全數西遷，並且政府對日方產業會予以重大破壞，即紗廠一項，日方損失有達一億二千萬元之多。至於武漢是經十五閱月抗戰後，方才從容退却，當然大部分工廠的機械，早於失陷前遷入內地，並施行焦土政策，這都是彰明較著的事實。

即使工廠被毀滅也不是工業全體被毀滅。企業家穆藕初氏說：

『我想我們（企業家）的事業，經過此番浩劫，雖已毀去十之八九，但是我們的精神，我們的信用，我們的經

註二十五 一年來中國戰時經濟之檢討，大美晚報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原文載亞細亞雜誌，一九三八年六月號。



驗，不獨沒有絲毫消失，且更加緊張起來。黨前此後，今日各方面的條件，既都十分適宜我們來重振旗鼓，我們企業家，乘此良機，何不亟圖奮起。」（註二十六）

並且沿海各口岸多被封鎖，外貨進口困難，內地物價因而激增，同時政府實行統制外匯管理貿易，使不需要的奢侈品及其他消費品無法輸入，這是中國從未有過而戰前也決不能造成的關稅壁壘，正好利用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保護我們內地新工業的長成。穆藕初氏於城市陷落後，組織西南考察團，遍歷蘇、浙、湘、鄂各省，作實地考察，同時與遊過粵、桂、陝、甘、滇、貴的許多企業家晤談，發現全國精神已經團結一致，中央和各省又能深切認識戰時經濟各項必要條件，無時不在勵精圖治之中，他於是指出：

「新局勢之到來，是建築於新的物質條件之上。換言之，我們這次雖遭受暴敵摧殘，但事實上不曾為我們造成新工業生產合理化的條件。第一，不容許我們再集中工業於幾個通都大邑。第二，各省過去那種地方觀念之消除；第三，各省因從前工業生產缺乏，一旦非常時期蒞臨，社會經濟莫不險象環生，大家不約而同，歡迎我們企業家去直接投資，為他們建設內地工業生產事業；第四，因戰爭影響，內地工業品到貨寥寥，與需要的胃口相差太鉅，致工業品價格飛漲，急待設廠調劑出品，因此易於暢銷；第五，因各省努力整飭吏治，雖偏僻之地，治安已非常良好。這種情形，由於我這次和上海組織的西南實業考察團幾位重要團員談話之下，加以更明確的證實。」（註二十七）

因為新環境的要求，各方面將淪陷區另碎的機械與熟練工人以及難民，遷入內地，組織小規模的合作事業，實行「化整為零，化聚為散，將工廠散到內地，散到鄉村」的原則。由政府撥款五百萬圓，在各省開展着工業合作運動，在西

註二十六 穆藕初，敬告企業家，上海文匯報，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五日

註二十七 同上

北、西南、東南及華中各地設立合作辦事中心，推進生產。據各方報告，進行非常順利，例如在甘肅邊境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底已有一百個合作社，在陝西西部的合作社，已能將本錢還給政府，自己進行了。主持工業合作運動的艾黎氏（*W. A. Rees*）說：『在戰區裏只有小型工業，可以供給兵士需要，同時不受敵人注意，並且可將合作社隨着軍隊移動。工業合作最重要的使命是使兵士能得到一切個人需要品，使士氣不致因需用品缺乏而衰落，這是在後方正在發展着的經濟防線。同時預備將西北、西南、東南的三道經濟防線，組織成內地的工業合作網，不獨可以供給兵士們的需要，同時也可以將日用品供給廣大的羣衆。』（註二十八）此外中國各省還有八種合作社，如信用、公益、水利、供應、配給、消費、生產與配給，以及供應與配給等等。一九三八年，在貴州、甘肅有十二萬五千個新會員加入合作，四川在一九三八年開頭五個月內已組織了一千一百九十個合作社，增加了七萬三千三百零三個會員。共計四川有三三九三合作社，會員共十二萬六千人，其中信用合作占百分之八十七以上。貴州到一九三八年共有四三三八合作社，會員共計十五萬九千，而信用合作占百分之八十七。（註二十九）至於合作社的生產也激增着，例如湖南一個城裏由難民組織的合作社，在一九三九年二月間做了五千件棉袍，一萬件棉襖，即運給三百里以外的傷兵了，三月第一個星期爲着另一批傷兵，生產了一萬五千條手巾，一萬五千雙襪（註三十）這些零碎的事實已證明內地的合作運動，已在起着巨大的作用。

與這種輕工業配合着發展的，是新興的工業企業。據官方發表的統計，截至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止，資金在五百萬元以上的工廠，在政府貸款援助之下，遷入四川省的計達五十七家，其遷往其他各省的，據各地另碎的報告，截至一九

註二十八 *Alley, Rewi, Chinas Industrial Coops, Shanghai Evening Post May 5, 1939*

註二十九 參英文大美晚報一九三九年五月九日

註三十 同上，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通訊

三八年十二月底，已有二十餘家。而政府在重慶設立西南經濟建設委員會，主持今後西南經濟建設與開發富源事宜。抗戰以來，各省新建立，計劃進行中及復工之工廠，據一九三八年底已得材料，計四川省廿二家，西康一家，湖南省七家，雲南省十二家，貴州省十家，廣西省八家，廣東省四家，九龍五家，江西省六家，浙江省十五家，福建省六家，陝西省六家，甘肅省二家，共計一〇四家。（註三十一）而英文大美晚報編輯，在親自內地訪問的報告中說：『中國戰事工業，代表「復興態度」最有興趣的一面，這種態度，籠罩着政府的新都。』（註三十二）這種新興工業，是獨立的民族工業，與以前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壓迫下的工業，其發展的程度，真有天壤之別。

內地工業的勃興，還可由中國戰時製造品出口的激增看到確鑿的證據。如一九三六年出口的製造品，僅九千二百萬元，一九三七年增至一億零七百萬元，至一九三八年又增到一億一千二百萬元。這證明城市陷落後，政府與人民上下一致努力，而民族工業得到空前的進步。

國際貿易決不因城市陷落而被毀滅。因為一面雖被敵軍封鎖了口岸，而另一面新的國貿易路線正在發展，同時因為政府一面統制外匯，限制奢侈品與非必需品輸入，一面扶植生產促進出口，使一九三七年與一九三八年進出口貿易總數，均較戰前五年間任何一年為大。而入超的數目兩年內僅各一萬萬餘元，較一九三六年入超數小一倍，較一九三五年入超數小兩倍，而較一九三四年小三倍以上。不獨如此，各關之貿易額，因城市陷落已起積極變化，上海在戰前占進出口貿易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在一九三八年已降到百分之三十以下，而西南各埠，頗多躍進。同時因為西南

註三十一 詳見張肖梅編中外經濟年報，國內之部一九三九年版第七章破壞與建設之工業經濟。

註三十二 Gould, Randall, China Industrial Boom, with Government Help, New Factories

Erected. Shanghai Evening Post, April 27, 1939.

各埠貿易的躍進，可以促進西南經濟的發展，這種有利現象，在戰前沿海城市被帝國主義控制的時候，決不能產生的。

戰時在農業方面，因政府於西南西北各省，努力經營，增墾荒地，改良農田水利，並制定『農村放款辦法』六條，令飭各省市縣政府，一致努力推進，故一九三八年各省生產均見增加，雖然我們沒有完備統計，可以證明，不過據四川經濟月刊第九卷第五期抗戰聲中糧食之消費與運銷問題所載，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平均之稻穀入超計二六、三四六、〇六〇市担，而戰後一年內之入超額僅一九、九九四、六六〇市担，不及前者百分之七十六，由此可見我國抗戰期中，稻穀入超猶能少於戰前數年，可爲一九三八年稻穀生產增加之旁證。（註三十三）

城市陷落，對於金融方面，不獨不受任何打擊，並且因之消滅了以前金融界在上海作投資地產買賣公債的投機事業。因爲沿海城市工業大半被毀，一部分西遷，工商業重心內移，本來經濟繁榮的城市，已陷於生產不可能之狀態。銀行資金便沒有什麼出路，同時加上政府督促，使金融機關內移，以便開發西北西南。據報載截至一九三八年六月底止，在西南六省之銀行，總分支行合計已達三百二十餘所，比戰前銀行總分支行集中在少數大城市，截然不同。同時，所有營業亦放棄投機事業而向工業農業放款，協助開發內地無限寶藏，散播資金，以謀促進戰事生產。而幣制統一，也是由戰事造成的。本來中國幣制，名義上在戰前雖已統一，但雲南廣東廣西各省貨幣本位仍極歧異。因爲抗戰在政治上促進了全國大團結，而在經濟上，也促進了幣制的統一，增加政府財政金融的力量。

以上各種經濟改進的事實，證明了『中國在抗戰中成長』，證明了『內地凋零疲敝的農業手工業』不是一成

不變的，同時證明了因為城市的陷落，反而促進了內地經濟的突飛猛進，證明了沿海城市的失陷，並沒有『失了軍事上最重要資源』。

汪精衛的『城市影響戰力』的說法，對於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或許是有相當理由，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重心在城市。但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城市在全國經濟根本不能起多少領導作用，所以他的話，變成無理取鬧了。倘若中國土地狹小，富源缺乏，則城市陷落，或使內地經濟不能更生，但中國是大國，不獨後方有極大的土地，極富的資源，可以自由發展戰時生產，支持長期抗戰，同時在敵人後方的各游擊區，也可靠着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來支持着，使敵人進退維谷，疲於奔命（註三十四）。倘若在過去不統一的中國，城市陷落了，或許無法應付強敵；但今日的中國是上下一致團結，有國共兩大黨統一領導着抵抗，並有國際的援助。對於發展民族經濟，有了空前的便利條件。但是汪精衛對於這幾層顛扑不破的事實，一概抹殺不論，單單爲着城市陷落而『苦悶』，故意危言聳聽，發表自欺欺人的謬論。

其實蔣委員長遠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告國民書中，早已指出『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勝利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的民心。』抗戰兩年來經濟建設猛進，已完全證明了蔣委員長指示的絕對正確性。而汪精衛偏要曲解事實，淆亂聽衆，來動搖人心，分散抗戰力量，以期達到賣國求榮的目的，這種企圖，真是『精衛銜石』，『心勞日拙』，『稍有常識的人』是決不會受他欺騙的。

# 論現階段的思想文化

胡曲園

在抗戰轉入第二階段，全國精神動員成爲嚴重的課題的今天，我們應該如何展開思想文化運動來配合這一非常之急需，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 一 對精神動員應有的認識

在這裏，我們首先應該知道：所謂「精神動員」其實就是思想意識知識的動員。本來，精神這一東西的作用，我們無論站在什麼立場都是不能否認的，沒有精神，我們就無從改造環境，推進社會，而有今天這樣高度的物質生活。但是我們却不能像唯心論者那樣把它看作宇宙的主宰，世界一切的創造主。因爲他們是誇大了人類精神意識的能動作用，完全沒有看到客觀環境對於精神意識的影響，不知道我們的意識內容就是外界事物的反映，不知道我們改造舊的環境，創造新的環境都是根據着客觀的條件，而以爲精神意識不受環境的影響，環境倒是精神的自由產物。關於目前的抗戰也是一樣，我們不可以把它理解爲可以由「精神」任意致勝的東西，反之，我們應該把「精神動員」理解爲根據客觀條件對於人力的推動，以及對於客觀現實的深刻把握，把一切不利的條件轉變爲有利的條件，這才是精神動員的本意。不然，我們像唯心論者所主張的一樣，認爲精神意識是絕對自由的，是至高無上的，是可以擅自創造一切

的，那末精神動員還要規定「綱領」和「實施辦法」作什麼呢？只要焚香祈禱，指天痛罵不是就夠了嗎？或者憑着氣憤，拿我們的主力去和日本作孤注一擲，還要進行「持久戰」作什麼呢？

## 二 對文化運動應有的認識

因此，現在所需要的思想文化運動，應當是完全根據客觀現實來爭取抗戰勝利的一種運動，而不是脫離現實的某種夢囈，或只以「刺激」、「煽動」為滿足的盲目指導。不過我們在這裏也不能因為要強調思想文化的現實意義，要加強思想文化的實踐作用，就把它單純看作現實行動的宣傳工具。因為理論的東西，雖然是社會實踐的產物，是服役於實踐的東西，但是它的發展，是具有相對地獨立性的，它有它的發展體系，它有它的活動領域，如果我們把它單純認作個別行動的直接說明，那不但縮減了思想文化的活動範圍，而且也削弱了思想文化對於改變現實的能動作用，這樣思想文化不但不能向我們預示現實的發展，指導我們的現實活動，而且必將成為政治的尾巴，表現得負乏無力，甚至被人叫做「抗戰八股」。在抗戰前，文化方面的救亡運動之所以沒有被人叫做「救亡八股」，就是因為它在救亡宣傳之中，還同時提出了關於思想運動本身的任務——新的啓蒙運動，它根據救亡圖存的主要前提，從各方面展開了思想文化的許多基本問題，和新文化的建設問題，因此它才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熱烈參加討論，奠定了以後思想集中統一的基礎。所以我們應該切實記着：思想文化運動是不能完全等同於宣傳煽動工作的，它在每個階段都有它自己的特殊任務。

## 三 現階段文化運動的任務

那末，現階段的中國思想文化運動的本身任務是什麼呢？我以為現在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完成抗戰前「新啓蒙運動」所未完成的任務。在這裏，也許有人以為「新啓蒙運動」在今天已經成了過時的陳跡吧！但是我覺得無論是把當前的文化運動叫做「抗戰文化運動」也好，或「通俗大衆化」的運動也好，可是在事實上，它的本質仍是一個「新啓蒙運動」。「新啓蒙運動」雖然是在抗戰爆發之前所提出的口號，但是它是反映了新中國建立過程中的思想文化運動的本質的。「新啓蒙運動」所要求的任務，顯然沒有在抗戰之前完成，而且事實上也是不能在抗戰之前完成的。「新啓蒙運動」是根據民族當前的危機而提出的，國家民族正在經歷着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鍵的今天，客觀情勢之正向它課着嚴重的需要，乃是當然的事情。現在誰不希望着中國思想界統一在「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發展之下，誰個相信「思想集中」「力量集中」可以用「權威」「壓力」達到，而不須要從各派思想的「自由存在」「自由批判」中來求得合理的結論和主張的一致；凡是目擊到侵略者利用落後的傳統意識來分化中華民族的，誰不希望極力提高理性作用以挽救國家的危亡而確立將來復興的基礎；凡是痛感中國過去的學術文化之無益於國家民族的，誰不希望從現實的鍛鍊之中建立起新的精神武器——新的學術文化。這是抗戰前新啓蒙運動者的呼聲，也是當前全國人民的迫切需要，認為「新啓蒙運動」已是過時的陳跡，這種見解顯然是不對的。自然，把今天中國所需要的思想文化運動的內容完全等同於抗戰之前的思想文化運動，也是不對的。因為現實已經向前發展了，它向思想文化方面所要求的任務也愈加深刻了。即如：新啓蒙運動在抗戰前所提出的第一個要求是「愛國主義」，認為在這國家存亡的關頭，作為中國人的唯一急務，就是搶救祖國，而文化界首先應該實行全國文化上的抗戰民主大聯合，作全國一致禦侮的號召。不用說，這一要求的提出是非常正確的，不但給了當時以很大的激動，而且也給了今天的團結抗戰以精神的基礎。但是在今天看來，當時所提出的內容，仍然不免近於空泛籠統，事實的發展告訴我們：（甲）



「此次抗戰意義，不僅在却敵，而尤在確立建國之基礎。」「抗戰而勝，則建國必成。」「吾人理想中所欲建設之國家，外則為獨立自由平等，內則為民有民治民享。」這不但深刻地引伸了抗戰的意義而且更加具體地說明了當前的任務，並預示了今後思想文化運動所應發揚光大的主要內容。（乙）這次抗戰的意義，不僅是為「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而鬥爭，而且是為世界和平而鬥爭，不與法西斯侵略者以致命的打擊，則和平的威脅不能退消，世界文明的發展必將失其保障，所以中國的抗戰，不僅是中國人民解放的起點，也是世界人羣解放的柱石，這一點雖然前一階段的新啓蒙運動者不見得沒有意識到，但是因為限於當時的環境，却不曾明白地提出，而現在則已為多數人所確信，並應加以深刻地闡揚。新啓蒙運動在抗戰前所提出的第二個要求是「自由主義」就是必須各派思想能夠自由發展，然後才能對國家民族貢獻它所固有的才能，關於這一點在當時可以說是發揮得最透澈了，但是在今天看來，也不免近於抽象。（甲）我們現在除了一面向全國解釋「思想自由」和「意志集中」不僅不是兩個互相矛盾的要求，而且「思想自由」是達到「意志集中」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唯一真實的途徑之外，另一方面還應該向各方面人士具體要求各種（無論專門的或通俗的，國立的或私立的）的教育機關的開放，各種學術機關的開放，各種研究實驗機關的開放，給各種思想派別的人材以自由研究自由討論的機會，以及根據各自的思想方法提供各自的成果的機會。（乙）同時相應着這一思想上的自由發展，還應當極力推進政治上的民主運動，例如參政員周鯨生等五十餘人所提出的「確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國基礎案」明確地要求「政府行動法律化，政府設施制度化，政府體制民主化」這明白地反映出了目前民主運動所達到的具體階段，而應如何地使其益臻完善。新啓蒙運動在抗戰前所提出的第三個要求是理性運動，要求根據邏輯和事實來下判斷，反對任何不顧事實的獨斷妄為，以及送信盲從，這一要求因着事實的發展，現在也增加了它的內容，即如（甲）現在侵略者因為在軍事上的失利，知道武力

不能滅亡中國，於是改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進攻方法，來分化中國，使一部分意識落後的羣衆，投入它的懷抱，我們爲了粉碎侵略者的這一進攻，自然應該更加深刻地展開思想上的理性運動，在真理的光照之下清算一切叛逆思想，和平思想，消極思想的發生和影響，並剖析它的歷史根源及其與一般傳統意識的關聯，（乙）發揚科學精神，這是五四運動對於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主要供獻，我們應該繼承並加以發展，我們不能因爲現在從政治到文化都在貫徹着民族主義，就以爲中國的一切都是好的，外國的一切都是壞的，反之，我們也不能因爲現在需要清算封建的傳統意識，就以爲外國的一切都是妥當的，而中國的學術思想沒有一點值得發揮，我們應該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場，秉着科學的精神來權衡一切，對於先進國家的科學思想我們固然應當加以正確地把握，同時對於中國固有的文化也應加以從新估計和闡明發展，即如康有爲的大同思想，雖然是中國初期啓蒙運動者的一個社會主義幻想，然而這無疑地是現代中國人民的需要的一個反映，中山先生在說明三民主義的任務時也說：「以建民國以進大同，」這更說明了大同思想不但反映了中國人民的需要，而且已經成爲現代中國的一個政治問題，我們現在應當根據目前的現實情形來加以科學的發揮，而不因爲它是康有爲的一個幻想，就加以拋棄，這便是一個好例，自然對於外來的思想也應該如此。新啓蒙運動在抗戰前所提出的第四個要求是建立現代中國的新文化，這一要求的內容非常明白，就是要建立適應現代中國需要的文化，無論是外來的文化，或是中國固有的文化，都要放在現代中國的實踐裏邊，從新加以鍛鍊，鑄成新中國所固有的新文化。但是也許是因爲時間短促的關係，新啓蒙運動者在當時只不過提出了這一要求，而並沒有什麼具體的供獻，現在我們自然應當把這任務擔負起來。（甲）在今天，客觀現實對於思想文化運動，不僅要求它負起提高民族意識的任務，而且要求它適應着新中國建設的需要，提供新的內容，因爲舊有的傳統的毒惡意識，外來的空洞的數條公式，都已不適於今天全民動員的高度的政治實踐，現在需要迎接世界上一切進步的思想，一切進步的文

化與科學，並究明中國的歷史與傳統，來作批判地吸收，在真理與實踐的面前，使中國的文化變成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新東西，把當前的一切具體問題都變成「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因此，「理論現實化，學術中國化」差不多成了中國文化運動的當前急務。（乙）為了防阻侵略者的分化中華民族，為了動員全國人民的參加抗戰，在文化方面還須展開通俗大衆化的運動，前者對於中國文化的要求是質的提高，後者的要求乃是量的擴大，在今天的中國，這兩者都是同樣重要的工作，任何一個都不能加以忽略。而且通俗化是啓蒙運動的主要形式，在中國文化方面，自從九·一八國難發生之後，就已逐漸展開，但它都沒有被新啓蒙運動者所特別注意，而在今天，我們却不能不特別加以強調，並與以推進。以上四點，正如它們在抗戰前是互相連帶貫通的一樣，在今天它們的關係也還是互相連帶貫通的，不能孤立地分開來看，不過在現階段的內容比較抗戰之前是更加具體了，更加深化了，而且在任務的執行上，前後也還有多少的不同，這由前後所提出的具體的口號的不同就可以看出，前者的主要口號是「思想自由」而後者的主要口號乃是「中國化。」這不但說明了現階段的文化運動確是前一階段的具體發展，而且也證明了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已走上了建設的大道。

# 中日戰爭之政略與戰略問題

周恩來

——一個報告大綱——

## 緒言

戰爭是政策的繼續，因此，戰略是服從政略的，兩國政策敵對的發展到最高階段，便要發生戰爭，於是政略與戰略的關係更爲密切，戰略的成敗，必然影響政略。

## 一 日本方面

(一) 日本侵華政策的歷史階段

吞併中國獨霸東亞是日本侵華之一貫的國策——尤其是日本軍閥所奉爲唯一的國策，這是從日本明治大帝遺策一直發展到現在的。

1. 甲午戰後爲第一個階段，實施以華制華的分裂政策；
2. 九一八起爲第二個階段，實施不戰而勝中國的蠶食政策；

3. 七七事變起為第三個階段，實施一戰而勝中國的鯨吞政策。

上述政策雖有各個階段之不同，但基本的政策即國策是一貫的，所以配合這些政策在各方面也有各階段之不同：

甲 對華方面

第一階段，是以經濟侵略為主——在中國便發生以抵貨為主的運動；

第二階段，是以政治變態為主——在中國便發生不承認偽滿及冀東察北偽政權以抗日的政治鬥爭為主的救亡運動；

第三階段，是以軍事侵略為主——在中國便發生抗戰。

乙 對內方面

第一階段，獎勵資本外流——於是經濟發展，財閥形成，引起軍人嫉視；

第二階段，特務機關活躍——軍人暴戾，殘殺大臣，引起財閥反抗；

第三階段，海陸空軍聯合行動——軍閥專政，財閥附庸，引起人民不滿。

丙 對外政策

第一階段，與各國競爭——引起九國公約限制日本發展；

第二階段，排斥各國在華利益——造成與各國漸趨對立；

第三階段，企圖獨霸東亞——引起各國反對。

(二) 日本侵華的軍事政策

第一階段為發展國力時期——目的在與列強齊驅；

第二階段爲加強國力時期——目的在超過東方任何一國；

第三階段爲使用國力時期——目的在迅速征服中國。利用中國國力，稱霸東亞，準備太平洋大戰，但結果變爲消耗國力。

### (三) 日本侵華戰爭之戰略方針

依據其國策及一般的政策，日本侵華的戰略方針無疑的是速戰速決，實現此戰略的條件有三：

1. 殲滅主力——主要的依靠正面火力殺傷，以削弱我之主力，而後依靠迂迴包圍我之主力，以圖殲滅；
2. 佔領土地——奪取大城市，經濟封鎖；
3. 喪失我方戰鬥意志——製造偽政權，孤立我國，挑撥我國內鬨，散佈和平空氣。

但一期作戰證明這一方針是失敗了。何以故？因爲：

1. 基本上日本對自己的認識不足，對我估計錯誤。
2. 日本雖強，但小，本錢不足，又多捨不得用；我雖弱而大，人口多，日本志在保存主力，繼續戰鬥，故日本喪失我戰鬥力的企圖未能做成；

3. 我土地大，日本佔不了多少，只爲點與綫，且我又爲農業國，雖失城多，仍能自給，外路仍通，經濟雖封鎖，而日本自己亦急於通商。

4. 敵人太野蠻、退化、殘暴，上下交征利，故所造成之傀儡漢奸少作用；我統一團結愈堅，民族日益覺悟，和平空氣難成功，國際並未孤立，外援雖少但日增。

日本速戰速決之方針既告失敗，他是否有長期作戰的決心呢？即使他口中在講，紙上在寫，但決心仍然不夠，而且

他也不會如此，因為：

1. 不願在中國消耗太多；
2. 急於要消化在華所得；
3. 趕緊要準備世界大戰，企圖在此次大戰前或開始後能結束對華戰爭。

故繼續的是速和速結的方針，這個方針是速戰速決方針之繼續；不過也遭到我們最高領袖之嚴詞駁斥而無法實現，於是影響敵人不得不考慮其政策之改變。

(四) 日本侵華的新政策——全面侵略之展開

這個政策是其第三階段之一戰而勝中國的政策之補充與發展，並非已經推翻了第三階段之政策而成爲長期戰爭的政策，這在日本還不敢採取——全面侵略，在過去四五個月，正在這裏試行：

1. 軍事方面，掃蕩重於進攻；
2. 經濟方面，開發重於封鎖；
3. 政治方面，利用挑撥兼施；
4. 精神方面，懷柔重於殘暴。

總之以經營敵後爲主，想利用中國的人力物力財力來打中國。

(五) 日本的國際政策——分化重於對立

1. 對英軟硬兼施；
2. 對美拉攏；

3. 對蘇緩和；
4. 對法威脅；
5. 對德意利用策應。

一句話，想以國際形勢孤立我們，東方事情都經過他。

(六) 日本的新進攻——這表現他的政策的變動性投機性與矛盾性。

日本實施上述政策不是一成不變的，因其：

1. 目的仍在一戰而勝中國；
2. 中心在全面侵略；
3. 國際形勢在急變中，刺激他投機與配合行動；
4. 國內的意見分歧，有三種政策（1. 停止進攻，經營敵後；2. 繼續進攻，直到西北西南；3. 重視敵後經營，同時還不放棄進攻或相機進攻）的相互爭鬥。結果目前採取了調和政策，於是有南昌的試攻，這其中包含了軍事佔領，政治打擊，經濟緊縮，交通切斷諸意義。

估計今後日本進攻的方向：

1. 長江流域之四個方面；
2. 西北方面；
3. 西南方面；

估計日本進攻新態之根據：



1. 在有利條件下——我有弱點暴露，他之損傷不大；
2. 在必要條件下——他認為與其全面侵略有必要；
3. 與德意行動配合策應；
4. 最主要的還是日本之兵力變動與增加。

總之，日本是走一步看一步，這就是暴露了日本之基本弱點——兵力不夠，以形成其政策的投機性與矛盾性。但其政策雖在試行的變動中，然其基本政策——吞併中國獨霸東亞及侵華階段中之一戰而勝中國的政策，仍為一貫之脈絡，並未改變，且更加深，不過這是全面侵略之展開，政治重於軍事。因此，這其中有否向侵華的新階段轉變的可能，請論前途問題：

#### (七) 日本侵華政策之前途：

論前途必須先論日本之企圖及其實現的可能性如何，日本之企圖：

1. 軍事上速戰速決——失敗了；
2. 發展為速和速結——我們拒絕了，不上當；
3. 於是展開全面侵略——想爭取上着，爭取優勢，壓迫我們，戰勝我們，（這包含大戰發生前後的猛烈進攻）——這總的政策，仍是一戰而勝中國，即是說這一階段，仍是軍事為主。

雖然已進入政治重於軍事，但仍企圖以戰爭結束戰局。然而我們如果不讓，而爭取有利於我們的時期到來，即相持階段以準備反攻，則日本的企圖便無法實現，今天正在這一鬥爭的開始時期，一般的說，日本目前這一企圖，完全實現是沒有可能的，條件是戰不完，和不下，故戰局不會結束。但是因為這是複雜的情況，複雜的鬥爭，有可能兩個目的

兩種可能都未完全達到，而進入第三種可能，即是不戰不和局面。日本實現這個局面的條件可能有

1. 前綫拖住了我們交通要道，後方有相當可統治的區域；
2. 傀儡政權合流，甚至變一變形，亦用國民政府的名義與我對立，偽軍有相當發展；
3. 經濟上控制我們全部海口及對外貿易，並引誘我們一部分經濟漢奸與他合作；
4. 國際上利用各國無暇多問東亞戰爭之時機；
5. 精神上復古並污辱中國民族文化，甚至三民主義來欺騙。

如果實現這個局面，將成爲日本侵華之政略的第四階段，而其政策爲不戰不和，正面停止進攻，專營已佔地區，以企圖迫我偏安，困我內地，等待世界大戰發生，可以再戰降我，這樣便不是完全有利於我的相持局面，而是日本所造的局面，當然，這一局面實現的可能性極小，但主要的還決定於雙方之戰鬥，因此，目前日本是在展開全面侵略，如不能達到預期目的，他便將會轉入不戰不和之侵華政策的新階段，而我們則不僅不能容許不戰不和局面之到來，並且連全面戰略之展開，亦不容其有任何成功，爭取有利於我之相持局面到來，以準備反攻，而埋葬起日本侵華之第三階段。

因此，目前正處在過渡階段上，而日本新政策是包含着兩種前途的，或者被我們擊敗，或者轉入新的局面。

總結日本的政略戰略，在總的路綫上，日本的吞併中國，獨霸東亞之基本國策，是冒險的，這猶之德義一樣。且因他國小人少，物產不豐，歷史不長，樹敵太多，成爲更加冒險的國策。但日本利用時機，利用我之弱點，利用國際形勢，利用他的軍事優勢，常常變動其政策與戰略，故不會一下失敗，也不甘於失敗，且更在爭取有利於他的改變。

不過不論怎樣，他之政策及戰略，均常有變動性即不定性，矛盾性，投機性。這在與其冒險的國策同具有失敗的因素。只要我們堅持抗戰到底之國策，一定能使日本的任何企圖任何改變歸於失敗的。

## 二 我們方面

(一) 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三個階段

1. 九一八以前民族運動與民權運動——推翻滿清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幫手，對外是向多方面進行鬥爭的。

2. 九一八後——反日的政治運動——統一與抗日運動走向合流——對外已是專一的，但是曲折與錯雜的結果造成和平統一團結禦侮。

3. 七七事變後——統一抗戰堅持到底，這個國策的限度：

1. 日本侵略戰爭失敗；

2. 中華民族復興。

達到抗戰建國的目標，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這個口號的具體內容正如 委員長所指出：

『我們要認識抗戰勝利以後所建立起來的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一定是一國後來居上的新國家，是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而且用以供獻於世界人類福祉的最澈底的進步國家。』（二十八年四月七日廣播）

(二) 我們抗戰的政略與戰略

在抗戰到底的國策下，我們的政策是：

1. 持久抗戰——時間；

2. 全面戰爭（全民戰爭）——空間與人民；

3. 爭取主動——自力更生，主動外交。

在此政策下的戰略方針：

1. 持久戰——擊破日本的速戰速決，速和速結；

2. 消耗戰——擊破日本的爭取優勢，爭取上着。

但持久戰不是拖下去，而是打下去！消耗戰不是自己亂拚，而是消耗日本！

(三) 我們三期抗戰的政略與戰略重心

1. 展開全面戰爭——動員全體人民，動員前後方，動員全綫，使用全力，統一意志，統一力量。

2. 重視敵後——政治重於軍事，精神重於物質，游擊戰重於正規戰，宣傳重於作戰，民衆重於士兵，節約重於生產。

這是一個鬥爭，長期的鬥爭，艱難的鬥爭，針對着日本的新政策，「現在是抗戰劇烈千金一刻的時期，不容我們再作任何的空論空想，不容我們荒廢一分的光陰和精力。」（見 委員長廿八年四月十七日廣播） 委員長爲什麼這樣說？因爲「……越到接近勝利時，我們的環境必然更艱難，更困苦，更危險。」（同上）因此，我們必須以具體的鬥爭與日本進行劇烈的抗戰，不容他的企圖實現。

(四) 展開各方面鬥爭——展開全面戰爭與重視敵後。

一、精神方面的動員——這是基本的。 委員長說：「我們這一次抗戰，要擊退敵人，要建國成功，一大半要發揮我們民族每個份子的精神力量。」（同上）怎樣進行精神動員？ 委員長又說：「我們應該準對着當前的強敵，正視國家的艱危，嚴重反省我們的責任，切實檢討我們一切缺點和弱點，一方面迅速確實的來改造自身，以身作則，同時，提挈着我們全國的同胞，幫助我還沒有省悟的同胞，喚起我們一般智識水準較低的同胞，一致奮起，改正醉生夢死自暴自

樂的生活，養成奮發蓬勃積極進取的朝氣，革除苟且偷生，陽奉陰違的習性。打破自私自利投降屈服的企圖，糾正紛歧錯雜誤國自誤的思想，緊張我們的情緒，統一我們的行動，使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充實起來，集中起來，真正做到舉國一致的精神總動員，發揮這個「至大至剛」的精神力量，來完成我們這一輩繼往開來千載一時的使命。」（同上）

據此，精神總動員的具體工作應該是：

1. 反對妥協投降的企圖；
  2. 反對苟安和平的習性與生活；
  3. 反對違反抗戰建國利益的錯誤思想；
  4. 反對只說不做的空談與脫離抗戰實際的空想；
  5. 實行精神總動員與國民公約之宣誓；
  6. 發揚民族文化與優美傳統；
  7. 喚起民衆——面向而且着重廣大的還沒有省悟與知識水準較低的民衆；
  8. 加緊團結——對準強敵，正視國難，反省責任，檢討錯誤。
- 二、軍事方面：

1. 正面戰鬥——以運動戰為主，避開正面決戰，給敵步步殺傷，與敵對戰對攻；
  2. 後方準備——以造成陣地戰能力，建立國防軍，使之機械化，近代化；
  2. 敵後深入——以游擊戰為主；
- 甲，建立戰略外綫之游擊根據地；

乙，部隊的組訓——以政治工作為主，造成人人是戰鬥者，也是政治工作者；

丙，戰術的活用——糾纏作戰，決不退縮，積小勝為大勝；

丁，技術的準備——如射擊、爬山、泗水、跳躍、爬行、水戰、騎兵戰、夜戰、爆炸、火攻、拆卸機器、開汽車、汽船、划船、偽裝等。

### 三、經濟方面：

#### 1. 積極生產——自給自足：

甲，建立重工業基礎——軍事工業，鐵礦生產，化學工業等——在各戰區應特別注意收集材料，保護機器，開發

原料。

乙，發展後方交通——各戰區亦應有後方，前綫亦應開闢小道；

丙，發展小手工業——各省各地都應做，廣泛做，按地方條件做；

丁，增加農業生產——要依各地情況自做，並由部隊協助；

戊，提倡合作事業，要做成官督民辦。

#### 2. 節約運動：

甲，抵貨要成運動，要普遍徹底，一切可疑外貨均不用；

乙，大量用代用品；

丙，難買者節用；

丁，可省者又買不到者不用。

#### 3. 破壞對方經濟：

甲，封鎖要有條件，有配合，重檢查與羣衆的發動；

乙，破壞交通，要經常澈底；

丙，破壞礦山工作，要成爲必要工作；

丁，不用偽券，不繳捐稅，不賣給對方糧食原料，要成爲家庭運動。

#### 四，政治方面：

##### 1. 鞏固自己：

甲，統一領導——避免重複，減少層次，減少手續，貫徹主張；

乙，健全地方——健全縣政，改善保甲，加強鄉政，訓練四橫；

丙，恢復與保護戰區地方政權；

丁，肅清漢奸與爭取兩面派。

##### 3. 破壞對方：

甲，推翻敵偽政權——分化之各個擊破；

乙，瓦解偽軍——不使成軍，不使擴大，不使起作用；

丙，動搖敵軍——由顯戰而反戰；

丁，爭取朝鮮台灣人民。

##### 3. 擴大陣綫：

甲，加強國際活動；

乙，促進集體制裁。

國際的結合要從原則上來認識：

一，原則相同，利害相同，才易結合；

二，不能捨己從人，投井救人，故國際同情援助是有限度的；但也能增長的，主要的要看我們自己努力。

(五) 爭取勝利的前途

1. 鬥爭的重心在敵後，在不讓對方利用我們人力物力財力來打我們；

2. 鬥爭的方面在全面，也不讓對方轉入不戰不和的階段；

3. 要爭取我們勝利的相持階段，準備反攻，轉弱為強，反守為攻，轉敗為勝，達到我們政略戰略的要求；

4. 但這是持久的，長期的——我們要堅持；必須是全面的全民的——我們要發動；必須是主動的自主的——我

們要爭取，並且要經過困苦艱難險阻，我們不僅要忍受困苦（仁）而且要克服困難（智）不怕險阻（勇）才能達到最後勝利。

廿八年四月十八——十九日於南嶽



## 第二期抗戰與學校教育

黃達三

### 一、我國新教育之本質

立基於經濟關係上的所謂上層組織之一的教育制度，其性能伴隨着經濟形態一同發展，而受其控制，這是必然的。歷史上的教育改革，都不能逃出這個規律。治術教育和武士教育是為適應封建的農業與小工藝經濟的；公民教育與職業教育，則是由近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基土上生長出來的。從十九世紀末期，西歐各資本主義先進國的經濟魔力一步步向我國壓來，刺激我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因之為適應往時經濟組織的舊教育系統——科學與書院——已感覺不能適應，於是伴隨着機械的輸入，也販來了新教育制度。畢竟在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支配之下，使我國的資本主義化走上歪曲的半殖民地的特殊道路，因之使我國的資本主義的新教育制度也滯塞在中途。我們所叫出的學校教育與社會脫節的痛苦呼聲，就是在這打擊下所產生的病症。一個在常態的客觀社會條件之下且失掉健康的教育制度，其不能適合於戰時是必然的。不主張變更現行教育制度的學者與教育家，所顧慮的是文化根源與抗戰後的建設任務。固然這些是絕不能忽視而且須特加重視的；但依據現行教育制度，是否全部都是能達成這目的？所以即是為着文化根源與抗戰後的建設任務，也不能不改革現行教育制度——即模仿高度資本主義化

的美國教育制度——其本質與我國半殖民地的社會需要根本上是不相適合的。它負不起中華民族的文化根源與抗戰後的建設的任務；它更負不起抗戰的任務。

## 二 第一期抗戰時期學校教育之檢討

在抗日戰爭發動後，各級學校都受着戰爭的震盪，報紙上戰爭的標題與驚人的戰訊，其吸引力遠非教科書所能比擬；教師們聲嘶力竭的喊聲也遠不如飛機和炸彈響聲的動聽。無論學校的管理與作業，都呈着鬆懈與紊亂的現象。學生們的整個注意都朝向戰爭，尤其是青年學生，每個都想對祖國偉大的抗戰貢獻些什麼；每個都感覺舊的課程不能替他們解答目前的嚴重的抗戰問題。他們在悵惘，在彷徨：

「沒有了民族國家，英文數學有什麼用處？」

「學校生活太沉悶了，只有前線才是熱烈的，美麗的啊！」

於是勇敢的，遂瞞着家庭，脫離學校，走上前線去了。這一事實，報紙早為我們證明。沒有走的，則仍然留在學校渡着監獄般苦痛的生活。

教師則因着學生對學科失掉興趣，在課堂既不能引起學生注意去進行學習，在課外也不能指導學生活動以增進師生的了解。因此教師與學生之間，發生一種分離的現象。教師們也感覺用一種學生不願聽，自己不願講的舊教材去進行教學，實是一種滑稽的場面。而上課的時間，則是教師與學生共同受苦的時間。

因着上述的原因，於是影響到學生的學習能力，影響到學生的日常生活，影響到學生的健康，影響到學校的秩序。學校行政遂發生很多的困難與阻礙。

前綫的戰爭愈吃緊，反映於學校的矛盾也愈加深。很多學校當局，曾經企圖用着把學校向僻鄉遷移的方法，以消滅這矛盾；但結果失敗了，矛盾不但沒有減低，却反而增劇了。在未會淪陷的區域的已遷移的學校的學生，常喊出回到都市，遷回原校的口號，可作這一事實的證明。因為他們遷到鄉間，並沒有因之把他們的抗戰工作開展，他們依然束縛在舊的課程的枷鎖上。而消息的閉塞，更顯出他們與抗戰的隔離，更增進他們茫然之感，而加重他們的痛苦。

對於適應抗戰的課程的增加，與救亡活動的參與，各學校不能說完全沒有。並且一般學校都或多或少的做了些。但問題是在於不夠，還不夠配合抗戰與抗戰時期的學生的兩方面的需要。

### 三 第二期抗戰學校教育應有的改進

本來現行教育制度之應加改革，在國民黨的臨全大會所決定的抗戰建國綱領中，即已明確的規定，但沒有擬出具體辦法，充分的加以實行。我們由於對第一期抗戰的檢討中所認識的錯誤，必須加倍努力，設法補救，以增加抗戰的實力。現行教育制度之不能適合我國社會需要與第一期抗戰時期學校教育改革之不够配合抗戰，上面已經說過，現在艱鉅的第二期抗戰，正在進行，我們再不能懈怠，讓學校教育與抗戰脫節，因而削弱抗戰的力量。茲就學校教育之目標、學科、方法各端，在配合第二期抗戰上應有之改進加以分述：

甲、目標方面——三民主義現在已為全學公認的建設新中國的唯一目標，教育目標自然也應伴隨着政治目標前進。這點在十八年四月國民政府公佈的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即現行教育宗旨——上即已把這精神充分的表現。其文曰：「中華民國之教舉，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所有各級學校的目標，都是根據這宗旨演繹出來的。但這些雖然

適合於平時，却沒有包含「戰時」的要素。在民族主義方面講：縱然在宗旨上廣泛的包含了民族主義，在各級學校的目標上却沒有具體的提示保衛民族的方法。即在宗旨上縱有所謂「延續民族生命」與「務期民族獨立」的字句，而在各級學校的目標上，並沒有列出具體的可以適應領土半失，敵兵深入，國運危殆的拯救民族的切實辦法。換言之，即是沒有抗戰的性能。所以我們在第二期抗戰中的教育目標，應特別着重這「抗戰」的性能，學校教育應直接以抗戰為標的，不應再是空泛的民族主義的口號，而應是保衛民族國家的具體行動——抗戰。這是目標上應改進的第一點。

在民權主義方面講，戰時也異於平時。即在戰時學校教育的民權主義的目標，不僅在養成學生行使民權的知識和習慣，並且還要充分地培養其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的能力與熱情，藉以幫助抗戰。這是目標上應改進的第二點。

在民生主義方面講：戰時的一切經濟建設，不能離開抗戰，學校所培養的一切建設人材，都應是與抗戰有關的人材。尤其是以往離開實際社會需要的畸形發展的職業教育，應澈底加以改革。這是目標上應改進的第三點。

以上就是三民主義的教育目標說的。總合起來，即是抗戰建國的教育目標。抗戰建國，在理論上是一致的。所反映於教育目標上的，自然也是一致。即「第二期抗戰中的教育目標應依據三民主義，加強抗戰的性能，直接以抗戰為標的，養成學生行使民權的知識和習慣，以發揮其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的效能，並培養其有關抗戰建設的技能；務期抗戰必勝，建國必成。」

爲補充以上的意見，我們必須再提到軍事訓練與戰鬥意識。

尙武與軍國民教育，曾經在我國新教育的目標上被規定過，但後來因着恐流爲狹隘的國家主義，把它廢除了。十八年公佈的現行教育宗旨，仍然沒有把它列入。不過近年來，尤其是在「九一八」以後，高中以上學校的普遍的軍事

訓練，即含着國軍民教育的實質，但沒有推及一般國民教育。同時除了少數省份外，辦理上也欠認真。現在侵略者的鐵蹄殘暴地壓在我們祖國的胸上，我們必須掀起全民族的武力，以驅逐我們的敵人。因之我們必須加強和擴大我們的軍訓，以培植我們的反侵略的武力。這是目標上應改進的第四點。

僅有身體上的武裝，有戰鬥的技術，還是不夠；我們必須武裝頭腦，有戰鬥的意識，才能算是一個現代的完全的戰鬥員。所以我們必須使每個學生，尤其是青年學生，對着民族革命戰爭與侵略者的殘暴，有着深切的認識與了解，才可以保證他們能夠堅決的奮勇的擔負起革命的任務。這是目標上應改進的第五點。

乙、學科方面——目標確定了，其次的問題就是教材問題。教材是為着實現目標，進行教學時所需的材料。將教材組成系統，即為學科。我國學校內現有的學科，雖然是依據目標規定的，然而有很多却是不合社會需要。譬如初等學校的筆算，中等學校的外國文等，都是耗費了學生很大的精力，而很多學生却沒有把它應用的。有些則是因為學科的分配時間的多寡不適當，或取材的不健全，而致不能實現目標的。這些問題太多，太複雜，現在不想多談，我們只要明瞭現有學校的學科並不是怎樣的天經地義，而把它改革並不怎樣影響文化根源，有時為着文化根源反而必須加以改革就夠了。目前我們必須提到的，僅是為着配合第二期抗戰，學科上究竟應有些怎樣的改革。

抗戰建國與三民主義，既是我們配合第二期抗戰的教育目標，我們的學科自然應是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在學科的種類上講，凡是為抗戰建國所必需的我們應設法增設，如軍訓、看護、宣傳技術、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之方法等。凡是與抗戰建國無關的我們應把它廢除或減輕。即如上面所提過的初等學校的筆算，與初級中學的外國文等即是一例。在學科時間的分配上講，我們應加重社會科學與應用科學或技術訓練的分量，以便增進學生的戰鬥意識與生產技能。在取材上講，我們應側重現代的與實用的，而減少古代的與理論的。譬如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應側重防毒、救護、生

產、交通、軍事等有關之實驗與知識。社會科學方面，我們應重述百年史，各帝國主義侵華史，別國與我國的革命史，我國的疆域與邊疆問題，領土喪失的情形，各地鑛藏、出產、人口、交通、何地適宜游擊戰，國家民族與個人之關係，國際情狀，世界大勢，服兵役，助傷兵，除漢奸等有關之知識。至於應用科學或技術訓練，則須完全依據國防生產軍事需要而實施。

丙、方法方面——學科既是實現目標的手段，方法則是運用手段的技術與過程（不過在新的教學法上講，有些方法是直接實現目標的，而教材則是方法的資料）上面我們已經提出了很多為適應第二期抗戰的學科與教材，我們要運用這些新的學科與教材，那我們就必須配合新的方法：

第一創設以抗戰建國為大單元的設計。就是一切活動以抗戰建國為中心，從這單元出發，讓學生自動計劃從事各種學習活動。

第二儘量參入社會活動。社會上的一切救亡活動，學生應成爲一個重要的組織單位，要把這些活動視作重要的課程，要把社會看作是比學校更好的學習場所。

第三由學生自動的團體生活，養成自治，真的自治精神，自治習慣，絕不能由被動的管理，或教條式的訓練所能養成的。必須在學生自己的合理的團體生活中方可養成。抗戰建國中所需要的幹部與國民，也必須是真的有自治能力，尤其是知道爭取自治權利的人。使用新的教材，實現新的目標，也必須在自發自律的形式下才可以做到。

第四使學生從實際工作中去體驗理論與獲得知識。只有在工作中所獲得的知識，才是真切的最有價值的知識；在工作中由體驗而認識的理論，才是堅定的透澈的理論。所謂「教學做合一」在學習上已成爲大家公認的最有效的方法。我們所期望的能擔負抗戰建國責任的健全分子，也必須是在這種方法上教育出來的實行者，而絕不是空談而不能實行的空論家。

## 四 結論

第二期抗戰是中華民族的生死關頭，縱然最後勝利有必定的把握，但也必須在艱苦的爭奪之下才能肯定；我們不能說勝利可以坐待，而且必須有效地發動全民的力量，把各種社會組織的機構，以配合軍事，充實我們的抗戰實力，我們才可以擊敗敵人。最後勝利的必然把握，完全建築在這一基礎上。否則，我們還有被敵人征服的危險。教育這一部門，是潛伏着很大的力量的；在戰時，我們好好地把它運用，無疑的可以發生很大的效用。否則，它也可以牽制抗戰。並且我們應明瞭抗戰的工作，本身也即是教育的過程。把教育與抗戰結合起來，教育即是抗戰。而抗戰也即是教育。現代弱小民族的人民，任何活動，都要帶着強調的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者戰鬥的使命，我們才能說那活動有意義，教育自然不能例外。現在已不是太平時代，我們絕不能否定現實鐵一般的事實，教育界的同人，必須面對着戰鬥而英勇地參加，以拯救民族國家的危亡，才算沒有辜負神聖事業的使命。

# 國際反侵略反法西斯鬥爭

曼努伊爾斯基

本文爲聯共駐國際代表團向聯共十八屆代表大會的報告，共分三節：（一）國際形勢的變化；（二）各國共黨爲統一戰線和人民陣線而鬥爭；（三）資本主義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第三節中又分爲三小題：（A）共黨戰術的若干問題；（B）各國共黨現況；（C）各國共黨，無產階級和勞動大眾底鬥爭路線。報告的末尾對於二十年來依循史太林的道路前進的共產國際的鬥爭作了一個簡略的總結。這裏發表的僅是報告的一節。

——譯者

## 一 國際形勢的變化

同志們！

在聯共（布）十七次大會和十八次大會之間的，過去這五年以內，在各階級，各民族，各國家底生活上發生了好些重要的變化。這些變化證明了資本主義體系底各種矛盾底尖銳化，證明了社會主義世界和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鴻溝底加深。

史太林同志在他的，爲本黨和全國勞動者所日夜期待的，爲蘇聯的一切朋友和仇敵所日夜期待的，歷史意義的報告中，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又給了最寶貴的貢獻，對於國際形勢做了無比地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



分析，對於我們國內的社會主義發展做了詳細完備的總結，在蘇維埃人民面前，由於他們的社會主義勝利的結果，展開了巨大的遠景。史太林同志指示出，蘇聯在解決了無產階級專政最困難的任務——完全消滅剝削者階級，把數百萬私人的農民經營吸引入社會主義體系——之後，是怎樣大踏步地前進了。他指示出在這幾年以內，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是怎樣不斷地發達了，勞動者底物質的和文化的水準是怎樣不斷地提高了，蘇聯境內各民族底友誼是怎樣凝固了，在蘇維埃國度內，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是怎樣繁榮起來了，蘇維埃人民底道德的和政治的統一，是怎樣的鞏固了，蘇維埃國度底威勢和國防能力是怎樣的增大了（鼓掌）。

史太林同志指示出，蘇聯的賢明的和平政策，再加上保衛蘇維埃國境的決心，加上無情地摧毀了托洛茨基·布哈林派的奸細和戰爭挑撥者的匪徒隊伍——這不僅符合蘇維埃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符合各國人民的利益。

史太林同志的報告是歷史的里程碑。這個里程碑標明蘇聯已經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進入了建設無階級社會的完成階段和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入共產主義的階段。而且蘇聯底這一個巨大的勝利是具有全世界的歷史意義的事件。這勝利加強了資本主義各國的勞動大眾底革命化，引起了世界反動勢力對於蘇聯的惶恐；因為這國度衝破了資本主義包圍的一切陰謀詭計，正在實現第三屆的史太林五年計劃，而這計劃正是代表着走向共產主義的完全勝利的巨大步驟。

## 二 過去五年內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發生了什麼？

還在十七屆黨代表大會上，史太林同志在分析了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狀況之後，曾經說過，在一九二九年——

九三三年經濟危機以後開始的經濟蕭條不是普通的經濟蕭條，而是「特殊種類」的蕭條。史太林同志在檢討了國際形勢以後曾經說過，帝國主義矛盾的尖銳化已經安排好了軍事衝突的地盤；局勢是顯然在向新的帝國主義戰爭走去。史太林同志的這一個分析，如今完全被證實了。

資本主義的生產水準經過了一九三二年最衰落的時期以後，在一九三七年中，達到了自己的最高點；可是到一九三八年又低降到了一九二九年水準的九一%。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間這一個時期內，生產一共只增加了三·五%；但是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九年這一個週期中，生產的增加有四九·五%。這說明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三年的危機以後開始的蕭條時期，的確是特殊種類的蕭條；在這蕭條之後，既不會發生普遍的發達，也沒有發生工業的繁榮。

在過去的五年中間，資本主義各國勞動大眾底景況是大大地惡化了。資方瘋狂地向勞動大眾底生活水準進攻，這在法西斯蒂獨裁國度裏尤其厲害。工資是猛烈地減低了，工作時間是增加了。例如，在德國，主要的飲食品的零售價格雖則上漲得很厲害，但是自從成立法西斯蒂獨裁以後，工資方面便禁止有任何的增加；同時法西斯蒂政府所規定的各種強制的捐款却達到了工資的二五——三〇%。法律規定了十小時的工作日，但是在重要的工業部份中，就是在一切軍事工業部門和一切要塞工程中，都實施十四小時的工作日。在所謂的「勞動服役」營中，有數十萬青年在做工，他們只吃一點液體飲食，拿五〇分尼一天，在法西斯蒂的意大利，自從法西斯蒂獨裁以來，大眾的生活水準差不多減了一半。自從阿比西尼亞戰爭以來，所有主要的飲食品的消費大大地減少了。在日本工作時間達到一二小時至一六小時，而且把一九二九年時的貧乏的工資率又再減低了一六%，雖則生活費用在這時期內已經增加了三〇——

四〇%。

在過去五年以內，失業工人人數從沒有低過一、五〇〇萬，可是到一九三八年年底又達到一、八〇〇萬了；而且這數目中還沒有包括無數失業的僱農，局部的失業者 and 居住着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半人口的印度、中國等類國度的失業者。

再度尖銳化起來的農業危機，特別是在美國、波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匈牙利以及殖民地各國內，引起了農村的更大的分化，使數百萬的農民變成了赤貧。同時都市的小資產者也加速地破產了，這在法西斯蒂國度內尤其厲害。在這裏有好幾萬的小規模的工商企業沒落了。在日本，僅僅一九三八年一年間，就有八八、三〇五家小企業因缺乏原料而停閉了。

經濟危機加強了資本主義各國發展底不平衡性，擴大了資本主義總危機底深度；這結果使得各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原來存在着的一切矛盾極端地尖銳化起來了。爭奪國外市場，爭奪勢力範圍，爭奪殖民地，以及爭取世界重分割的鬥爭也尖銳化起來了。這鬥爭在地中海和太平洋沿岸，在拉丁美洲，在東南歐，在南歐，在主要的國際交通線上，尖銳到了極點。

德、意、日三個法西斯蒂國家在國際間開始進攻了。法西斯蒂統治者想用掠奪其它民族來挽救自己的事業，來克服法西斯蒂制度的內部困難，來阻止這制度的破產。法西斯蒂的統治者們需要戰爭，因為他們沒有能力執行自己向羣衆說過的煽動性的諾言。對於他們，戰爭是鎮壓羣衆不滿，使羣衆屈服的一種手段。他們需要戰爭，爲了在他們自己黨徒的心目中保持自己的『威信』。

法西斯蒂的冒險家急於發動攻擊，因為他們害怕人民陣綫運動的展開，害怕人民對於法西斯蒂侵略的反抗將要擴大，害怕各民族將聯合起來。團結成爲反對法西斯蒂戰爭挑撥者的國際陣綫。法西斯蒂統治者想在人民大眾皮

有團結起來反抗法西斯主義以前便給他們一個打擊。他們努力分裂各民族，在各民族之間挑撥離間，以便把它們各個擊破。他們很技巧地利用英法統治階層的妥協奉迎，把後者變成了自己的罪惡行爲中的幫兇。這樣就更使英法統治階層信譽掃地，使他們也蒙受恥辱；而法西斯蒂統治者便利用這種欺詐手段把羣衆對自己的忿怒移轉到別人身上去。

法西斯蒂的統治者意圖利用其他資本主義各國的資產階級對於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的恐懼心，以便利用他們的援助，去攻擊他們本國的人民。爲了達到自己的侵略目的，他們使用收買、欺騙、敲詐、和恐嚇等手段。在把自己的侵略軍派遣到別國領土去以前，他們先把自己的間諜隊散佈到裏面。他們把間諜到處輸送，在美、英、法和其它各國，到處都有。他們在法國豢養了一批法西斯蒂的匪徒們，而且利用他們的手佈置了好幾次的暴炸案。他們在羅馬尼亞組織搗亂後方的匪徒隊伍，實行過好多次恐怖案件；他們在波蘭，進行廣泛的破壞工作，準備分裂這國家；在波羅的海沿岸，在芬蘭，在匈牙利，在斯拉伐克，在巴爾干半島各國，他們組織秘密的武裝隊伍。他們策動內部的「叛亂」——這不僅是在奧國，在蘇台德區，而且在墨西哥，在巴西，在秘魯。

法西斯蒂侵略集團的代理人在英法殖民地進行着最廣泛的破壞工作。他們在巴力斯坦策動叛亂，在印度組織半軍事的「民族義勇團」，在南非洲成立各種法西斯蒂的軍事小組，把軍火和金錢供給阿拉伯各國的封建主。他們到處製造混亂，以便在戰爭暴發前便瓦解並且削弱自己的可能的敵國。

法西斯蒂各國的侵略集團比任何其它國度都希望世界的重分割，它們把各民族推入新的帝國主義大戰中去。在一九三五年意大利侵入阿比西尼亞；在一九三六年德國和意大利開始西班牙的武裝干涉；在一九三七年，日本軍閥從佔領滿洲而進一步發動戰爭，其目的就是佔領全中國，把美英法從中國驅逐出去；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德國佔領

奧國；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德國分割捷克·斯拉伐克。

倘使其它各國的資本主義政府不惹惹德意法西主義和日本法西斯蒂軍閥底侵略，那麼這些事件難道還可能會發生嗎？當然，是不會的。這些事情所以可能發生，是因為世界反動派的力量，法蘭西的，尤其是英吉利的資產階級的反動份子幫助了而且還幫助着法西斯蒂侵略者集團的原故。這些份子抱着一種希望，就是想利用德國法西主義作為反動勢力對付蘇聯的突擊隊，利用德國法西主義作為反對國際工人階級，人民陣線，和被壓迫國民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憲兵。

英國的反動資產階級的計劃在於犧牲東南歐的小國滿足德國法西主義，把德國引到東方去反對蘇聯；企圖用這樣的反革命戰爭去阻撓社會主義的繼續的成功和共產主義的勝利，並且以此作為德國放棄對於英國殖民地的帝國主義要求的交換條件；同時英國的反動派想利用蘇聯的手來敲碎德帝國主義的毒牙，使德國在長時期內陷於衰弱，以便保持英帝國主義在歐洲的統治地位。第二，英國反動派希望犧牲法國，而去同意大利共同瓜分西班牙和地中海的勢力範圍，為了帝國主義的「均勢」，在歐洲同意大利訂立協定，把它從對德同盟中拆開來。第三，在遠東方面，英國的反動者希望瓜分中國。他們如今讓日本來破壞和削弱中國，同時也不阻止日本自己的軍事和經濟的消耗，以便將來以仲裁者資格出場，在遠東也建立「慕尼黑的和局」；第四，英國的反動勢力不願意讓德日意任何一國的法西斯蒂崩潰，願意幫助這些國度挽救自身的財政破產，其方法便是把借款供給這些國度，這樣也就是把法西斯蒂國家在某種限度內放在英帝國主義的束縛之下了。

還在一九二七年，史太林同志在對「現代諸問題的短評」那篇文章中就說過：

「在過去，在現今，以至於在將來，英國資本主義永遠是人民革命的最惡毒的鎮壓者。從十八世紀末的法國

大革命起，到目前正在展開中的中國革命爲止，英國資產階級始終站在，而且還繼續站在人類解放運動底摧殘者隊伍中的最前列……但是，英國資產階級是不歡喜用自己的手作戰的。它最喜歡用人家的手打仗。」

但是，英國的反動資產階級的強盜計劃是在替自己挖掘坟墓。它的秘密地支持日本的對華侵略，就是準備使英國從遠東被排擠出來；它對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讓步，就是使英國失去了地中海的陣地；它以借款供給法西斯蒂侵略者們，就是加強了這些侵略者的軍事勢力，加強了自己失敗的機會；它鞏固德國法西斯主義也就是準備好了英帝國自身的被瓜分；它的襲擊蘇聯的計劃，那就不僅是準備好了法西斯主義底崩潰，而且是準備好了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底崩潰（鼓掌）。

慕尼黑的陰謀就是英國反動資產階級這個狡猾的，然而絕望的計劃在事實上應用的第一個嚴重的企圖。然而慕尼黑的反動的陰謀家們帶給人類的不是和平，而將是新的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他們在慕尼黑，甚至把那個惡液症的歐洲「均勢」都破壞了，這「均勢」在某種限度以內，是曾經限制了法西斯蒂侵略者底侵略計劃的。在德意的壓力之下，跟在英國反動勢力尾巴後面的，法國的反動派用自己的手消滅了自己在一九一四年——一八年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以後，親自建立起來的協約國體系；這樣，他們就是準備把法蘭西降成了二等國。

慕尼黑的陰謀家結束了集體安全制，而且完全把他們自己建立的國際聯盟同歐洲政治和世界政治的重要問題的解決隔絕開了。他們放鬆了侵略者的手，讓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佔領了卡泰龍尼亞，讓日本的法西斯蒂軍人佔領了廣州和海南島，使遠東的英法領土感受了威脅。

慕尼黑的「和平創造者」加強了資本主義各國擴充軍備的狂熱。在慕尼黑會議以後，德意的軍備擴充又有了新的突飛猛進的發展。在德國，自從成立了法西斯蒂獨裁以來，軍事費用已經增加到三二倍。在意大利，軍事費用在阿

比西尼亞戰事期內增加到四倍。在日本，軍事費用比一九三六年——三七年增加到五·五倍以上；在英國是三倍；在法國是三倍以上。

但是法西斯蒂強盜帝國主義要求，遇到了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底反抗；在有些國度，政府雖然已經向法西斯蒂侵略者投降了，但是仍舊遭受到統治階級中的極大一部份人的反抗。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保衛着自己在拉丁美洲各國的利益，反對迅速地向那裏侵入的德意日三國，保衛自己在菲律賓羣島，在中國和在太平洋的陣地，以反對日本，同南美洲各國家結合成為反抗法西斯蒂擴張勢力的集團。這樣，美國也就激勵了世界其它各地——連歐洲在內——對於法西斯蒂侵略計劃的反抗。

在英國——對於帝國完整的擔心（這種完整已受到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威脅）甚至推動了帝國主義圈子中的一部份人，如像古柏，艾登，邱吉爾之流的人物，走向現在的保守黨政府的反對黨的陣營中去。德意法西斯主義的侵略要求恐嚇了一部份法國的資產階級，並且加強了反法西斯陣營的勢力。在波蘭，面對着德國將分裂該國的威脅，不安的空氣在擴大着。在匈牙利，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束縛的勢力是在增強起來。

同時，在法西斯蒂侵略者奴役下的，捷克斯拉伐克和奧大利的人民大眾的忿恨是在增長着；在法西斯蒂侵略下的巴爾干各國人民底戒心是增加了。殖民地的人民不願意成為帝國主義強盜買賣中找頭錢；在那裏，反抗的運動是在加強起來。在那些受有法西斯蒂侵入的威脅的國度裏，人民陣線的份子是在增加起來。

同志們！因此，在過去五年中，在勝利的社會主義和寄生的腐化的資本主義之間的鴻溝，是更加深了。蘇聯是在上

升，走向無階級社會的最高點，走向共產主義去。資本主義是在沒落，走向經濟危機，走向反動，走向戰爭的路上去。這就是說，資本主義體系底總危機是更加加深了。而且資本主義愈是陷入於矛盾，那麼它就愈要採取那些絕望的手段，以便掙扎着擺脫這局勢。因此，資本主義對勞動者的進攻是加強了；法西斯蒂的恐怖是加強了；法西主義在國際舞台上便轉向進攻。因此，就要發生帝國主義大戰。因此，對於社會主義國度，外國的武力攻擊的威脅是增加了；而在資本主義各國的千百萬勞動大眾的意識中，社會主義國度作為和平堡壘的意義，作為抵抗帝國主義侵略和抵抗戰爭的堡壘的意義便大大地增加了。



# 帝國主義者的出路？

John Strachey 原著  
馬寶星 譯

——譯自 John Strachey 所著“Hope In America”一書——

「讓我們將貨物輸運出去！」

各種國家的老闆們，主要的尤其是英國的老闆們，對「誰是貨品的購買者」這一個問題總是這樣回答說：「假如這些貨物，因着國內人民的工資低少以致無力購買的緣故而銷售不掉，那麼，就讓我們到國外去想辦法；讓我們將過剩的貨物運到外國去銷。」

這雖是一個很單純的回答，可是這引起了許多極端複雜的後果。這把世界導入了一個狂熱的爭取市場的紛擾狀態中去。首先，一般老闆們就要想從整個的世界中去覓取銷售消費品的市場。他們要想將自己所生產的大量的食品、衣料、傢具、汽車以及其他種種東西賣給外國的顧客。但是在目前，工業各部門的內在機能正呈露着反常的現象，這不僅是指一般的消費品而言，就是生產手段的本身也是如此。有許多工廠正專門爲了別的工業的裝設事情而工作着。有許多種類的機器被製造出來，唯一的目的就是爲了要製造別的許多不同的機器。確實的，在今日表現反常的姿態的最最鉅大的和重要的工業倒不是消費手段，而是生產手段。

所以，很容易的看出這是一個海外市場的問題，並且這市場的爭取不只是爲了消費品的銷售，並且是爲了生產手段的出賣；不祇是爲了棉花、小麥、汽車、打字機以及這一類的東西，而且是爲了織機、紡錘、車牀、起重機、機械器具、鼓風

但是上面一類的生產手段是很貴的。叫那些外國人民怎樣買得起？而且從許多例子看來，一般潛力雄厚的市場又位於一些相當落後和不大發展的地方，如印度、中國或是非洲等地。那裏的人民怎樣拿得出錢去買那些價格昂貴的生產手段？

廣  
泛  
的  
擴  
展

於是資本家們想出了一條超特的計謀。許多老闆們以及他們的夥伴們將錢借給那一些消費者，叫他們去買那些生產手段。這就是所謂資本的輸出。因而市場的覓求可以說經過三個階段：第一是消費品的輸出，其次是生產手段的輸出，最後是資本本身的輸出。

當第三階段——即資本本身的輸出——到來時，第四階段也可能的跟着出現，那就是資本家將資金投入於海外國家的生產事業中去的一個時期。資本家的輸出资本，不單單爲了要借錢給人去購買從自國輸出的生產手段，并且是爲了要想在國外建立一種工業去從事鑛產的開產，或是橡皮的種植等事業。那些資本家更可以隨意的在非洲或亞洲去樹立現存的經濟體系。

上述各階段的準確的發展和劃分並不是一件極端值得重視的事情。而最主要的，就是我們要注意到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都是被迫的進行着一種廣泛複雜的經濟侵略的現象。每一國家，當她到達某一發達的階段的時候，除非在這基本問題——『誰是貨品的購買者』——找出別的答案來，總是被逼的去向外謀擴展的。

固然，向海外謀擴展能暫時解決了上面的基本問題，將現階段的經濟制度的喘息生命延長了一個時期。可是終究產生了極度困難的結果。

我們從上面的許多話中僅能看到資本家的侵略步驟的經濟一面，這還有政治的一面，這政治的一面有一個很

熟悉的名詞，就是帝國主義。

### 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就是這樣產生的：在第一個階段——僅僅輸出消費品的當兒，還沒有怎樣大的足以引誘資本家去侵略商品輸入國的因素的存在。但是跟着不久，便開始了第二第三階段——即生產手段和資本的輸出階段；在這二個階段裏，讓我們來看一看有什麼變動發生。

在那時候，（即到達第二第三階段的時候——譯者）資本家們立刻爲着自己的資本的安全問題担起憂來，無論將錢借給那個人，或是某一個不發達地方的政府，或是某些比較落後地方的土著所組織的公司，甚至於將錢借給一些用資本家自己的錢所建立的公司——在任何情形之下，資本家總是深怕會失去自己的金錢。

也許某一個向自己借錢的政府會拒付利息吧？也許借款會在一個革命中消滅得無影無蹤吧？也許別的帝國主義會去侵略那些向自己貸款的國家吧？在發展到第四階段，資本家開始僱用資本輸入國的土著做勞工的時候，上面許多成爲資本家的隱憂的問題一天天變得顯著起來。因爲在那時期，資金將永久的停留在海外；毫無問題的，那些資金是不能拿回來了。所以一般資本家爲了要保障資金的安全，必須要來建立長期的政治統治權。

而且，資本家一旦要真正的開始僱用當地的勞工（這是第四階段）就需要用政治手腕來控制市場。資本家爲了要統馭當地的政府，所以通過了種種法律（像英國殖民地怯尼亞 Kenya（在非洲東部坦干伊咯北——譯者）地方的帽稅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強使當地的土著不能工作而離開了自己的土地，專門爲工資去替資本家們開鑿礦產以及從事種植。

從各方面情形看來，無論侵略步驟發展到任何階段，資本家總是渴望着某一領土上所有市場的佔領企圖能成事實。而且有許多資本家一定會因爲別的帝國主義國家裏的老闆們的拚命擠入和輸出貨品，而排斥了自己的緣故。

悲傷起來；或是爲了他們的資本代替了自己的資本，或是爲了他們的生產手段的輸出影響了自己生產手段的輸出的緣故而感到創痛；或是爲了他們所開展的礦產開採以及橡皮種植事業奪去了自己原有的地位的緣故而哀悼不止。由於上面種種原因，資本家便需要一種對海外市場的政治上的統制權。顯然的，資本家們的希望就是要獨佔市場，要將市場改變爲自國領土的一部份，要塗改地圖上的顏色。

#### 世界完全

#### 被分割了

不是幻景，也不是虛構的想像，這正是過去五十年曾遇到的而現在正面對着的事實的刻劃，不過現在這事實的演變方式有點和從前不同。過去的世界可說是不乏空曠之地，有許多市場足夠讓各種帝國主義國家去霸佔，還有整個的非洲等待着各帝國主義國家去塗漆各種不同的顏色，結果非洲是改色了。然而這總不能算是一種非常和平以及非常值得讚美的過程。當地土著終於在幾次帶着極度惡毒性質的小規模的戰爭中被壓伏了。可是這還沒有牽涉到帝國主義國家本身間的大規模戰爭。不過，隔了不久（在二十世紀剛開始的二十年中），世界完全被分割了。存留在世界上而沒有被帝國主義所吞併的適當市場簡直是沒有了，就是有，也是極少的。世界上已沒有多餘的地方給帝國主義國家擴展了，整個世界已被漆上了一塊一塊的不同的顏色了。

到了一九一四年，許多較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由於本身一天天的變得膨大起來，差不多在任何一處都形成了邊界彼此毗連的局勢。但是那些帝國主義國家還是不能停止的發展着。我在上面所托寫的資本家們的基本擴展過程還在繼續着。許多老闊在國內銷不掉貨物，都想拿到海外去找尋較大的市場。

#### 帝國主義列 強間的 衝突結果

結果，起了怎樣的變化？我們遭遇到一種必然發生的事情，那就是：帝國主義國家間的互相衝突！他們不斷的在擴展，擴展使彼此間的磨擦逐漸厲害起來。終於在一九一四年爆發了帝國

主義者的第一次大衝突；資本家們叫這次戰爭爲『世界大戰』，但是依我想來，這次戰爭還是取名爲『第一次世界

大戰」來得妥貼些。因爲在目前除了世界上的某一部份外，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正在孕育着另一種新的戰爭的危機。

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國家的大衝突中，被屠殺的人民近千萬，受傷的以及因饑餓和疾病而死的人民也有好幾千萬。但是現在帝國主義國家又重新滋榮了起來。他們正咬噬着世界上剩下來而沒有被吞完的幾塊肥肉。義大利在不久之前吃下了非洲土地上的最後一顆碩果——阿比西尼亞。日本吧，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正在企圖用力量來吞併世界上任何帝國主義列強沒有完全佔有的一大塊土地——中國。各帝國主義國家仍在繼續在擴展着；他們互相間的衝突已再度的接近了尖銳點。這第二次世界帝國主義列強的衝突不知爆發於什麼時候，而且在未來的第二次大衝突中不知要有多少人淪爲犧牲品？

這就是資本家們爲了要解決「誰是貨品的購買者」這一問題而拚命將貨物輸往海外市場所造成的困難的一種必然的後果。用政治上的術語來講，這種循環的世界大戰是現存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企圖消除購買力的困境的一種嘗試所形成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假使你不懂得上面的一套理論，你決不可能明白世界所以陷入目前這樣恐怖的狀態中去的理由。假如你不懂得帝國主義是一種推銷貨品的強制力——假如你不能意識到各個資本主義列強爲了國內人民生活水準的低落而無法脫售自己貨品以至於被迫的向外去找市場的真義，你決不能看得清過去會遇到的而現在正面對着的許多事實的本質。

現代帝國主義  
中最早和最大  
的一個——英國

英國是我的祖國，她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第一個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去解答了「誰是貨品的購買者」這一個問題。英國是建立所謂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第一個國家。這也就是說，

英國是廣大羣衆喪失了自己應有的資金握有權而變成了爲少數佔有大部資產的特殊階級工作的工資勞動者的第一個國家。跟着這種經濟生活機構（這種機構在那時還是唯一的，而現在已經成爲很普遍的了）的建立而來的就是「誰是貨品購買者」問題所形成的困境的發生。在一八七〇年與一八九〇年之間，這種危機在英國更其加深起來，事實告訴了我們，資本家不是朝着進步的方向走的；因爲資本家從沒有在薪工制度之外替廣大的羣衆加添一點購買力；相反的，由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運用，由於海外銷貨市場的覓取，這種購買力倒減低了。

我們剛才從上面得知了資本家的要求不是單單爲了覓取市場，而是要佔有它；英國早已是這樣做了，在一八七〇年與一八九八年之間，英國已佔領了住有八千八百萬人民的四百七十五萬四千方哩土地作爲自己的殖民地。

### 帝國主義戰爭

一直到現在，英國統治階級對自己所建立的帝國並不感到特別的興趣。可是他們現在已開始體驗到維持現存的經濟制度和保證目前優越地位的唯一方法不是僅僅去握緊固有的各個殖民地，而是要去奪取許多新的。現今在世界上的帝國主義國家已不止一個，法國和德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英國是其中最大和最強的一個，她佔有大量的財富，她早就建立了世界上最強盛的帝國。在一九一四年，她和那時年輕而強有力的德帝國主義打了一仗，原因就是爲了後者要想取英國的地位而代之，更爲了她要將英國的市場轉變爲德國的市場。英國結合了一個很大的聯盟（美國也在其內）去擊敗了她的勁敵——德國。英帝國不但沒有失去極小的一部份，反而更擴大了開來。

### 戰敗的 國主主義

有一個時期，資本主義似乎不能存在於戰敗國裏。有一個時期，德國、奧國，以及中歐各國的人民似乎可能的起來掃除自國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那也就是說，一般人民可能的將資金從統治階級的手中奪過來放在自己的掌握中。假使他們是那樣做的話，那麼，購買力所形成的困難情形早就被

解決了。德國、奧國、中歐各國的工業都可被充分的利用，決不會因貨物的儘量製造而發生絲毫的困難。德國和中歐人民本身就可成爲一個取用不盡的市場，他們的生活水準也逐漸會提高和穩固起來。這樣一來，德國（或中歐各國）就不需要到世界上別的地方去找求市場了。一言以蔽之，德國和她的同盟者也決不需要再度的去踏上帝國主義戰爭的道路了。

但是中歐和東歐的人民終於在人類的歷史上寫上了最悲慘的一頁，因爲他們是分裂了，因爲他們是凌亂了，因爲他們的領袖是錯誤了，以致剷除大戰後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企圖也就陷於失敗了。所以他們在今日仍是工資勞動者，而且他們國家內的資金仍舊操在極少數人所構成的階級的手中。『誰是貨物的購買者』這一問題仍舊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

在世界的另一隅裏，即從前的沙皇帝國，現在的蘇維埃聯邦的國內，上面的問題已獲得了解決的方法，國家的資金已經從少數階級的手中奪了過來；全體人民在實際上掌握了國家的資金，所以跟着『誰是貨物的購買者』這一問題也完全被解決了。在蘇聯建國後的二十年中，蘇聯工業與農業所出產的每一件東西向蘇聯國內人民推銷起來，總沒有發生些微的困難過。這就是因爲國家的資本是操在蘇維埃人民自己手裏的緣故，因此，蘇聯人民的工資是與他們的生產能力作着正比例的激增的。

#### 德國的征服

#### 世界新企圖

我要重複的說，中歐的情形可不是像蘇聯那樣的。而『誰是貨物的購買者』這一問題始終不能得到高明的解答。中歐對這問題既沒有從推翻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或是恢復全體人民對工廠、礦產和土地的所有權的最後方式中去找尋解決的方法，也沒有從提高大眾人民的購買力的過渡的暫時的方式中去覓求解答的方法。於是，根據自然法則的演變，歸根結蒂祇有出之帝國主義者的解決方法的一途了。

德國和中國在資本主義在滋長着但是它沒有市場是不能存在的所以資本家被迫着要向整個世界去找市場被迫着再度走上帝國主義戰爭的道路。因而希特勒是被命運決定了去完成死亡的過程。

再者，假如你不懂得德國的法西斯蒂主義是一種驅使德國人民去實施征服世界的企圖的精神最高表現，那末，你就祇能明白事實的一些皮毛而已。

希特勒已完

全寫了下來

事實上，希特勒已把上面的企圖一古腦兒寫在他自己做的一本『我的奮鬥』——現在已成爲納粹的聖經——中了，現在用不着我再明白的講，祇消各位費一點功夫去讀一遍就可明瞭一切。確實的，希特勒不加考慮地毅然排除了上面的解答『誰是貨物的購買者』的高明方法。我不相信希特勒會懂得上面問題的解決的可能性。可是他十足懂得的唯一方法是世界的征服，所以他正在企圖實施吞併世界的陰謀。

希特勒目前正在步步實施着『我的奮鬥』中所預定的計劃。假如他這樣做而被允許的話，他將利用自國高度技術能力和德國人民的組織力首先來征服歐洲，然後再行來征服全世界。結果就是把世界改變成爲一個極大的集中營來禁閉任何人，除了那些德國的統治階級人民。

昨日今日明日

和將來——

不用講，無論如何希特勒是不會被允許的去征服全世界的，假使他、不懸崖勒馬，遲早的會使世界跌入一個新的、廣泛的戰爭的漩渦中去，假如他在早幾年的脆弱的時候而停止了自已的行動，那麼，事情也就好弄了，也決不會有戰爭的危險。在今日，我想可以不用戰爭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在明天，解決的方法可能的出之一戰，而德國可以在短時期中很快的陷於失敗的命運，可是到了後天，假如希特勒不停止侵略行動，會爆發一個長時期的恐怖的戰爭，在那一次戰爭中，歐洲的大部份將會受到鐵蹄的蹂躪。



因此每一個只要稍微懂得事理的歐洲人總是用全力去勸導世界上其他各國締結統一戰線以抵禦法西斯蒂的侵略。這種願望本來早已就可成爲事實，而且更可早把世界從醞釀中的普遍戰爭中解救出來，但是由於英國政府的拒絕參加反法西斯同盟，上面的願望終沒有實現。英國政府所以拒絕的緣故，就是深怕阻礙了希特勒的擴展就會毀滅德國的資本主義。因爲這爲英國政府所最不喜的。所以她寧願讓舊日可怕的勁敵——德帝國主義——的再度出現，而不情願中歐會有社會主義組織的建立的事情的發生。

一九三九，五，廿五，滬。

## 英蘇關係之史的考察

邵翰齊

記得好久以前，某刊曾經轉載英國死硬派報紙刊登的一幅漫畫，上面畫着一隻北極熊面對着西方張牙舞爪地咆哮，在地周圍徘徊着各式各樣的柔弱獸類，表示着異常驚悚的樣子。而在恐怖大海的彼岸，却畫着一匹雄赳赳的獅子，在悠然自得地靜臥草原，象徵着靜穆和平與剛武。這幅漫畫在當時十足地代表着英國死硬派的反蘇心理；直到現在，雖然英國資產階級爲事勢所迫，不得不承認今日威脅世界和平的，不是莫斯科的大熊，而是柏林、羅馬與東京的豺狼毒蛇，但要他們根本放棄畏蘇忌蘇的心理，乃是不可能的。這一心理主要是從金融寡頭的階級利益出發，它相當可以說明爲什麼直到法西斯『江湖好漢』放的火快要延燒到他們自己頭上來的時候，對蘇聯要求締結全面反侵略戰線的建議，老是保持着一副討價還價的市儈面目。

今日英蘇談判關係整個集體安全體制的建立至深且鉅。我們要了解目前英蘇邦交的進展，要估計以英蘇合作爲重心的國際集體安全的前途，有回溯一下這兩個大國二十年外交關係消長之必要。事實上，認識了英蘇邦交的發展過程，對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體系之間的關係之變化，也就可以得到一個大體的了解。

如果把二十年前直到十餘年前英國對蘇的態度跟目前倫敦對莫斯科的態度對比一下，誰都會感到驚訝，而『不勝今昔之感』吧。

二十年前，正是蘇維埃政權遭受資本主義列強武裝包圍和經濟封鎖的時候，不列顛帝國曾經是干涉者的參謀本部。在蘇聯擊破協約國的武裝干涉之後，由倫敦所領導的對蘇經濟封鎖還繼續了好些時，並且是在日益加強着，但這種封鎖終於是給蘇聯工農的奮鬥毅力突破了。英國的經濟封鎖政策事實上正像十九世紀初拿破崙的大陸封鎖政策，遭受到嚴重損失的不是被封鎖的國家，而是實行封鎖的集團。這之後，唐寧街的紳士對蘇聯的政策是陷於極度的苦悶之中。由於英法的反對蘇聯與壓抑德國，首先是促進了蘇德的親近，同時許多弱小民族對蘇聯的同情亦日益增高，這使得向來慣善於打算盤的不列顛大老闆不得不改變過去的積極仇蘇政策，而表示與蘇聯修好。於是繼英蘇貿易關係恢復之後，有一九二四年麥唐納政府承認蘇聯之舉。工黨政府宣布承認蘇聯，一方面是由於國內人民的推動，另一方面也是由於蘇聯外交的努力。自然，當時麥唐納政府事實上是傾向於英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它的承認蘇聯當然不是完全違反資產階級的意志的，雖然當時麥唐納的對蘇政策曾經遭到了一部分最死硬的資本家及其代表人物之激烈反對。

英國修改對蘇政策，並不足以說明她放棄了反蘇路線。在麥唐納內閣傾覆之後，代表反動資產階級的保守黨政府，便對蘇聯展開了積極的外交攻勢，保守黨曾經偽造季諾維埃夫的書信，證明工黨和第三國際有關係，以後又拒絕將以前工黨政府與蘇聯簽訂的新貿易協定提交國會通過。這還不夠，在外交上，保守黨政府更積極加強它在波蘭與波羅的海各國（芬蘭，愛沙尼亞，立陶宛，拉特維亞）的策動作用，為的是重新佈置包圍蘇聯的前哨線，準備對蘇聯作第二次的武裝干涉。一九二五年羅加諾條約成立，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說明英國保守黨政府要把德國拉攏，以孤立蘇聯。當時蘇聯外長齊采林說得非常明白：『羅加諾協約明明給予英國加深壓迫德國的機會，德國在此種壓力之下，從此將不由自主地改變對蘇聯的態度。』

國際聯盟本來是戰勝國分配贖物「綏靖世界」的機關，起初是拒絕德國參加的，但是在羅加諾條約簽定後，德國在英國的汲引之下，居然由國際聯盟的門外漢一變而為「和平殿堂」的座上客，此中原由，當不難洞悉。英國政府從一九二五年以來，和法國在日內瓦大唱雙簧劇，其中一個主要的劇目，就是加緊反蘇。

在國內，英國政府製造反蘇的仇恨，其惡毒也不下於其外交的運用。例如偽造英國共產黨領受莫斯科津貼的文件，誹謗蘇聯在英國及其屬地進行赤化宣傳。以後在英國大罷工中，英政府特別強調地誣指蘇聯是罷工事件的策動者。當時英國外相張伯倫竟宣稱蘇聯的反英宣傳乃是英俄邦交的主要障礙，在此種「宣傳」未終止之前，英國政府當拒絕與蘇聯政府進行任何交涉。

當英國正在動員一切外交力量與政治力量來進攻蘇聯的時候，蘇聯的和平外交政策又有了新的開展。一九二六年波蘭皮爾蘇斯基將軍的「苦推打」，同年張伯倫與墨索里尼所成立的諒解，以及這一年十二月間立陶宛的法西斯黨徒的暴動，無一不是說明英國在幕後牽線以策進新的反蘇運動。爲了回答英國政府的陰謀，蘇聯更加緊了對土耳其的邦交。因蘇聯援助而戰勝西歐帝國主義的昂戈拉政府在這時候發表了非常動人的聲明，它指出土耳其無論如何不會步英國的後塵，對蘇聯執行封鎖政策。同樣，中國革命政府與蘇聯的關係在此時期，成了遠東反帝的主要基礎，這就更激起了英國仇蘇的情緒。保守黨政府由於憂慮國內經濟恐慌的重新加劇，惶懼歐洲大陸與遠東的革命浪潮的不斷騰漲，畏忌蘇聯的威信在國際間的日益增高，於是益發走向了露骨的反蘇道路。一九二七年初，英國外相張伯倫致牒警告莫斯科政府，藉口蘇聯不停止在英國的共產宣傳，與英蘇貿易協定相違反，聲稱於必要時，英政府當對蘇斷絕一切貿易外交關係。蘇聯以強硬的覆牒回答英國政府，要求後者提出蘇聯在大英帝國製造騷亂的真實證據，並聲明倘使不幸英蘇邦交由惡化而斷絕，英國政府應負全責。這一幕戲劇發展到高潮，於是有英政府包圍搜查蘇

聯駐英大使館的不幸事件，英蘇關係從此宣告中斷。鮑爾溫在國會中宣布對蘇絕交的理由，還是那麼一套老文章：蘇聯在英國進行反英的宣傳和間諜工作。

英蘇絕交後，鮑爾溫政府在波蘭策動反蘇陰謀益加積極，不久在波蘭就發生了蘇聯大使被刺事件，蘇波邦交一時呈現異常緊張，英國外相張伯倫公然詢問德國外首史脫萊斯曼，假如各國要援助波蘭對蘇，柏林政府是否准許各國假道德國。可見當時保守黨政府企圖發動一次對蘇聯的新的武裝進攻。

雖然英蘇關係是在日益惡化中，但蘇聯並沒有鬆懈牠對於國際和平運動的努力。由於蘇聯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由於蘇聯的外交活動躍進，同時由於帝國主義營壘內部的矛盾日益增強，素來張起反赤旗幟的國際聯盟也不得不邀請蘇聯參加它所召集的國際經濟會議與軍縮會議。在軍縮會議中，蘇聯以李維諾夫為首的代表團提議澈底廢除一切軍備。英國代表寇興登則和法國堅持反對，指斥蘇聯的提議無非是煽動各國「赤化」。

英國對蘇聯實行絕交，正像過去對蘇聯執行武裝干涉和經濟封鎖一樣，吃虧失利的並不是蘇聯，而是大英帝國。在絕交的兩年間，英蘇商業都受了損害，而尤以英國在蘇聯市場上所受的打擊最大。而在此時，蘇聯和美國的貿易關係又有了長足的發展，這使得英國的大腹賈不由不眼紅起來。同時英國廣大民衆自從保守黨政府宣布對蘇聯絕交之後，無日不在要求迅速與蘇聯復交。爲了滿足資產階級的利潤慾並緩和人民的憤慨，重握政權的工黨政府就於一九二九年與蘇聯恢復邦交，兩國簽訂了新的商約，重新派遣大使，從此英國對蘇聯的商品輸出就日益激增着，這正是世界資本主義陷於深沉恐慌的時候，也正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突飛猛進的時候。

英蘇復交使歐洲和平有了新的開展，就是從經濟觀點來看，對於英國也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英國仇蘇忌蘇的心理仍然隨時表現出來。一九三一年日本突然侵占東三省，誰都知道是得到英國的諒解的。英國死硬派企圖在東方布

置一道反蘇的新陣線，而以日本爲反蘇急先鋒，竟以犧牲滿洲來作爲日本進攻蘇聯的根據地。日本就不斷利用反蘇烟幕把她的侵略勢力由滿洲而擴展到內蒙與華北，爲英國把持的國聯對日祇是一味採取放縱態度，這樣就埋伏了今日整個世界紊亂的禍根。

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之後，希特勒在國內外金融資產階級的援助之下（英國資產階級援助頗爲不小）爬上了獨裁者的寶座。從此國際法西斯的戰爭危機就日益增長，這更加重了蘇聯在國際集體安全運動中的任務。一方面是英國極力給予納粹政府擴張軍備進行侵略的種種便利（英德海軍協定，英國對於德國重整軍備與進佔萊茵河流域的默許等等），另一方面是蘇聯以全力進行反戰爭反侵略的活動。一九三四年蘇聯外長在裁軍會議中，指出裁軍的一切企圖已經失敗，戰爭的危機十分迫切，因此提議把裁軍會議改組爲永久保平會議，以防止戰爭爆發，成立區域安全公約與互助公約，以抵抗侵略者。然而這兩大提議又遭到英法的阻撓不能實現。

自然，蘇聯的努力並沒有白費，受着納粹威脅的法國覺得不能永久追隨於英國之後，首先表示了願與蘇聯敦睦邦交，並且法國政府極力要蘇聯與國聯合作。就在這時，英國政府亦不堅持其過去態度和法國一同表示邀請蘇聯參加國聯。於是一九三四年秋間蘇聯正式宣布成爲國聯的新會員國，這一重大事件不僅揭開了國聯史的新頁，而且寫出了英蘇關係的新章。

由於蘇聯的參加國聯，使國際集體安全運動有了新的開展，英蘇關係從此比較進步了。然而英國始終不願割斷她仇蘇的傳統。當蘇聯竭力組織東歐互助公約的時候，英國事實上是盡着阻撓和破壞的作用。後來法蘇互助公約與捷蘇互助公約成立了，英國不但自己不願與蘇法捷締結更廣泛的互助公約，以加強反侵略的陣容，並且在不斷暗示法蘇互助與捷蘇互助無益於和平，對於納粹宣傳法蘇、法捷的互助公約是包圍德國的說法竟表示同情。這就鼓勵了

希特勒政府破壞法蘇與蘇捷互助協定的決心，納粹政府得到了倫敦的默許與支持，就大大加強其東進運動，一九三四年與波蘭締結不侵犯條約，顯然是得到英國諒解，以打通納粹東進之路的。在德國向奧國與捷克斯拉夫先後實施壓迫的時候，歐洲的風雲大為緊張。然而張伯倫政府為要討好納粹，為要打開納粹東進的門戶，首先就默認了德國的併奧，接着又召集了出賣捷克的慕尼黑會議，以打好其綏靖政策的基礎，在這次會議中，英國是盡量設法鑿足納粹的饑慾，把犧牲捷克的預定計畫全部實施了；而蘇聯則被排於慕尼黑會議的門外。很明顯的，張伯倫政府是要在孤立蘇聯之後，完成其「綏靖」歐洲的好夢。

然而在納粹進兵勃拉格之後，張伯倫的「綏靖」政策無可否認地是陷於全部破產了。納粹刀鋒和法西斯劍口逼着東南歐、巴爾幹、西班牙與地中海，使英國在政治經濟與戰略各方面遭受着空前未有的威脅，在侵略軸心不斷進迫之下，在人民堅強督責之下，職業的投降家張伯倫等開始發急了，過去陳腐的綏靖把戲是再也不敢要下去了，於是不得不對蘇聯「移樽就教」，不得不表示與蘇聯重新接近。起初是派遣商務代表團（以赫德森為首席代表）赴莫斯科，繼後與蘇聯進行了長期的外交談判。張伯倫政府使出這種新的鎗法是很明顯的，一方面是為了綏和國內人民的不滿情緒，另一方面是企圖迫使納粹就範。正因為他對納粹對整個侵略陣線懷着幻想，保留着妥協主義的殘餘，所以在與蘇聯進行談判的時候，始終是表現動搖，缺乏誠意，討價還價。最初他希望僅僅由英法蘇三國發表一篇空洞的宣言，拒絕蘇聯召開六國會議的建議，以後又要求蘇聯接受片面担保的約束，拒絕蘇聯締結互助公約擴展保障的建議。直到最近，因着蘇聯的警覺極高和態度極堅，因着國內人民要求英蘇互助協定的異常迫切，同時由於蘇聯在東歐近東方面和平外交的開展，迫使張伯倫政府對蘇聯不得不表示新的「讓步」，向蘇聯重新提出建議，並且事後，竭力宣傳這次建議是「絕對依據平等互助原則」，「必為蘇聯所接受」，以便在國際間製造英國「仁至義盡」的印象。

象。一方面欺騙國內民衆，另一方面迫使蘇聯接受。然而在所謂依據『絕對平等互助原則』提出的『新建議』中，事實上並未充分根據集體安全的精神，規定切實互助合作的辦法，也未載明對歐洲各強鄰近之國給予普遍的保障。所謂『絕對平等互助』云云，不過是張伯倫政府一套絕妙的宣傳而已。

蘇聯對於英國的新建議雖未必全盤予以拒絕，但也不會無條件的予以接受。我們相信，英國在沒有表示充分誠意在原則上和辦法上接受集體安全的精神之前，在沒有放棄對侵略國的妥協幻想之前，英蘇互助協定是不會成立的。今日莫斯科傳來消息，據說莫洛托夫在最高蘇維埃議會中，承認英國最後一次建議較前次進步，但同時又指出這次建議的進步仍不切實，他說明蘇聯所主張的互助條件有三：（一）英法蘇三國應締結切實有效的協定；（二）英法兩國應向蘇聯各鄰邦，不分畛域，一律提供保障；（三）英法蘇三國協定應規定互助辦法，以抵抗侵略。倘使英國能夠接受條件，當然英蘇法三國互助的成立是不成問題的，由英法蘇互助公約擴展為全面的反侵略戰線，當然是不難的事。我們相信，英蘇觀點在最近的確比前進步，但要實現全世界愛好和平者所預期的普遍性的集體安全運動，還有待蘇聯與各國民衆的努力。

六月五日



## 英國在近東的新防線

P. F. Drucker 作  
秋 水 譯

自從英國容忍了希特勒的在多瑙河下游的霸權之後，達達尼爾海峽已成為英帝國的第一條防線了。飛機已使直波羅陀和馬爾太在軍略上的重要性喪失盡淨，同時也削弱了蘇彝士運河對於英國的支持力。但伊斯坦堡對於英國的重要性却不但沒有絲毫減損，且較過去英國為爭取近東霸權而在埃及和拿破崙鬥爭，在克里米里和帝俄鬥爭，在阿拉伯和德國鬥爭時增大了許多。誰能控制達達尼爾海峽，誰就能控制全部英國武力所賴以支持的伊蘭和摩蘇爾的油田，此外還能控制從伊斯坦堡至加爾加答和贊穆巴整個回教世界的方興未艾的民族運動和現代化運動。假如我們說，德國的重整武備已使英倫的防線進展至萊茵河，則集體安全制和法國聯盟制度的崩潰已使加利波利成為英帝國的邊陲了。

因此英國政府以八千萬美元貸予土耳其和倫西曼動員被派往布拉格二事之差不多在同時發生絕不是一種偶然的暗合。這筆借款一部是用於購買軍火，一部是用於土耳其的工業化的。不久，半官消息告訴我們說，英國又在和伊拉克磋商一筆用以資助一家伊拉克國營工廠和伊國工業化程序的推進的二千五百萬美元的貸款。官方公報稱，此項貸款「須在巴勒斯坦糾紛平定後」纔能決定，但據說其中的第一批已在英國輸出貿易的擔保之下商酌定妥了。同時，倫敦傳出的消息稱，近東第三個獨立國伊蘭也在向英國商借一筆二千五百萬至五千萬的貸款——也是用

以發展國營工廠公路和新工業的；顯然的，他們之間的商議早已結束了。

這些貸款我們當然不能視為通常的對外放款，因為英國的國外貿易部過去是一直視近東為長途的，且曾屢次拒絕短期的放款。此外，悠長的期限，寬大的條件和沒有任何商業的担保都足以證明這些貸款是在通常的貿易貸款範疇之外的。這些貸款的性質上還有一點重大的意義，就是英國製造家們都深信——不願半官方面如何否認——這些貸款的契約中包含着一個秘密的條款，就是債務人得向德國之外的任何國家訂貨，假如他能獲得較英國更低廉的價格和更迅速的交貨期的話。在英國今日的工業狀況之下，這樣一個條款將使大部份的機器鋼鐵軍火和水泥的定貨轉移到法國比利時和捷克去。這個傳說——不論牠是否確實——證明英國本身對於她外交政策的最高目的物的土耳其、伊蘭和伊拉克的工業化和擴軍程序的資助，甚至較她自己的急迫的經濟利益還要重視些。

這些貸款完全翻變了張伯倫出任總揆並以其『現實主義的』政策代替艾登的集體安全制度以來所推行的英國的國策。前此，英國的政策是一向堅強地反對近東的民族運動的。並且，牠是以防止近東各國間的密切合作為其基本原則的。脆弱而四分五裂的奧托曼帝國並不是為了要建立一個武力強盛的中亞聯盟而被消滅的。差不多十五年以來，英國一直在防止這中亞聯盟的形成，伊拉克和伊蘭間的邊境糾紛的解決就是一例。現在，不僅這糾紛已經解決，而且英國亦已成為薩德·阿拔特協定（Saad-Abat Pact）的保證人了。這個協定使近東三獨立國土耳其、伊拉克和伊蘭之間發生了最密切的聯繫。英國甚至還一反於過去的政策而拉阿富汗加入這個協定，過去英國因鑒於阿富汗的西北邊省與近東諸國的壤土相接而一直使她『和外國不發生任何關係』的。

雖然這個英國的新政策是不公開的，但牠却代表着一種限制，在價值上和意義的深長上都不弱於在中歐方面的退却。因為各國對於英國在歐洲的新政策必須付出直接的代價，所以近東局勢的翻變也迫使英國犧牲許多非常

確實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利益。白宮方面一如二十年前那樣深信亞洲的新的民族運動，對於英國是非常有害的。歐洲局勢翻變以來的一切發展也證明她的憂懼是正確的。近東的新的民族運動的意義一方面是英國勢力和貿易的不斷的削減，一方面是直接反英政策的長足的發展。土耳其已漸次收回英國所執的鐵道股票，同時英法共有的奧托曼銀行的業務亦已完全被土耳其奪去。伊蘭已迫使英國政府所管轄的英伊煤油公司放棄牠的五分之四的土地和牠在南部伊蘭的權利。同時伊蘭更依着土耳其的先例，為便利她自己的國家銀行計，已宣布英國所有的伊蘭帝國銀行有專利的特權。甚至伊拉克也在要求英國煤油公司歸還其所享的政治特權之後不久就宣布獨立了。

英國貿易上所受的損失也有同等的苦楚，而且其中損失最大的正是英國典型的輸出工業棉毛織物、煤和鐵器等。此等工業輸出的削減造成了英國最困難的經濟問題。現在土耳其差不多已能生產她所需要的全部紡織品，並正在建設一所能生產十五萬噸鋼的鍊鋼廠。明年她更將成爲一個煤的純粹的輸出國，從而把英國逐出東地中海，這裏是英國在斯坎的納維亞以外的最大的煤市場。伊蘭已建設了二十五所紗廠，具有十五萬只紗錠和一千部織機，再過兩年她在紡織品方面即能自給；至於蘇，則她早就不仰給於印度的輸入了。甚至在英國委任統治時代不准實行工業化的伊拉克亦已計劃在五年之後完全不仰給外棉的輸入了。

這證明那些英國對經濟的民族運動所採取的對策適足以自害——雖然這件不自私的事情剛巧和英國的非常確實的利益相一致。好幾年來，英國商界人士正在劇烈地辯論下面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了加緊工業化而忽視農業將使近東諸國的整個經濟的和社會的組織發生嚴重的危險。第一，他們預料，這將使近東諸國更仰給於農產品的輸入（因為他們的農產品勢將求過於供）結果他們不得不降低他們的生活程度以與他國競爭於世界市場。第二他們認為一個購買力極低生產效能亦不高的國家的新工業，牠所生產的商品的價格一定是不會最低廉的；而因了抵

抗外國的競爭起見，他們工業製造品在本國的消費總量亦勢將銳減。最後，在中亞細亞和英國爭奪經濟霸權的各國正在期待着工業化的造成金融的混亂和通貨膨脹。雖然這些預測都把土耳其和伊蘭農民的忍耐力估量得太低了，但是牠們都是很正確的——至少大部份是正確的。

這是英國所以考慮了許久許久纒變更她的近東政策的原因。像漢斯康博士（Dr. Hans Kohn）那樣的獨立觀察家遠在十五年之前就已看到了對近東民族運動的對策必將失敗，且祇能使近東諸國投入第三國或敵國的懷抱中。然而直到近東諸國為英國勢力所逼而和蘇聯密切聯結時，英國的政策向未有絲毫變更——這使蘇聯的勢力直下地中海由陸路而達印度。土耳其已和蘇聯密切合作了十五年之久。最近蘇聯的工程師為土耳其建設了最大最新的紗廠，其中所用的機器和工頭都是蘇聯的。英國反對伊蘭工業化的直接的後果已使伊蘭和蘇聯間的經濟和政治的關係非常密切。伊蘭政府正集中全力於建設德黑蘭至裏海的一段新鐵道而曾有一時忽視德黑蘭至波斯灣一段鐵道的建設，這將使伊蘭的貿易大規模地轉入蘇聯的黑海的海港而使英國的貿易受到極大的損失；但若英國政府對於一家英商建築公司所提的伊蘭政府認為有損他們的主權的要求不予助力的話，則上述事情或可不致發生。甚至阿富汗亦因英國在經濟上不予幫助而被迫和蘇聯親善。

甚至一九三四年以來的德國貿易的猛烈的進展也不能變更英國官場的見解。英國官方和半官方面——例如半官周刊英帝國和東方——都認為這猛烈的進展將受到窒礙，固然德國雖欲攫取近東的原料但不能供給長期的貸款。因此雖然德國在最近兩年中已佔得土耳其對外貿易總額之半和伊蘭對外貿易總額四分之一以上，同時他在伊拉克的諸商品輸入國中已從第七位一躍而為第四位，對於英國仍然不發生什麼重大的影響的。恰恰相反，英國對之正非常樂觀，因為上述的理由，貿易的雙方都積累了大量的空息的通貨，這對於任何聰明的企圖都是毫無好處的。

而當近東諸國和德國訂立特別合同的會議宣告決裂時，英國的態度似頗欣喜；因為，第一土耳其必須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第二伊蘭必須在一九三八年解除和德國所訂的匯劃合同了。

最奇特的是這最先迫使英國採取現行近東政策的德國傾銷的失敗，因為德國自己不但不承認失敗，並且還做了英國觀察家們始終認為不可能的事情：她以資金貸予近東諸國。最初她以價值二百五十萬美元的軍火贈予伊拉克。獨裁者巴基爾雪基將軍（General Bakr Sidki）承恩追隨凱末爾和伊蘭王巴勒維（Reza Shah Pahlavi）的政策，並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反英政府，不幸於一九三七年八月被刺，他逝世後伊拉克向德定購此項軍火的定單即被作廢。但當英國發覺她『最密切的同盟者』已自置了重轟炸機之後，她簡直就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因為英國過去的政策一直是將伊拉克的空軍歸她自己指揮的。第二步，德國又以類似的供給畀予土耳其，她借給土國一筆十五年期的貸款，使土國能向她購置保衛達尼爾海峽所需的全部軍火，同時更贈給土耳其許多建築公路鐵道的材料，約定俟此項投資使農業和礦業的生產獲得盈餘後歸還本息。最後，德國更於今年（一九三八年）七月間贈給伊蘭第一家鍊鋼廠以牠所需的三分之二的機器和材料，約定於七年中分期歸還本息，一半取自農產品，一半則取自此鍊鋼廠本身所生產的利潤。

在這些贈貨和貸款中，與在德國經濟政策的其他方面一樣，沒有什麼『奇蹟』用以生產飛機，高速率的機器或鍊鋼廠設備的原料的輸入量幾乎是不足道的。牠們的更大部份的價值是在高度的技術和設計；至於這些商品則都是由德國用高度的技術大量地粗製濫造出來的，因為土耳其將來償付給他的是一種沒有國際價值的貨幣。以此，德國不僅能供給長期的贈貨（這些贈貨都是以高度的技術製造的，且其中尚不包括輸入的原料）同時她更能和其他在財政上非常強健的國家相競爭，因為她樂於在投資方面蒙受損失，不過這種投資，她在最初實際上並沒有付出

什麼有真實價值的東西。

這些長期賒貸的概尤不能就證明德國對於近東已懷着政治的企圖。恰恰相反，從德國經濟的立場看來，這些賒貸僅能認爲一種『完全正常的』商業的事件。近東諸國蘊藏着許多德國所非常缺乏而又非常難以攫取的原料。土耳其有許多礦鐵、鉻、硫黃、銅和烟草。伊蘭和伊拉克不僅以產油著名，並且也是最有希望的新的產棉國。對於德國，這幾種原料都是非常重要的，且以她的勞工制度下的男工時制的用語說來，向土國購買此等原料較以低外匯率向國外市場購買便宜得多。一個不能認爲『純粹商業性質』的，同時熱望着實現昔日的『由柏林伸展至巴格達』的迷夢的德國在近東的唯一活動是最近開闢的由柏林經由巴格達和德黑蘭而達喀布爾（阿富汗）的一個城市——譯者）的航空線。但這在商業上毫無意義的冒險事業，德國官場方面還僅認爲實現柏林和東京間航行的初步工作哩。

但是即使德國的插足於近東企業是絲毫沒有政治的動機的，然而德國的突然成爲近東經濟獨裁的幕後人却已使英國驚惶失措，被迫不顧她的經濟利益而立即修正她的近東政策了。在過去數月中歐洲局勢的急變使這工作更爲急迫。那些由凡爾賽和約克創造出來作爲緩衝地帶的中歐諸小國已不能勝任她們的職守，而業已獨立自主的『中亞』諸小國却不得不漠視凡爾賽和約克而力圖自強了。英國業已放棄其加強中歐諸小國抵抗力的計劃而於接攘不安的歐局中不得不乞援於亞洲以建立她的交通命脈的第一條防線了，一如百年前乞援於歐洲以堵截拿破崙鐵蹄的跨越英吉利海峽。

無疑的，希特勒勢力愈向多瑙河下流伸展，則近東之於英德兩國亦愈益重要。同時達達尼爾海的控制亦勢將成爲歐洲『現實主義』國家政治的第二個根本問題。對於英國的未來的措施，德國也早有準備，這已可於德國之在希特勒與張伯倫同意英德兩國決不以兵戎相見的那天特派經濟部長芬克博士前往伊斯坦堡一事略見其徵兆。芬克

博士不僅把從捷克邊境撤除下來的軍火和一切軍需品供給土耳其，並且還長期賒與土耳其以價值一萬五千萬馬克的重工業設備。此項賒貨土耳其業已接受，雖然英國宣布願以同等貨物以同樣長久的時期賒與土國。

# 一九三七——三九年經濟恐慌的特質

瓦爾加著  
王一雲譯

## 恐慌性質的變化

百餘年來一切在資本主義社會定期發生的週期的生產過剩的恐慌，雖然它的基本原因相同，但它的性質却因時代而變化，並且在每一時代，每一恐慌都有它的具體的特性，而決定這特性的，是它所由發生的歷史的具體因素的總和。自然的因素：首先是歉收；政治的因素：革命，內戰和戰爭——這些因素交互影響着那由資本主義社會內在法則所決定的週期的進行和恐慌的經過。

我們不擬在這裏描寫資本主義恐慌的歷史。我們祇想指出為瞭解目前經濟恐慌所必要的若干要點。

再生產的週期進行的「物質基礎」是不變資本，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在某一國家和在某一時代，不變資本的比重愈大，即資本的有機組成愈高，則週期和恐慌——假定一切別的因素不變——愈相似於那根據資本主義一般法則應有的形態。相反的，不變資本的比重愈小，即社會總資本的有機組成愈低，或者說——實際上是一樣的——機器大工業的成分愈小，愈帶着農業國的性質，則週期和恐慌愈不「規則」——「偶然」的，非基於社會的資本主義特性而來的因素（歉收等等）愈有力的影響着週期和恐慌的經過。



歷史所給予的，具體的資本主義從不是「純」資本主義，在今日也不是「純」資本主義。逐漸形成的資本主義是由無數非資本主義的，為滿足自己的需要而生產的農民圍繞着。那不直接參加資本主義生產，而僅僅在流通範圍內間接與資本相連繫的階級——農民和手工業者——在今日還構成全世界居民的大多數。在不同的國家，在某一個時代，當時尚未參加資本主義流通商品的階層，是在怎樣的步調下參加商品流通；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張是在怎樣的步調下越過那由已經資本主義化的經濟部門的本身發展所決定的範圍；一切這些步調大大的影響着週期和恐慌的性質。如果這種步調是迅速的，那末（假定別的因素不變），恐慌就很短促而不深刻，復興和繁榮的時期就有力而持久了。

在獨佔資本主義時代，資本的有機組成很高；在完全發展的帝國主義國家，「獨立生產者」被捲入資本主義市場流通的過程已經完成；由於高物價的人工的保持，獨佔就減少了市場的消納，阻礙了不變資本的刷新和擴充。一切這些，變化着帝國主義時代週期和恐慌的經過，而將其更大部分的損失，從資本方面嫁給勞動人民。

在資本主義總恐慌時代，因為不變資本的經常的過剩。週期和恐慌性質的變化更來得大。週期益形「平坦」；復興和繁榮時期短促，不包括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恐慌和呆滯的時期持久，深刻，包括一切國家和一切生產部門，並喚起勞動人民巨量的失業和嚴重的貧困，生產的增加——雖然技術進步——呈着向下的傾向。

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的增加速度（每年百分比）（註）

一八七〇——

一八九一——

一九一三——

一九二九

一八九〇

一九一三

一九二九

一九三七

註：這數字是根據德國「景氣研究所」第三十一期特刊及國聯的計算得來的，它自然極不正確，但它對於發展傾向却給了一些說明。

這是資本主義發展互相銜接的各時代週期和恐慌。經過的最一般的特性。我們現在來研究總恐慌時代的個別恐慌。這大家都知道有三次，它們的暴發時期是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七年。

### 戰後的三次恐慌

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的恐慌性質非常特別。它是「戰後恐慌」。它不是「平時」週期的結束。它也不是純粹的生產過剩，而是個別國家和個別生產部門的生產過剩交織着別的國家的「生產不足」。更具體的說：戰爭結果，使某些服役於戰爭的生產部門——鋼鐵、化學、武器生產，海外小麥生產——畸形發展，另一方面，對於平民的商品供給被降到最低限度。在戰爭結束的時候，軍需生產顯呈急遽的下降。成千的工廠改組從事製造平時需要的商品，這是由於有很大的不能滿足的平時需要存在着。

但沒有經過一年半的時間，那由戰爭引起的貧困，消費力的減少，一般的在資本主義社會，特別在作戰的國家，尤其是被包圍和被蹂躪的國家，就暴發了一九二〇年的恐慌。「需要」無疑是存在的，但勞動人民的廣大階層沒有滿足需要的資料。生產過剩的恐慌並不包括世界一切國家；在那些因為戰時窮了而實行強烈貨幣跌價的國家，沒有生產過剩的恐慌。若干數字足以說明這種情形。

工業生產（一九二八等於一〇〇）

全世界（註）

美國

日本

英國

法國

德國

奧國

一九一九	六五	七六	七〇	——	四五	三七	三四
一九二〇	七六	七九	五三	一〇七	四九	五四	四一
一九二一	六〇	六一	六五	七三	四三	六五	五四
一九二二	七三	七七	六八	八七	六一	七〇	六五

註：包括蘇聯在內，但在這裏蘇聯不關重要，因為在這些年間蘇聯工業生產不足世界生產的百分之一。

自然，依年計算的數字會模糊恐慌的深度（這時期依月計算的數字我們找不到）但它却指示出在強度依靠輸出的國家（日、英）和貨幣沒有跌價的國家（美）恐慌的程度最深刻。而通貨膨脹國（德、奧）則完全倖免，法國則更差不多毫不受影響了。這樣，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的恐慌便呈出一種極複雜的圖畫。它不是包括一切的，它是深刻而短促的，在貨幣穩定的國家帶着極尖銳物價跌落。（這是消滅戰時高漲起來，超出商品價值以外的物價的過程。）恐慌期間的短促，首先應該是因為這樣的原故：戰時不變資本的刷新停止了，因此，第一部門（即生產資料的部門）的商品市場就很快的開始擴充起來。

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戰後第二次週期的生產過剩的恐慌，在讀者記憶中更為新鮮，它是接着復興和繁榮時期而來的，這種復興和繁榮時期雖未包括一切國家，但包括了大多數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它是資本主義史上最一般的，最深刻的和最持久的生產過剩的恐慌，是資本主義總恐慌時代典型的恐慌。戰爭的後果還表現於很強的物價跌落中，雖然獨佔者企圖用一切力量來阻止其商品價格的跌落，但物價跌落把用黃金計算的物價標準降到一九一三年的水準以下，正與勞動生產率較戰前還提高的分量相符。這種非常強烈的物體跌落，特別是它帶着農產品和殖民地商品的價格與之俱跌，引起農業恐慌的極強烈的尖銳化，農業國家國際支付的無能，國際信用制度的崩潰，巨

大獨佔企業的破產和最後一切貨幣跌價的波瀾。這波瀾的最後一環，就是一九三六年「黃金集團」國的放棄金本位。就政治上講，一九二九年的恐慌，給了資本主義的暫時穩定以創痛後的致命打擊，因為這種穩定在克服了戰後第一次恐慌以後開始，早在一九二九年恐慌以前，便深深的被動搖了。一九三一年日本佔據東三省是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序幕。

一九三七年在美國開始的戰後第三次恐慌與它以前的兩次恐慌，在很多的方面都不相同。它結束着一個週期，在這週期中，資本主義總恐慌的作用特別尖銳的出現着。不但沒有過包括一切國家的繁榮時期，而且在很多的國家，在工業生產沒有達到前次繁榮的水準時便已暴發新的恐慌，尤其是在決定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美國換句話說：資本主義市場的消納——雖然人口增加——比前次週期顯着更受狹隘的限制。（註）

不是偶然的，在這次週期中，恰恰是美國的生產沒有達到一九二九年的生產（更沒有達到一九二九年生產的最高月份）。美國社會總資本的有機組成在一切國家中是最高的一個。因此，那兒不變資本的比重最大。生產工具的生產對於工業週期決定着一切，但，正因為資本的有機組成特別高，不變資本的經常過剩也最強烈。這種過剩在不變資本的刷新和使用上起着阻礙的作用，因而在第一部門的生產上，在一般的工業生產上也起着阻礙的作用。

下面的數字完全證明這種理論的推論。

美國工業生產指數（一九二九年等於一〇〇）

註：農業生產統計比工業生產統計更不可靠。而且很大部分的生產是來自非資本主義的農莊，我們在後面所給的數

字，並不改變我們的論斷。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一九三五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七
生產資料	二七·六	四一·二	四六·五	六三·二	八二·一	八八·六
消費資料	七五·九	八四·二	八三·四	八七·六	九四·五	九四·五

在進步的社會，生產資料生產的發展速度必須比消費資料生產的速度高。如果不這樣的話，那就是說：生產力發展上的進步，勞動生產率發展上的進步已經停止下來了。在前一週期中美國經濟所表現的圖畫，是其他資本主義國未來命運的標榜。

### 生產過剩的恐慌和基於戰爭和擴軍的恐慌

目前經濟恐慌的決定的特質，是在於這次恐慌進行于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之中！包括五萬萬至六萬萬人口的国家已直接被捲入了戰爭漩渦；若干法西斯國家已把它們的經濟完全改組為戰時經濟；在其他的許多國家，擴軍成為經濟生活的日益重要的因素；這些事實是目前恐慌的最重要的特質。

這種情形所造成的結果是：再生產的統一的包括一切國家的週期進行，目前已不存在。從資本主義經濟到戰時經濟的改組，一依其程度之深淺，經濟發展完全不同。很明顯的，資本主義內在的運動法則，對於作戰國及其經濟已改組為戰時經濟的國家，已不適用。在戰時經濟中，週期的生產過剩的恐慌是不可能的。這種情形說明各國經濟狀況的空前的不平衡，由於這不平衡，目前的恐慌發展，便不能有對於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適合的特性。

在戰爭準備對於經濟尚未發生決定作用的一些國家，恐慌的進行，如下面數字所指示，多少是「正常」的：

工業生產指數（一九二九等於一〇〇）

美國 加拿大 英帝國 法國 瑞典 比國

一九三七年最高點	九九·二	一〇四·八	一二四·五	八七·二	一五三	九〇·九
一九三八年最低點	六三·九	八五·一	一〇八·五	六五·〇	一三八	六三·八
減縮(百分比)	三五·六	一八·八	一二·九	—	一〇	三〇·〇
一九三八年已知的最後一日	八四·〇	九五·一	一〇八·五	七〇·〇	一三八	七三·九

這些數字指示出目前的恐慌非常深刻而尖銳。約在一年之內，美國工業生產降低了百分之三五·六；這個速度遠在一九二九——三〇年生產減縮之上。在英、法、比諸國，減縮速度也比前次恐慌為大。

已提高的軍備支出，在這些國家，暫時起着促進生產的作用。因為這些國家擁有被擱置的資本，即未被使用的生產資本，堆積起來的原料和多餘的借貸資本，並擁有大批找工做的工人，因此，訂購軍備的結果，生產實際擴充——雖然財富並不增高。但增加殺人武器的生產，結果能改變經濟狀況，減少失業和提高支出的工資總數，這是資本主義特有的內在的矛盾。在上面已指出其數字的國家，就是如此。無疑的，美國、加拿大和法國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的生產的提高，大部分應歸功于軍需生產的提高。

作戰國和從事戰時經濟的國家，其經濟情形，便完全另一樣。由於材料缺乏，分析復困難。中國和西班牙不發表統計，日本祇在有限的範圍內發表統計。德國所發表的統計，其正確性是有理由懷疑的。

我們擬對於下面的分析事先加以聲明。像我們半年前在本刊鳥瞰中已經指出的——這裏不擬詳細加以說明——擴軍促進生產的作用並非無限制。被擱置的生產資本，原料和勞動力，一經完全被吸收於生產，則此種作用即行停止。擴軍若超過這轉變點繼續下去，則擴軍的作用急劇轉變！擴軍招致國家全面的貧窮化，和在這個基礎上引起生

產減縮，引起恐慌，但不是週期的生產過剩的恐慌，而是缺乏的恐慌，「生產不足的恐慌。」

根據現有的數字，德國工業生產沒有顯出生產過剩恐慌的任何象徵。生產增加着，物價——雖有最高的法定價格——仍有提高傾向；這裏籠罩着普遍的商品缺乏，在最近數月內，甚至缺乏某些門類的工人，如在繁榮時期那樣。

工業生產指數（一九二九等於一〇〇）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七

一九三八（前九個月）

一九三八九月

一〇六·三

一一七·二

一二四·二

一三〇·八

但德國生產的連續的提高，決不是意味着普通意義上的繁榮時期，如法西斯主義者所欲說的那樣。生產的提高不是不變資本刷新和擴大的結果，而祇是軍需生產飛躍提高的結果。和它相聯繫的，不是居民消費力的擴大，如在每一純粹的繁榮時期一樣，而是他們日益增長的貧窮化。

如下面數字所指出，就是法西斯的統計數字，也不能完全抹殺這個貧窮化的過程。

消費資料生產指數（一九二九等於一〇〇）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七

一九三八（前九個月）

一〇三·一

一〇〇

九八·七

一〇四·六

一〇八·七

根據這個數字，消費資料生產現在似乎比一九二八年增加百分之五、五。但一九三八年的數字，從三月起，包括奧國生產在內。這就是說，現在的生產必須滿足比一九二八年遠較為大的人口的消費。

德國人口（單位百萬）

一九二八

一九三六

一九三八

一九三八與奧國合計

對一九二八年的增額

六四·四

六七·三

六八·一

七九

一六·五%

即使根據官廳的法西斯統計，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一六·五，而工業的消費資料的生產，僅增加了百分之五·五。如果我們再注意一下商品的質的極度惡化，以及所生產的消費資料大部分供給軍用，統治階級的消費並未減少，那末，勤勞人民的貧窮化過程就完全明瞭了。在資本主義的戰時經濟中，也祇可能這樣。

問題是：德國經濟的這種由龐大擴軍而引起的假繁榮能存在多久？很多的象徵，說明德國已近於那轉變點！一達到這轉變點，則國家由擴軍所造成的貧窮化，便成爲生產的障礙。工業生產增加的速度日益遲緩，從外國供給原料的困難日益增大；因爲缺乏原料而中斷生產的事件日益加多；經濟的削弱日益明顯；用侵佔手段來擴大原料根據地的渴望日益迫切。因此，戰爭準備反過來變成爆發戰爭的動力。

義大利經濟，非常接近於辯證法的轉變點，一達到這轉變點，則擴軍變爲否定的因素；它也許已經走過了這轉變點。如果德國能不血刃而征服奧國和捷克斯拉夫，那義大利則在幾年來對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進行着高昂代價的戰爭。義大利無論在天然資源和資本上都比較德國貧乏。因此，龐大的擴軍，並沒有引起相似的生長的擴充，和在德國一樣。

義大利工業生產指數（一九二九年等於一〇〇）

一九三五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七

一九三八（前九個月）

九三·八

八七·五

九九·六

九六·三

我們看幾年以來，義大利生產差不多運動於一直線之上。雖在作戰，它沒有達到一九二九年的水準。這就是說，擴



軍的事情——與德日相反——甚至不是由於局部的生產的提高，而祇是由於從滿足平時需要的商品生產到滿足戰爭需要的商品生產的經濟改組。這不能不引起國家加速的貧窮化，經濟的動搖，原料和不變資本的缺乏。

一九三八年義大利工業生產實際上已呈強烈的動搖，這與「正常」的週期發展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

一九三八年義大利工業生產指數

	三月	六月	八月	九月
總計	一〇五·一	九七·八	八一·四	九九·五
紡織品	一〇二·四	七六·三	四四·九	七四·九

生產上的這種飛躍，是原料缺乏的結果，原料缺乏可以暫時的迫使整個生產部門停止工作。不容懷疑的，義大利經濟是很快的走向缺乏恐慌。

在這個週期中，日本工業生產的提高，比任何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為大，就是在這樣的日本，貧窮的恐慌也開始了。雖然在中國的軍隊的需要比任何時候為大，但工業生產的提高却已停止。

日本工業生產指數（一九二九年等於一〇〇）

一九三五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七	一九三八（前七個月）
一四二	一五一	一七一	一七〇

我們考察一下每月的數字，則日本經濟的轉變更為明顯。

日本工業生產指數（一九二九年等於一〇〇）

	全部工業	生產資料	消費資料
一九三七	一七〇·八	二六一·八	一五九·三

更新的數字，可惜手邊沒有。但從報紙消息可以明白看出，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生產開始繼續尖銳的下降，特別是紡織工業。小紡織廠歇業。輸出不够購買必要的原料，這使輸出更繼續減少（註）黃金絕大部分流出外國。國家的貧困化，不能再掩飾了。平時需要的五金消費，減至最低限度；用購買券統制五金消費；為國內平時的需要而使用輸入的原料，是完全禁止的。不為國內的需要製造皮鞋或橡皮鞋。人民非穿木屐不可。小學生由官廳「允許」赤腳入校。

不變資本缺乏的結果，造成日益增長的羣衆失業——雖然在中國有着「一百五十萬軍隊和在軍備製造業及軍備運輸業服務着成百萬的工人。從一九三八年二月以來，官廳統計就不再發表了；非官廳估計，動搖於一百三十萬至一百八十萬之間，首先是紡織業的女工。

為滿足平時需要的原料及商品的缺乏，一般的造成物價昂貴。根據日本銀行的計算，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年中，東京生活費指數，由九九·二增加到一一五·六，即增加百分之一六！

一切這些，明白指示出在日本，缺乏恐慌也開始了。

很多國家「正常」的生產過剩的恐慌和公開或秘密作戰的國家因戰爭而引起的「生產不足」的恐慌，二者這樣的同時發生，便是目前恐慌的最重要的特質。就這點上講，目前的恐慌與一九二〇——二一年的恐慌相似，但有

註：一九三八年九個月，日本祇能從外輸入十五萬六千四百萬日圓的貨物（不包括本國殖民地和佔領區域）對一九

三七年前九個月二十八萬萬五千三百萬日圓（柏林交易所日報，一九三八，十七，十八。）

一個大的區別，就是那時戰爭已告結束，而今日戰爭却在擴大中。

在兩個國家集團中，恐慌的這種根本不同的性質，也在流通過程中有其特殊的後果。我們想把最重要的簡單的說一說。

大商業物價（指數一九二九年等於一〇〇）

	美國	英國	德國	義國	日本
一九三七年最高月份	九二·三	九七·六	七七·三	九一·七	一一二·八
一九三八年已知的最後月份	八一·四	八六·八	七七·〇	一〇一·六	一一四·九

在美國和英國，物價大大跌落——這在生產過剩的恐慌中是必然的，而在義大利和日本則物價增高，在德國——至少照官價——物價沒有變動，實際上因為商品的質惡化，物價且提高了。

目前經濟恐慌的特質之一是在恐慌暴發前，黃金貯藏的分佈，就極度不平衡，農業國和法西斯國家把它們的黃金貯藏大大的用於軍備之上。世界貨幣即黃金儲蓄，差不多完全集中於西歐各國與美國（蘇聯除外）。

資本主義世界可見的黃金貯藏的分佈（單位百萬美金）

一九三六年底

總額

一九三八年九月

美國

美國

英國

英國

五〇〇（注）

八〇〇（注）

法國	一七六九	一四三五
荷蘭	二八九	五九五
比利時	三七三	三一八
瑞士	三八七	四〇八
五國合計	四八四七	五一五一
侵略國家		
德國	一六	一七
義國	一二三	一二四
日本	二七三	九七
三國合計	四一二	二三八

從上面可以看出，在恐慌暴發前，資本主義世界的黃金，就有一半集中於美國——百分之八五集中於美國和西歐各國，而三個侵略國家的黃金貯藏，合起來僅約等於瑞士。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黃金集中的過程繼續着。差不多百分之六〇的黃金，已集中於美國了（一九三八年最後三個月從英國流入美國的大量黃金，尚未包括在這數字之內。）侵略國上面所說的很少的黃金貯藏，又繼續減縮了一半。

這個「反常」的黃金分布，奪去國際貿易的通常的彈性。絕大多數的國家，首先是侵略國，不能用黃金輸出來抵償它們貿易決算的入超。別的任何國家銷它們多少貨物，它們就祇能從該國購買多少貨物。舊的意義上的「世界市場」和「世界貿易」已經不存在了。世界市場已分裂為個別的彼此日益尖銳劃分的國家市場（註。）在國際貿易

中由國家管理和組織的貿易（國與國的自然交換）起着日益增長的作用。

處于特別嚴重地位的是侵略國。因為它們的輸出不够滿足輸入的需要，因為它們沒有黃金來支付多出的輸入，因為它們不能獲得外國貸款，它們恰恰以它們的侵略行為，直接間接危害那擁有多餘的黃金和資本，可以供給它們貸款的國家，它們除了實行「自給政策」以外別無他路，而這正是加速它們的貧窮化過程的。

在這個黃金分布不平衡的基礎上，發生平行的資本市場組成的不平衡。在美國和西歐各國，借貸資本有着很大的剩餘，而在侵略國和作戰國，則缺乏很大的資本（註）在一定的程度上，這表現于利率的不平衡中。

一九三九年初銀行利率

紐約	倫敦	巴黎	瑞士	荷蘭
1%	2%	2%	1.5%	2%

侵略國家

柏林	米蘭	東京
4%	4.5%	3.5%

但銀行利率並不能完全指出實際利率的不平衡。在德國，私人貸款非付出百分之十至十二的利息不可，比其他

註：英美商約的締結以及關稅政策和貿易政策上所給予西歐各國商品交換的便利，並不改變這個基本傾向。採取這種協定的，正是那些擁有鉅量的黃金貯藏，可以在「正常」道路上互相交易的國家。

註：德國政府能在一年之內獲得四十萬萬馬克的公債，這我們不必奇怪。這在實際上是強迫公債。就經濟意義講，這種公債相似於戰時公債——祇是把那為着軍事用途，從國民經濟中提取出來的不生產的價值，加以固定而已。

國家多出好幾倍。借貸資本黃金分布的這個不平衡，祇有通過大規模的資本輸出，才可以得到調整，如像一九二〇—二一年恐慌後調整的情形一樣。但戰爭使這種調整成爲不可能，因爲任何資本輸出，都意味着增加敵人的力量。

與一九二九年的恐慌不同的另一個特質是，當時在恐慌暴發的時候，一切貨幣却建立在金本位上，而且是穩定的。一九三七年的恐慌，則開始於一九二九年恐慌所掀起的貨幣跌價的波浪尚未平復（法國法郎貶價）的時候。新的恐慌已引起英鎊及一切和英鎊聯合的貨幣（自治領，印度，斯堪的那維亞各國，等等）的新的暫時祇限於百分之幾的貶價。和英鎊沒有關係的，日圓以及很多的拉丁美洲國家——阿根廷，波利維亞，秘魯，墨西哥——的貨幣，開始繼續跌價。在德國和義大利——形式上維持着金本位——貨幣購買力實際繼續減降，實行暗藏的通貨膨脹。

不管流通過程的嚴重的動搖，國際信用制度的崩壞，但到今日爲止，却沒有像一九二九年一樣，發生大的破產。在這點上，恐慌期間還是太短促了，在一九二九年的恐慌中，大的破產也在恐慌的第三年和第四年上才發生，在大多數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發生的通貨膨脹，自然起着阻礙破產的作用，因爲債務的負擔因貨幣跌價而減輕。

這是目前恐慌的最重要的特質，它與戰後前兩次週期生產過剩的恐慌是不同的。（註）

x

x

x

x

x

說：至於恐慌的以後的發展，那在今日很難有所說明，因爲帝國主義的戰爭是不能加以計算的。一般的可以這樣的

註：資產階級的科學，對於目前的恐慌直不知如何看法。有的，例如比國學者鮑特布里尼，把它稱做「小恐慌」，固執着「三年週期理論」的很多美國人，把它稱做「正常恐慌」等等。

就恐慌帶着週期性質的一點講，它遲早必向呆滯時期的方向緩和下來。

接着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恐慌到來的，不是普通的呆滯，而是特種形式的呆滯。適應着資本主義總恐慌，而以這事實為其結果的一切原因，現在是更強烈的存在着。因此，應該接着這次恐慌到來的，同樣是不會引起一般繁榮的呆滯。如果週期的呆滯將與作戰國即侵略的貧窮恐慌同時發生，那呆滯的這個特性，也許更要強化。一切這些祇是就目前的戰爭未轉變為世界戰爭來說的，在世界戰爭的情形下，資本主義再生產的週期的發展便將中斷。

# 蘇聯第三次五年計劃下的生產工具

## 之生產

S. Gurovich  
君 既 譯

全蘇聯的人民的目光都集中在第十八屆蘇維埃聯邦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大會上。這次大會決定了許多具有歷史意義的問題，將要為發展蘇聯的國民經濟而採用第三次五年計劃。

在這一計劃的背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見那將在不久的將來超越美國和一切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之大概的輪廓。

蘇聯內政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在這次大會上提出的報告之諸提綱，充分地指出了完成這個基本的經濟的任務之具體的實際的方策。

## 國民經濟之技術的再建設

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這五個年頭中間，第二次五年計劃的主要的並有決定性的經濟任務都已達到：國民經濟之技術的再建設是大體地完成了。蘇聯已經追上了那些在生產技術方面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她已經變成一個數一數二的工業國家。在工業生產的總量上，蘇聯占着歐洲第一把交椅。

和一九一三年相比較，一九三七年中蘇聯出產的煤和泥炭，依照人口平均計算，計每一人增加了三·八倍；油類



增加二·五倍；電力一五·三倍；生鐵二·八倍；鋼三·四倍；銅二·七倍；紙張三·五倍；水泥三倍；肥皂四倍。可是不管這些，蘇聯工業生產的總量之每人的平均數，仍比美國和歐洲的在技術上經濟上最先進的國家為低。這種情形，在電力，鐵，鋼，煤，紡織物，紙張，肥皂和其他幾種商品的生產上，也是一樣的。

然而，在資本主義各國中，工業生產總量之每人平均數，在這一時期內，祇增加了無關緊要的一點兒。就某幾種個別的生產物說，甚至低落下去。結果，這些國家和蘇聯中間的差數，到第二次五年計劃告終的時候，已經變得非常之小；到現在，這差數正在漸漸地向着根本消滅的路上走去。下面的例子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一九一三年時，美國出產的煤，就每人平均數而言，比俄國出產的煤，要多二五·六倍。但是到一九三七年時，美國煤的生產却已經祇有蘇聯的四·三倍了。同樣的，生鐵之生產，美國一九一三年是俄國之一〇·九倍，而在一九三七年却已縮至三·四倍；鋼的數字是一一倍縮至三·八倍；電力是一六·六縮至五·四倍；水泥是一五·五縮至四·九倍。

## 生產工具

爲了要勝利地完成蘇聯在第三次五年計劃遭遇到的國民經濟的任務起見，必需特別注意生產工具之生產的進一步的擴展，這是很明顯的。祇有在這一基礎上，一切工業和農業部門之更偉大的進步，文化之更大的發展，國力之增大，生活水準之改善等等，才有保證。

在莫洛托夫的提綱中描劃着的第三次五年計劃，正是配合了這些需要而構成起來的。這計劃準備把生產工具之生產，在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二年這五個年頭中，提高一〇·三%，而全體工業的生產額則打算提高八·八%。生產工具之生產之每年平均的增加額，規定爲一五·二%。

在走向發展之新階段——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之完成和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之漸進的推移這一階段的時候，蘇維埃的國家必需提高機器之生產（這是整個國民經濟之技術裝備之最重要的因素）到特殊的高度。蘇聯人民必需繼續改進技術，這樣才可以獲得最大限度的勞動生產力，同時又可以使工作輕易化。

這一點，已反映在莫洛托夫的提綱內。這提綱，規定了機器生產之一二五%的增加。到第三次五年計劃告成的時候，蘇聯的全部機器的價值將達到六百二十萬盧布的數目（這是按一九二六——二七年時的固定市價計算的）。這種增加，不但意味着生產出來的機器之數量上的增加，它也意味着機器種類之擴展。例如，在第三次五年計劃期內，機器工具的種類將增加八百種；而那些具有高度生產力的以及特殊的機器，尤其是自動的和半自動的機器，所佔的比例將大大地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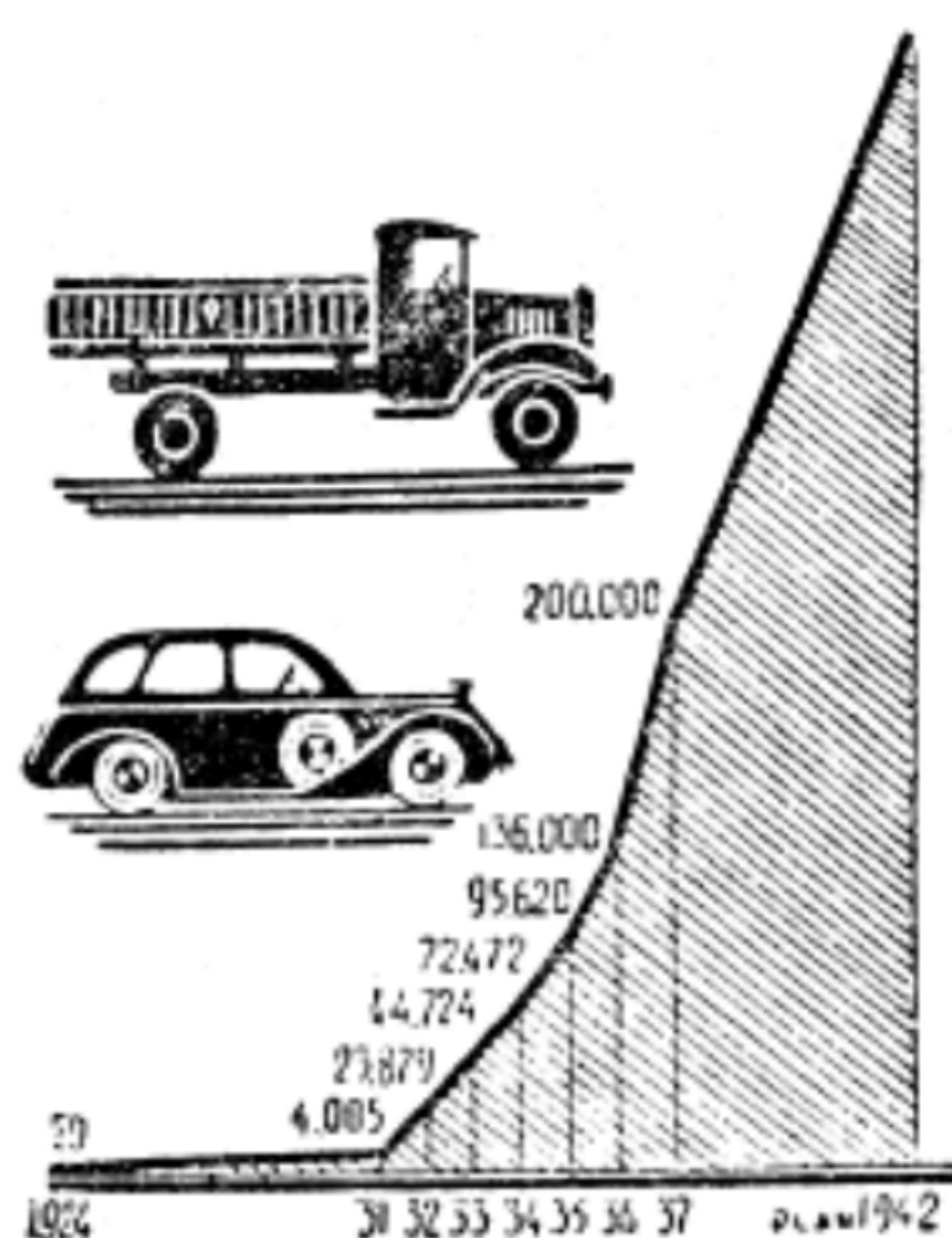
## 自動機器

自動機器數目之顯著的增加，在蘇聯的環境內，並不像它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那樣威脅着工人的生活，剛剛相反，它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反映了工人階級的技術和文化之高度的水準，並且加緊了消除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間的分歧。

莫洛托夫的提綱又規定了蒸汽渦輪（Steam turbines）之生產必需增加四八〇%；蒸汽鍋爐（steam boilers）必需增加四六〇%。動力極大的蒸汽渦輪之外，中型的和小型的渦輪之生產，也規定要增加到相當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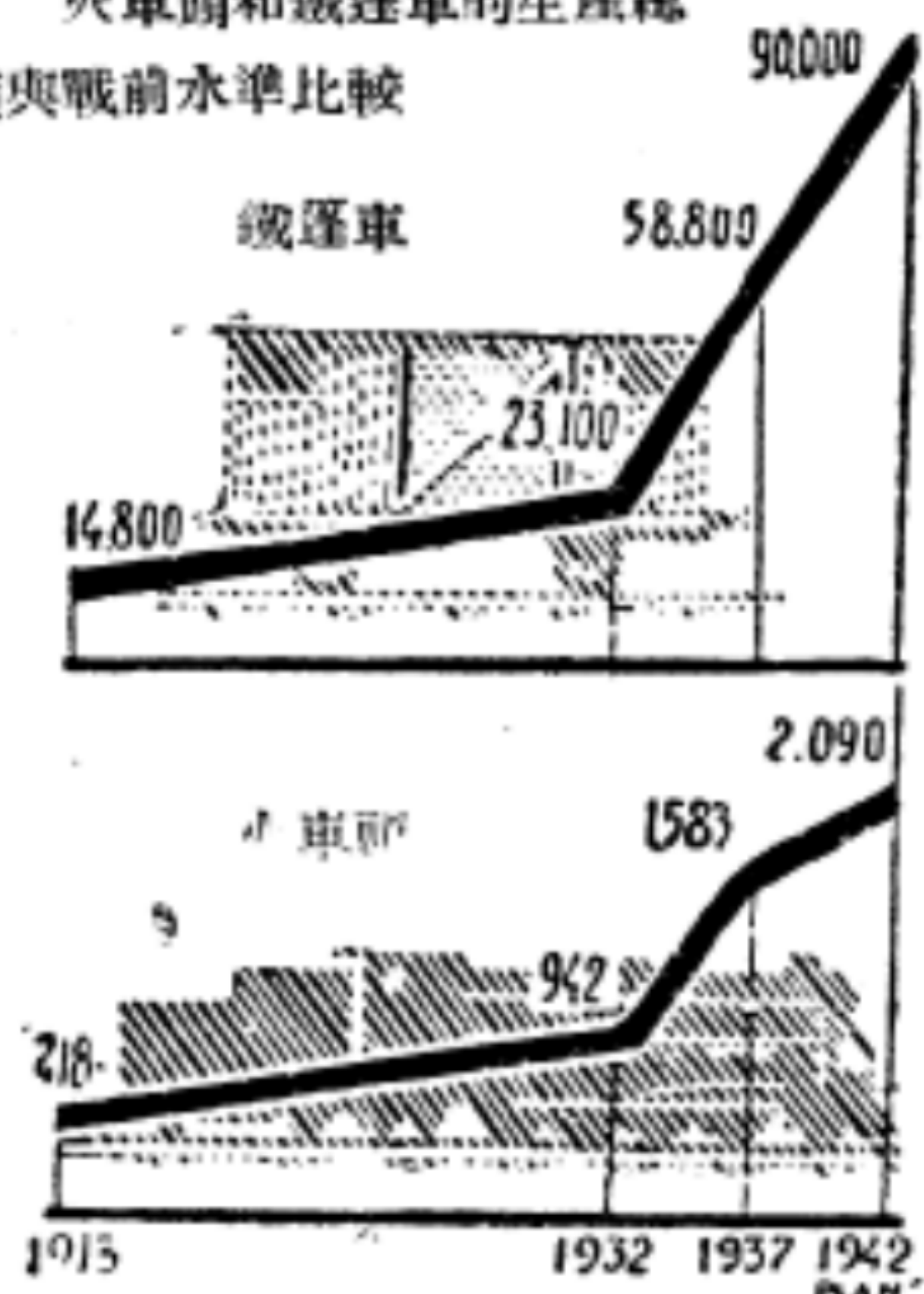
第三次五年計劃期間，拖曳機，固定機（stationary engines）和航海用的機器，尤其是用煤氣做燃料的高速度汽車的生產，將有顯著的增加。建築用的裝置和機器之生產的增大，化學工業之設備和用具之生產的增大，航海用

客車和貨車的生產總額



的大船之建造之增加……等等。  
 莫洛托夫在提綱中，關於棉織業和毛織業用的新式機器之生產，給予了特別的注意。連環式紡織機（Spinning frames）之生產，在第三次五年計劃告終時要增加至六倍，這將要大大地擴展紡織業的生產。  
 在這五年中，汽車生產將加一倍。到一九四二年，蘇聯將每年生產四十萬輛汽車。

火車頭和鐵運車的生產總額與戰前水準比較



第二次五年計劃中，蘇聯的鐵路運輸的改善，對於工業農業和貿易之發展，盡了不小的力。鐵路的貨物運輸，如戰前水準相比，增加了五·五倍，而在第三次五年計劃中它將增加更多主要路線上的火車頭之生產，將一年一年的增加，到第三次五年計劃終結時，將達到每年生產二〇九〇輛的程度。雙軸的鐵運貨車之生產將達到九〇〇〇〇輛一年。

## 冶金工業之發展

機器工業之擴展和國民經濟其他部門之成長，必然的要使鋼鐵和其他非鐵質的金屬的需要大為增加。蘇聯的自然資源是無窮無盡的，所以它毫無疑義的可以獲得一切所需要的金屬。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在鋼鐵廠的建設上的投資超過了七十八萬萬盧布；單單在許多鋼鐵廠中，就有十九個新的鼓風爐，五二個平爐，四〇部軋軋，一九個焦煤蓄電機開始工作。另外還要有許多巨大的新的機器也裝置在各機械廠裏面。鋼鐵工業已發展到蘇聯的遠東區，那兒的資源，一向未曾被人注意過，但現在却已次第開採了。

鋼鐵業的第三次五年計劃將再造二十個鼓風爐，五五個平爐，三二部軋軋，此外還有許多新機械將建立在許多機械廠里。

作為鋼鐵業之擴展和各種工具之更充分的應用的結果，一九四二年中所產出的生鐵將要比一九三七年多五二%；鋼將要多出五六%；鋼條六二%；高等鋼條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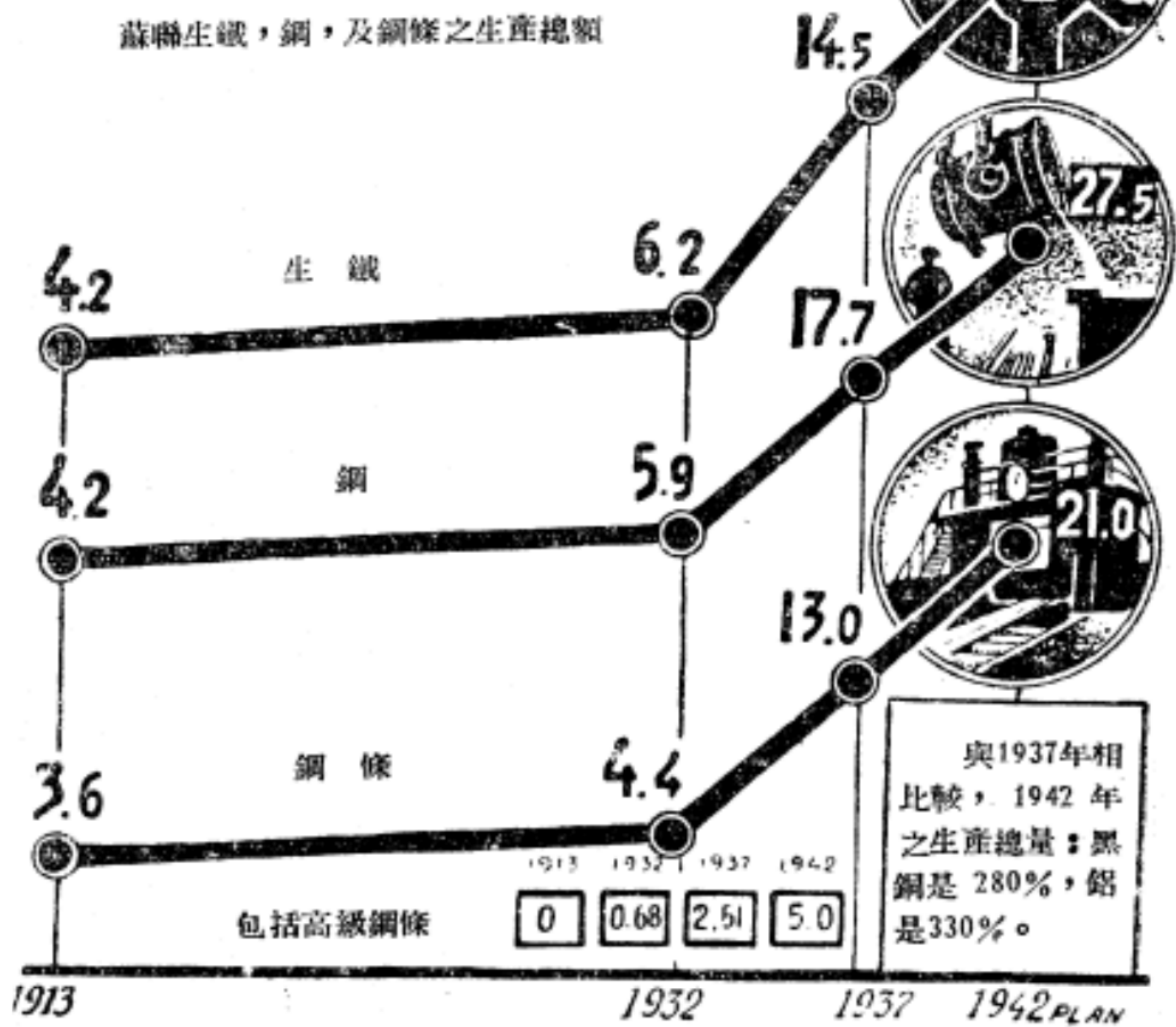
### 生產額所增的百分比之意義

第三次五年計劃中的金屬生產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數字，都代表着有巨大意義的生產量。和一九三七年相比，在一九四二年中，生鐵生產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數字將代表一四五、〇〇〇噸，鋼的生產：一七七、〇〇〇噸；鋼條一三〇、〇〇〇噸，鋼條生產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數字，足夠製造出可敷鋪設八百公里之用的重鐵軌。

鋼條生產之百分之六的增加額，可以用來鋪一條從紐約到舊金山的鐵道。這就是這些百分比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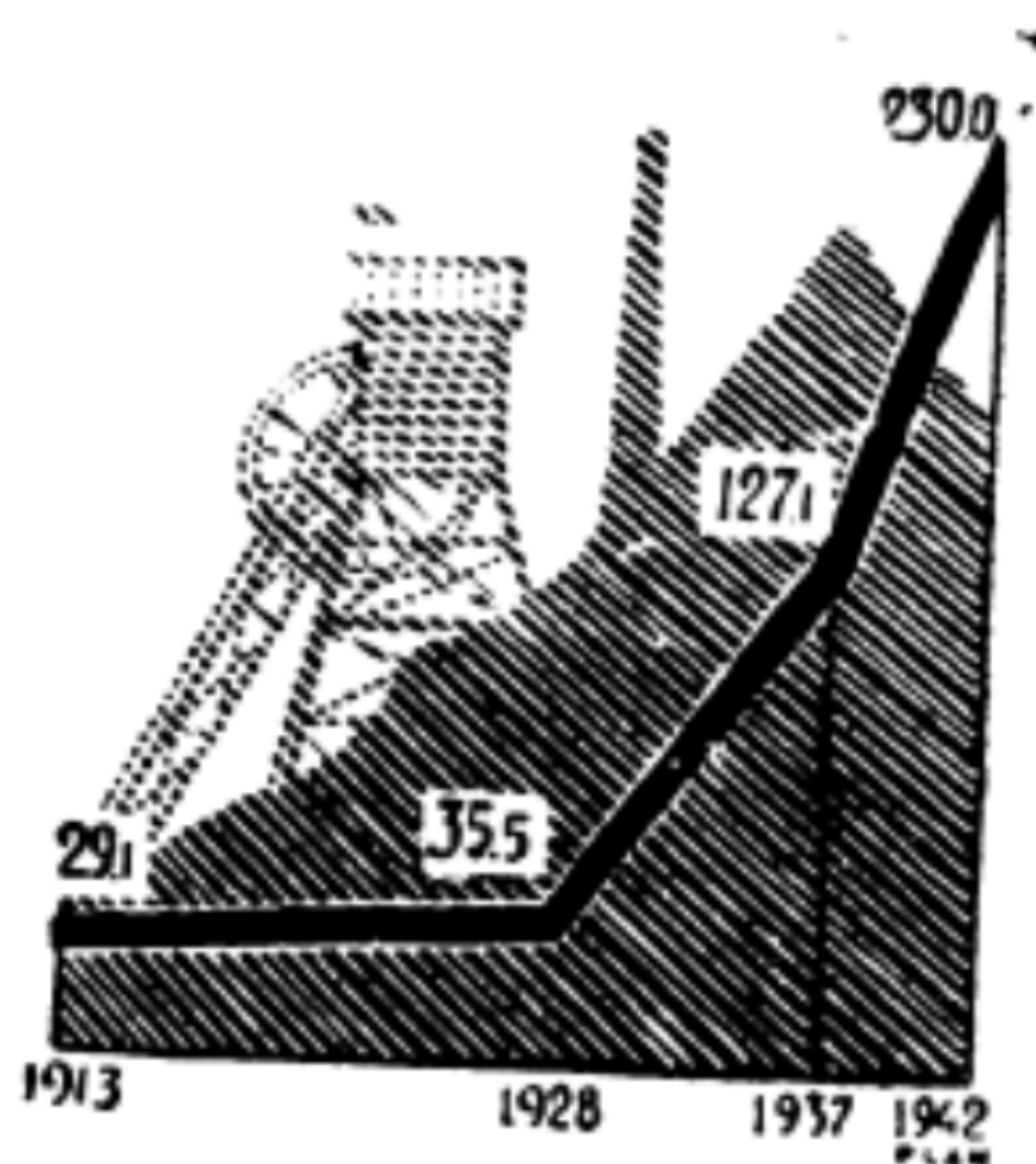
蘇聯生鐵，鋼，及鋼條之生產總額



當第三次五年計劃期內，蘇聯的鋼鐵生產增加額之每人平均數急劇地提高。她正在闊步地追過那些在這方面比較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蘇聯擁有一切她所需要的原料。在一九四二年她將開採四千萬噸鐵，單就這一點看也就可見其富藏的一班了。

作為工業生命素的燃料，在這次計劃中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在莫洛托夫的提綱內，有如下一段話：『煤的開採要開展到不但是數國內目前所需要的程度，而是要提供工業的庫存和國家的儲藏之用。』到一九四二年，蘇聯煤的產

蘇聯煤礦與戰前水準比較  
(單位百萬噸)



量將達到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噸，而在一九三七年則祇有一二七、一〇〇、〇〇〇噸。這二數目的差數所代表的煤，如裝在貨車上，而再將這些貨車連起來的話，那末它將足以環繞地球赤道二圈而有餘。

莫斯科附近的煤田，烏拉爾中亞細亞和其他各處的煤田，在第三次五年計劃中將被特別注重地開發起來。每年可以出產一萬五千萬噸的新礦穴，將在

這些煤田中間開掘起來。而現在已在開採的諸煤田的產量也將大大地增加。如果我們回憶一九一三年的俄國煤的產量祇有二九、一〇〇、〇〇〇噸，那末，這個已經完成和即將完成的供給蘇聯全國燃料的工作之規模宏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泥炭的產量將在第三次五年計劃中同時增加二·六倍。

蘇聯是世界上唯一把那爲許多科學家研究着的煤礦地下化氣法付之實施的國家，這樣一來便可以使成千成萬的煤礦工人不必鑽到地穴裏去做工。這個新園地本身正在變成一個新的完全獨立的工業。

### 油類生產額之增加

採油業之大規模的開發，在第三次五年計劃中也已經有預示了。重油和煤氣之生產，到一九四二年將達到五千四百萬噸。換一句話說，和一九一三年（這一年那在當時被外國統制着的俄國的煤油生產達到了最高點）相比，一九四二年的產量將增加足足六倍；和一九三七年相比，則增加三·二五倍。每年能煉油一千五百萬噸的新的煉油廠和每年生產四、五〇〇、〇〇〇噸的化鍊廠將次第開設起來。

除了舊油區的生產擴展以外，莫洛托夫的提綱還規定建造一個新的油業中心，『新的巴庫——在烏拉爾山脈和伏爾加河之間的區域內。在這個區域內，幾百萬噸的煤油，現在已經在被開採出來。這區域內的拖曳機和汽車現在都用這區域所產出的油。然而這些已經獲得的成績，還只是一個開始。若干新的具有化煉六百萬噸的能力的煉油廠，正在被計劃着。這橫在蘇聯中心地帶的富足的油區有着偉大的前途。在第三次五年計劃完成時，它將超過巴庫油區。把美國的油類潛藏量和烏拉爾伏爾加區的作一比較，決不是沒有意義的。在一九三七年正月一日時，美國境內的土地已知的煤油潛藏量是十八萬萬噸，而烏拉爾，伏爾加區的則是十一萬九千萬噸；一九三七年中的新的油礦之發現使美國的煤油潛藏量增加了二萬六千四百萬噸，而同年在烏拉爾，伏爾加區域內所發現的未供開採的油區，使這區的潛藏量增加了一倍以上。

下面這一張地圖指出在烏拉爾，伏爾加區域內已加開採的諸油田之許多榨油廠和煉油廠之分佈狀態。

年的泥炭之生產將達到四千九百萬噸，在五年中差不多要增加一倍。

燃料工業之其他部門——泥炭和泥板巖——之生產，在第三次五年計劃中也將大大地被發展起來。一九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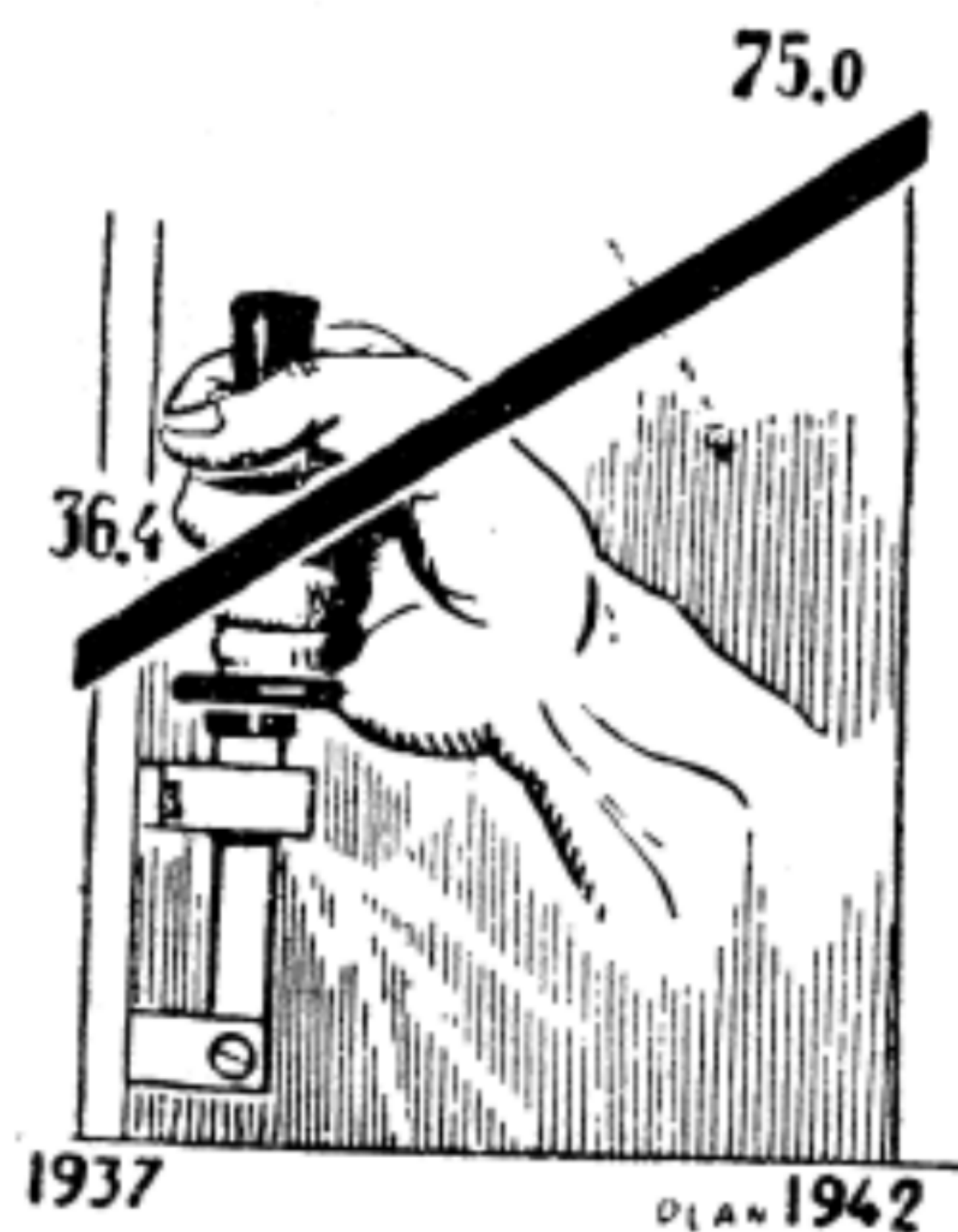
## 電力

第三次五年計劃特別注重電力工業，在這五個年頭中，電力之生產將增加一〇六%，即是達到七百五十萬萬基

羅瓦特小時，而同時各電力站的發電力都要增加一倍以上。

莫洛托夫的提綱不但號召建立許多大大小小的電力站，它也要求竭力擴大那既存的全世界頂大的發電系統：柯別雪夫（Kuibyshev）的一個水力發電站。它們的發電能力之總量是三百四十萬基羅瓦特。這又將同時解決伏爾加流域的荒瘠地帶的灌溉問題，並改善伏爾加河和卡馬河的航路。

電力生產總量  
(單位百萬基羅瓦特)



## 化學工業

蘇聯的化學工業正在長足進展着。這一個從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後產生的完全新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工業，已經獲得了極大的地位，但它的發展在若干場合還不能完全趕上那日益增加的國民經濟上的需要。因此，莫洛托夫的提綱便規定化學工業必需達到能適應國家和國防上的需要的程度。『第三次五年計劃是一個化學工業的五年計劃』在提綱中這樣宣稱着。個別的說起來是肥料的製造，將加一倍，農業上的滅虫化學藥品之生產將增加四倍

至六倍。化學工業之新的部門更將依次成立起來。

化學工業，就全體說來，在五年中將要增加一二十%，它的產物之全部價值，將達到一百三十四萬萬盧布的鉅數。如果把其他部門一一羅列起來，那末，在第三次五年計劃終結時，水泥的生產將達到一千萬噸，木料二萬萬立方米，木板四千五百萬立方米。第三次五年計劃中的生產工具之生產的廣泛的發展的圖影，至此已可說近乎完全。這圖影正反映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年青而茁壯的組織之偉大的成長。

# 日本破壞中國法幣之面面觀

嘯雲

## 一 日本爲什麼要破壞法幣

日本爲什麼要破壞中國法幣，關於這問題，不外是法幣樹立了中國戰時經濟與金融的基礎。在抗戰中，它演着極偉大的作用。

馬寅初先生在其「法幣法價打破之危險」一文中曾經說：

『……無論爲金融財政，國內外貿易，復興農村經濟，或一般經濟建設，皆不能離開法幣而可有爲。倘法幣法定匯率一旦打破，各方均將受嚴重之打擊。前途危險不堪言狀……』——（見財政評論一卷二期）

法幣的法價一旦打破，即會發生如此危險，那末，假若法幣的價值爲日本所破壞，其所可發生的嚴重後果，當然不言而喻。簡略的說，這會減弱了對外軍需品的購買力，直接影響到抗戰力量，其次間接上，亦將因法幣的信用動搖，而影響人心。所以日本對法幣才千方百計，毫不休止的進行其破壞工作。

而且日本因其侵華戰爭的糜費浩大，脆弱的財政經濟日陷於崩潰之絕境，而「速戰即決」的戰略又無法得售，政治方面的誘和詭計亦完全失敗，爲圖早日結束在華戰爭，它不得不更積極地進行其破壞法幣的陰謀，夢想着能從

法幣的破壞上，來達其摧毀中國長期抗戰之經濟基礎。

## 二 日本怎樣破壞法幣

日本採取一些什麼方法來破壞中國的法幣？概括地說來，約有以下幾點：

第一，在強佔區內強迫中國人民使用其一錢不值的軍用票；企圖以大量的軍用票之行使，來搗亂中國金融而破壞法幣。

第二，在華北華中的強佔區內，組設偽「聯合準備銀行」，發行千百萬不兌現的偽鈔，用以奪取法幣購買外匯，妄想以此種方式來減弱法幣準備基金，而動搖法幣的基礎。

第三，即為日本對於中國民間的存銀的搜括，銀行股票和政府公債之收買，企圖用此種方式來打擊中國之法幣。

第四，為日本在偽「聯合準備銀行」成立後，即以「聯銀」偽幣為中心，企圖驅逐法幣。如一九三八年六月十日，偽「臨時政府」發佈命令，禁止南方地名或未印地名的法幣在華北流通。後來又減低法幣與「聯銀」偽幣的交換比率，如法幣一元只準換得「聯銀」偽幣九角，以後又將法幣的交換率降低至六角等。

第五，即為日本於本年度三月十一日宣佈，在華北禁用法幣。而上海之虹口區，據傳亦擬在四月以後，將用日元以替法幣。

第六，即為日本最近在東京上海等地，仿造中國中央、交通等銀行鈔幣數千萬元，企圖以「魚目混珠」的手法，將此種偽造之法幣在市面混用，以期擾亂金融破壞法幣的信用。

### 三 日本破壞法幣獲得了什麼效果

從以上所列舉的六點看來，日本破壞法幣的陰謀詭計，雖然各式各樣，似乎層出不窮，愈來愈卑劣無恥了。然而，到現在為止，日本破壞法幣的工作，究竟獲得了一些什麼效果呢？

實際上日本對於中國法幣的破壞，雖是無所不用其極，但可說它並未曾得着它所預期的效果。

例如以日本用武力強迫其控制區內中國人民使用偽幣和軍用票而論，中國人民，因迫於日本的淫威，雖不得不暫時收用——（據調查，此項偽幣與軍用票流入強佔區者，其總額已達二三十萬元之鉅。）但因此項偽鈔票均係強迫使用，完全沒有絲毫之信用與價值，中國人隨得隨出，致偽鈔票充塞於日軍控制區的市面，而法幣却為民衆所珍藏，不肯輕易放出。

而且日偽鈔，在游擊區內的行使，也僅限於日軍武力所能直接控制之城市，城市以外，和與英美法等國有關的都市中，日偽鈔依然到處被擯棄，而無法自由流通。

其實，日偽鈔不但中國人民與外商，除萬不得已時不肯輕易使用，就連發行這些鈔票的自己商人，在交易時，也不肯當作有價的貨幣接受。如最近日本商人對華北的貿易，即有轉變為「以貨易貨」的趨勢。日本自己的商民對於在華的日偽鈔已存如此不信任心理，至於其他國家人民，當更可想而知。

其次，如以日本之減低法幣價值，禁用法幣，並企圖以偽幣代替法幣等而論，亦未曾獲得任何效果。譬如在天津租界中，法幣價格常高於偽幣之價格，以偽幣掉換法幣，每千元倒須伸水十五元至二十五元。

日本雖早就對華北法幣施以限制，然而華北法幣流通額，在戰後，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據中央銀行調查，華北

未淪陷之前，法幣之發行額，至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截止，爲三萬三千五百六十一萬二千一百零五元，與前年一月一日之三萬零一百八十九萬八千八百五十五元相較，反而增加了三千三百七十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元，由此種數字即可證明，日本限制法幣行使之徒勞無功。

最近日本雖已在華北頒佈禁止法幣流通之皇皇禁令，但事實上，此種禁令毫無效力，因法幣除在若干大城鎮及鐵路一帶，日軍所能直接控制的區域而外，依然照常行使。而最近大陸報的記載，亦恰足證明。茲摘錄該報記載如下：

「……頃悉，華北於名義上，雖廢除中國法幣，但並未能使法幣在天津英法兩租界絕跡。且以之易北平偽幣，亦未跌價。反之，近數日來，法幣易偽幣之伸水，反有增加。如本月九日法幣之伸水爲百分之·六三，至本週初已增至百分之二·五了。天津租界內各中外銀行，均辦理中國法幣與三月十一日以前無異。」——（見三月十七日申報）

總之，日本破壞法幣之種種陰謀，已均告失敗。他企圖以偽鈔替代法幣的詭計之毫無效果。就連其本國的「支那通」木村增太郎，也不得不作如下公開之承認：

『要由此頂換法幣，決無效力。認爲這種政策有成功可能的，只有不認識法幣的人才敢樂觀。』

『如果日本對中國法幣，不採取新的破壞法，必定徒勞無功，反陷日元於不利的地位。』  
事實上，日本之在華濫發鈔票，業已使日元在對外匯價上跌落了。

#### 四 日本破壞法幣失敗的原因

日本在長時期中，運用種種手段以破壞法幣，爲什麼均告失敗，而總不能達其目的？這原因在我們看來，大約有下列四點：

(一) 法幣信用基礎堅強 中國目前所行使的法幣，不是以個別銀行信用為基礎的貨幣，而是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的法幣。因其信用建築在強固的政府信用的基礎上面，它具有貿易通貨和國際通貨的機能，所以它的對內對外信用，都極為堅強，然而反觀偽幣呢？雖然日方在其最初成立偽「聯合準備銀行」時，擬攫取滯存於華北的白銀六千萬元作為偽幣購買外匯之準備金，可是結果因此項白銀均存於天津租界各銀行，以致日本此種企圖無法達到目的。發行鈔票是不能不有準備金的，而華北「聯銀」所發行之偽幣，在名義上，雖是以日本借款一萬萬元為發行準備，但實際上，却是一個空洞的騙局。日本自身尚感告貸無門，何來如此巨款貸予偽「聯銀」？雖則偽幣是以日元及東北之「滿券」加以支持的，但就以日元的本身而論，其信用尚在風雨飄搖和下落中——因日元準備祇有二萬萬元，而日本鈔幣原本限於一億二千萬日元，自對華發動侵略戰爭以來，日本紙幣的發行額，已增至二十二億日元。它自己貨幣信用，尚需別人為其撐腰，怎能談得上支持別人？

因偽幣在對外方面既不能買賣外匯，對內又不能兌現，自然亦無信用可言。偽幣的信用和價值既與法幣如此懸殊，日本欲以偽幣來破壞並替代法幣，就等於癡人說夢！

(二) 法幣為中外人所支持和擁護 我們知道，法幣不但為國內人民所擁護，而且也為英美等友邦——特別是英國所支持。英國要盡力支持中國的法幣匯價是為英國在華的商業與投資數額極大，英國要發展商業，首先需要中國人有購買力。假若中國法幣受打擊，則中國一般人民的購買力，必因之而減低。這對於英國，是很不利的。而且法幣受打擊，英國之在華投資，亦必遭受損害。英國人為維護其自己的利益，亦不能不對中國法幣加以支持。況除此而外，英國尚負有「國聯」決議案上應當援助中國之義務。

在國內方面，可以說凡具有愛國心與民族意識的人，無不熱烈地擁護和支持法幣。因法幣的準備金充足——據

查，法幣現金準備，中交等行，戰後均始終在百分之六十以上。——與信用卓著。當然中外人士是絕不會捨棄信用堅強的法幣，而去信用那毫無準備金等於廢紙之偽幣，這是日本破壞法幣失敗的第二個原因。

(三) 政府措施得宜 中國法幣在日本千方百計的破壞之下，至今仍然信用堅強，毫無所損。除上述兩個重要原因外，無疑的，政府方面對於日本破壞技術，能够敏捷施行正確對策，亦為法幣價值穩定之重要因素。

例如：政府方面對於日本在強佔區，以槍刺威迫中國人民使用軍用票和偽幣，企圖藉此種手段，奪取法幣購買外匯，增強其侵略力量，削弱中國外匯基金，動搖法幣之基礎。並採取淪陷區內的各種農產物，轉運歐美，企圖換取英美各國外匯的時候，政府就立刻實行外匯統制政策，頒佈限制法幣流入強佔區，和取締日偽鈔行使等法令。因政府方面對於購買外匯者施以限制，——如中央銀行對於每週百餘萬的外匯請求，僅核准三萬磅左右，在武漢失陷後，外匯核准之數額，更減至一萬磅。而財部為防止法幣巨量流入強佔區，所規定之辦法，則有：由內地匯至上海之款，一律以匯劃票據付給。由上海以匯劃票據匯達內地之額，均以法幣十足付給。此外，並限制攜帶法幣至上海。其辦法則為：凡經各關開往上海之輪船，所攜法幣以五百元為限，其餘數目均須妥具保證，俟到達上海，即全數移存於上海中央銀行，作為活期存款。而國內公債之還本付息，亦改由重慶十足付款。上海則分六期償付。凡此種種辦法，遂使日本企圖，不得不歸於失敗。

同時，政府方面為杜絕強佔區內土產物資敵，和日偽鈔票之汎濫，而頒發的取締令，——如一切足以資敵的物產，均禁止出口。和凡為日偽銀行之鈔票，軍用票，及其他性質相同的鈔票，無論在任何地方，一律禁止行使，收受。凡為日方收藏，轉運，或行使偽鈔的，以及利用法幣金銀，或匯兌方式，換取偽鈔而營利者，均依「懲治漢奸條例」論罪，這都是以鞏固法幣之基礎信用，而使日本破壞陰謀無法得售。



(四) 法幣法價之堅持 大家知道，當中國實行外匯統制政策後，在上海等租界區域內，就產生外匯的黑市。在黑市場中，法幣的價值，亦由十四便士降低至八九便士。法幣在黑市場中的價值，雖被貶低，但政府方面對於所核准的外匯，仍然不顧一切的堅持着。一先令二便士半的匯率。因政府方面不因黑市場的法幣法價跌落而貶低幣值，始終堅守法幣之法價，致法幣在國內外的信用，越發堅強，法幣法價之始終堅持，亦可說是日本破壞陰謀無法得逞之重要原因。

## 五 法幣之前途展望

雖然，從以上論述看來，日本想了許多破壞法幣的方法，結果均在費心機，而法幣的內外信用依然堅強。但不論法幣的基礎如何穩固，而處心積慮非破壞法幣不休的日本，今後是決不會停止其對法幣之破壞活動的。並且事實上，日本國內經濟策士們，業已在運用不十分聰明的頭腦，在窮思着如何才能夠破壞中國法幣之陰謀了。

例如號稱「支那通」的土屋計左右，最近就擬定了如下一個破壞華中法幣的新策略：

「在華中應該建立一個怎樣的幣制？頗有不少的學者提出來討論，大家的結論似乎是這樣：最好建立一個足以代替法幣制度的新幣制，一如華北所為者。但照目前華中的環境及「維新政府」的實力來看，恐怕一時辦不到。

「不過，……我們明知在實行上有很多困難，但不能因此就束手不去做……」

「然而，怎樣積極來建立華中的新幣制呢？我以為要在華中實行新幣制，首先要以新幣代替法幣，設法禁止法幣的流通，驅法幣於華中之外。……蓋現在法幣制度的存在，對於中國是有利的，而對於日本是有害的。……使中國有利的，就是靠法幣可以作貿易上通貨；反之，日本所不利者，就是無此貿易上的通貨。……所以吾人欲建立華中新幣制，必

須以能自由購買外匯的通貨構成之。……若發行新幣制而不與外幣相連繫終，未堪實現吾人之理想，成立可以代替法幣的新幣制，那唯有再蹈華北「聯銀」之覆轍而已。

「所以新通貨必須較現行法幣為良貨，最初的現金準備，對發行額，應為百分之百。待將來信用擴充後，再行減低現金準備律，擴充保證準備。」

「現行法幣價值為八便士強，而日元在上海的匯價為八便士至九便士之間，故新通貨的匯值，似亦應以此水準為根據……」——以上摘自土屋計左右所作「華中幣制問題之新對策」。

毫無疑問，土屋計左右這次所擬破壞華中法幣的新政策，亦和其不久以前所擬「恢復銀本位硬幣」利用民間重銀不重紙的心理，以破壞法幣的計劃，同樣不過是一種夢囈！因為在目前，日本資金日形枯竭的窘境之下，是絕無力量依照土屋氏的計劃，在其強佔區，製造準備較法幣更強，信用較法幣更好之偽幣來和法幣競爭的。現時日元因其準備金不足，尚且朝不保夕，那裏還能夠談到其他。日本經濟策士們，絞盡為腦汁所思索出的計謀，不僅表現出他們自身的愚蠢，並且也適足以反映出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技窮力拙，盲闖和亂撞而已。

總之，從純金融政策方面看來，不論日本如何狡詐，如何頑強的企圖破壞中國法幣，但未來的事實必能證明它將和從前一樣會毫無所獲，而中國法幣將繼續穩固，特別是最近中國獲得英國一千萬磅借款作為匯兌平準基金後，在政府穩定幣值，至衡匯價採取更積極的辦法之下，必然能使法幣日趨堅挺和不可動搖之境。若擴而大之，從政治軍事觀點看來，中國法幣之穩固，將必然直到抗戰最後勝利了都無問題。從軍事上講，中國已經接近了相持階段的局面，顯示了中國已有制勝日本的把握，因之中國人民對於勝利的信念也加強了，而熱烈支持法幣擁護法幣更不必說。其次從政治上說，在第二期抗戰中已將投降分子汪精衛等掃除了去，中國內部各黨各派各階層，團結得更為鞏固，法幣的

了。價值，本來是建築在信用之上，人民無間老小無分男女，全都信用政府，全都擁護政府抗戰，法幣也就無法給日本破壞

# 日本覬覦中之華南之資源

金 喻

(根據日本東亞經濟局調查)

## 一 華南之面積與人口

若分中國本部爲華北、華中、華南的時候，則華南通常就是指南嶺以南之地。所謂南嶺，是在揚子江的南面，西從雲貴高原起東至海岸所連續着的許多山脈之總稱。所以華南和華中的境界，不甚明確。但根據一般的說法，則稱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五省之地爲華南。其面積和人口如次：

### 華南之面積與人口

省名	面積 平方公里	人口 千人	一平方公里 密度 人
福建	一二一、〇五〇	九、六三七	七六·六
廣東	二二三、八四四	三三、〇二三	一四六·一
廣西	二一九、八七六	一一、九四九	五四·四
貴州	一七六、四八〇	六、九〇六	三九·二

姑認以上的統計數字爲正確，則華南之面積是百十四萬平方公里，較「僞滿」的面積稍小，而七千二百萬的人口，則較「僞滿」的人口多二倍。

華南或稱爲珠江（西江）流域，可是並不像華中是揚子江流域，華北是黃河流域那樣的準確。成爲華南統一之紐帶的珠江，所占的區域並沒有那樣大。實在說起來，華南無論在自然方面或在人文方面，大半有着地方的差別。若根據克勒茨西所劃定之地理區，則華南所包含者爲東南海岸地帶之一部，兩廣山地，西南臺地三個地理區。屬於東南海岸地帶者爲福建省和廣東省之一部，屬於兩廣山地者大體是廣東廣西兩省，屬於西南臺地者即所謂雲貴高原地方之貴州雲南兩省之地。

## 二 華南之土地利用

華南地形上之特色，第一爲多山。例如福建省可以說是老年性的高原地，距谷底約有五百米乃至八百米高，最高的達二千米，平均大約爲一千米。平原不過僅佔全面積百分之五強。兩廣亦同樣是萬山峻嶺，高度約從五百米到八百米，其中亦有達二千米者。珠江下流的廣東三角洲，是最大的平原，其面積約爲七千五百平方公里。兩廣之平原占山地百分之十。西南臺地即雲貴高原爲西藏高原之延長；雲南東部之高度爲二千米，貴陽約達一千一百米，珠江流域附近雖也有高六·七百米的地方，但大體上可算是中國本部第一高原，其平原僅佔全面積百分之五。

因爲地形的關係，華南耕地甚少。根據克勒茨西之調查：兩廣地方之耕地面積佔全面積百分之八，雲南高原耕地面積佔全面積百分之四，其次包含着浙江福建雲南海岸地帶之耕地面積爲全面積百分之十五。

華南之耕地若與華南之總面積比較，則耕地面積非常的少。據克勒茨西之統計，耕地每一平方公里所當之人口：東南海岸地帶爲一，〇二一人，兩廣山地爲一，三一八人，雲貴高原爲一六一八人。華南是人口過剩，福建廣東兩省，自古爲華僑之老家，也許就是這個緣故吧。

華南之農產物，有米，麥類，高粱，粟，玉蜀黍，豆類，茶種，棉花，烟草，茶，生絲等。農產物大體堪供自給。

珠江三角洲，因土地氣候適合於耕種，故米產很豐，每年收成兩次。廣東省是中國諸省中第一個產米的地方，每年產米額達一億四千萬担；此外福建每年爲四千五百萬担，廣西爲五千一百萬担，貴州雲南兩省各爲三千二百萬担；華南五省合計，約爲三億擔。可與日本全國產米額相等，而占全中國米產的三分之一。但廣東因人口過多，米量反形不足，每年須自安南諸地輸入多量的米。又華南各省之穀物生產數額如次：

華南各省穀類生產額（一九三六年——單位千担）

	米	糯米	小麥	大麥	高粱	粟	玉蜀黍	其他
福建	四四、八〇五	五、八二七	五、三七三	八八一	二一一	一、八八〇	—	—
廣東	一四一、五八三	七、二六一	一、九八七	四五二	一四五	一、三九五	二四九	—
廣西	五一、六六〇	七〇三	三三四	四七	二五六	四、九三〇	—	—
貴州	三一、五九九	九、〇四七	四、五七三	三、〇六五	六六八	八八三	五、九八四	一二二
雲南	三一、八三八	五、八八〇	六、一六三	二、一八二	七七五	八九〇	八、八二六	七五九
合計	三〇一、四八五	二八、七一九	一八、四三〇	六、五八〇	一、六五六	五、三〇四	一六、九八九	八八一

除米以外之穀物甚少。此外食用農產物如豆類及薯類之生產額如次，但其生產量遠遜華北華中。

華南各省豆類及薯類生產額（一九三六年——單位千擔）

	大豆	豌豆	其他豆類	蕃薯	馬鈴薯	芋
福建	一、九〇三	—	三	一六、二六九	—	六四
廣東	二、六一六	—	四〇六	一七、三六八	二、七二二	一、二三六
廣西	一、〇三九	—	—	一一、一五二	—	四、四八三
貴州	三、九二一	二一	一九一	一、二七〇	—	—
雲南	三、四六二	三九五	三、〇二三	三、四〇七	四、四二〇	九九八
合計	一二、九四一	四一六	三、六二三	四九、四六六	七、一三二	六、七八一
全國	一四六、九一九	一四、一九五	二四、六八九	二七七、五九〇	三七、四九三	二八、九一五

華南甘蔗生產額，達二千七百萬擔，占全中國產額二分之一，尤其是廣東省為全國第一個甘蔗產地，因此華南也就成為中國製糖業最發達的地方。其次如烟草，也是華南主要之工藝用農作物，又華南之工藝用農產物的產額如次：

華南工藝用農產物產額（一九三六年——單位千擔）

	棉花	烟草	落花生	甘蔗	大麻	菜種
福建	二二	三一	八〇七	四、一二六	八	五一
廣東	三四	一四三	一、三三八	一一、二二〇	一六六	二五二
廣西	六八	一一〇	一、一〇七	一、二六五	—	四四

貴州	二四七	七二	三七	二五	三〇〇
雲南	九五	四三九	五四五	九、四二八	二一
合計	四六六	八〇五	二、八二四	二七、〇三九	二〇二
全國	一五、七八八	三、四四六	四二、三七九	四九、九三四	一、七〇三
					一一、五五四

此外，茶在廣東、廣西、福建、雲南各省也栽培着。廣東省之茶，年產達七千二百萬公斤，其產地為南海、清遠等縣。又廣西之貴縣等處，繭之年產為五萬五千擔，生絲年產為三千五百擔。福建省之茶，年產達八百萬公斤，尤以武夷巖所產的為最有名。雲南省之茶，年產不及福建省的十分之一。華南是中國主要之茶產地，茶亦為此地之主要輸出品之一。輸出品中更重要的是生絲。養蠶業在廣東省，從四月到十一月，共有七次的收穫。每年的繭產額達五千九百萬擔。廣州、順德、佛山等處為其主要產地。生絲之年產為數多少不詳，可是最近的輸出額，則為二萬五千擔。又廣東省之海南島和廣西省西部，所出產之蠶絲，輸往日本者頗多。

因為華南是熱帶地方，福建、廣東出產果物亦甚豐，尤以甘橘類為最多，而以美味出名的是荔枝，此外如香蕉、波羅密、芒果等。

### 三 林產・蓄產・水產

中國畜牧很盛，華南之畜牧業較之華北、華中為差。家畜中以豬為最多，主要之家畜數目如次：

華南家畜數目（一九三五年——單位千頭）



	豬	水牛	黃牛	馬	騾	驢	山羊	綿羊
福建	二、〇六九	二六〇	四〇一	八	四	二二	四三八	—
廣東	四、六二七	一、三三二	一、〇五七	二〇	三	二	三三四	—
廣西	……	……	……	……	……	……	……	……
貴州	一、六五二	六九四	五四六	二〇〇	二二	六	四一五	一二〇
雲南	二、六九六	七一四	八〇五	四七一	三一四	五〇	五〇一	一一一
合計	九、〇四四	三、〇〇〇	二、八〇九	六九九	三四四	八一	一、七八八	二三一
全國	六二、五六八	一一、六〇三	二二、五九〇	四、〇四〇	四、六三八	一〇、四八五	二一、六七三	二〇、六〇三

因家畜較多，所以獸毛、皮革、獸肉、獸骨等畜產也不少，此外如供給香港等地，亦有多量的生牛、生豬、雞等之輸出。其中尤以廣西省輸出為主。

中國森林很少，森林之面積，約佔全國土地面積的百分之八·四。森林總面積中：福建省為百分之十八，廣東省為百分之十，廣西省為百分之五，貴州省為百分之九，雲南省於百分之二十三。全國除四川外，以雲南省之森林為最多，故其木材產量亦不少。其次為福建省，森林產地在閩江、九龍江、汀江等流域。每年輸出約達二千萬元。

華南的林產除木材外，有桐油、樟腦、竹、籐、樹皮等。桐油為中國之特產，亦為現在中國主要的輸出品之一。每年輸出額近九千萬元。揚子江以南為其主產地。華南桐油產地在廣西、貴州、福建、廣東等處。

福建廣東的海岸多曲折，島嶼星立，沿海且多魚族；故漁業頗盛。如大黃魚、小黃魚、鯛、大刀魚、勤魚、海沙魚、比目魚、鱈等。惜捕漁法太舊式，若加以改良後，其捕獲之數，定甚可觀。

製鹽也盛行於福建、廣東兩省海岸。製鹽場所，在廣東省有十七處，在福建省有六處。都是依天日製鹽法來製造者，每年的製鹽額：廣東省約為三四百萬石，福建省為二百萬石。

#### 四 礦物資源

華南之礦物資源，較華北和華中為差。如鐵、石炭、石油等最重要的資源，華南則較為缺乏。但錫、鉛、錫和其他之特殊金屬則很多，這是華南礦物資源的特色。

石炭——華南石炭之埋藏量：福建省有三億九千六百萬噸，廣東省為四億二千一百萬噸，廣西省三億噸，貴州省十五億四千九百萬噸，雲南省十六億二千七百萬噸。合計為四十二億九千三百萬噸，僅當全國二千三百二十六億噸人百分之二。中國之石炭，差不多全部埋藏在華北和華中，故石炭不能說是華南出產的大宗。加之開採技術的稚劣，每年的石炭產額：福建省為四萬噸，廣東省三十三萬八千噸，廣西省十萬噸，貴州省七萬四千噸，雲南省十一萬五千噸；合計不過僅六十六萬七千噸而已。日後華南若成為工業區，此等石炭礦，非設法盡量加以開採不可。

石油——華南石油，可以說完全沒有，最近廣西省之容縣、南寧、思樂等地，聞有油田發現，此外如廣東定有油田的地方，如果加以開發後，華南每年所消費的石油，則不必專賴輸入了。

鐵——華南諸省中，鐵之埋藏量：福建省為二千二百四十萬噸，廣東省一千二百萬噸，合計三千四百五十萬噸。佔全中國的埋藏量百分之十。惜皆用土法開採，故產額極稀：福建為三千噸，廣東省三萬噸，廣西省一萬一千五百噸，貴州省三百噸，雲南省一千五百噸，合計僅為四萬六千三百噸。

金——原產於中國的邊疆，雲南省的金沙江沿岸出產砂金，可是沒有大規模地開採。廣西省之奉議、永淳、興安、融

縣，廣東省之清遠、惠州、開建、海南島、福建省之建甌等縣，亦有金鑛區；雖已開採，而產額極微；廣西省金的年產額，可說僅為二千兩。

銀——銀在雲南省埋藏甚多。廣東廣西兩省有兩三個銀鑛區，目前正在開採中。廣西省的銀產額占全中國銀產額百分之三〇。

銅——雲南省自古為全中國第一銅產地。最近年產差不多是五百噸，占全中國百分之九五，以東川縣為最多。廣西省約有二十噸的產量。廣東廣西最近亦有一二銅山發見，惟未加以開採。

錫——華南為全國產錫最多者，雲南、廣西、廣東為其產地，雲南省之箇舊為全中國第一之產錫地，年產達七千五百噸，占全中國產額百分之九〇以上，其次為廣西省，年產為四百四十噸，其產地在賀江流域，已在開採者有十一個鑛山。此外廣東省之惠湯、五華、紫金、海南島，年產約有五十噸。此等地方所產之錫，大部分作成塊或錠而輸出。

鉛——雲南年產為二百噸，此外貴州、廣西、福建、廣東等處，亦有不少的鑛區。

鎢——鎢鑛在廣東省埋藏量有一四八，八五五噸。一九三四年出產一三二〇噸，僅次於江西省（四，四八〇噸），占全國產額六，三〇五噸之百分之二〇（全世界產額為一萬四千噸）。此外廣西省亦有三個鑛區，正在開採中。

銻——銻亦為華南特色的金屬鑛物之一，產額冠全球。其主要產地為湖南省，而華南之廣東、廣西出產亦頗多。廣東省之乳源、樂昌、曲江、梅縣等鑛區，年產四百噸。此外廣西亦有銻鑛。

錳——錳在廣西廣東很多，廣西省之錳鑛區，大半在潯江、柳江流域，年產約四萬九千噸。廣東省有惠來等十二個鑛區，年產一萬六千噸。兩省合計為六萬五千噸，占全國百分之七〇。錳之埋藏量，廣西省為六百萬噸，廣東省為一千二

百萬噸，將來大有發展希望。

此外尚有汞、鉛、鋅、油母頁岩、明礬、硫黃、大理石等礦物資源，惜生產不多。又雲南省由鹽泉製鹽，年產約有五十三萬石。

## 五 製造工業

華南之主要工業，首推紡織業，廣東以珠江三角洲為中心，自古即盛行絹織物工業。在廣州市有近代式之紡織工廠一所。又廣西省之梧州及其他各處也有紡織業工廠。此外廣州市有近代式的三合土（水泥）工廠兩所；玻璃工廠在廣東、福建、雲南三省都有，但皆屬小規模。廣東省南海縣，從明代起就是有名的製陶器地方，年產達二百萬元。福建省之德川、寧德、同安等亦以陶器出名，輸出額曾達二百萬元，但現在已遠遜往者。

火柴製造業，始於廣東。廣東各地現有工廠五十所以上，占全中國火柴工廠數三分之一。華南火柴業之勃興，可以說是由於瑞典火柴業的沒落。

因為原料皮多的緣故，皮革工廠亦頗發達。工廠數計：廣東三、福建二、廣西一、貴州一、雲南五；此外生皮輸出為數亦極可觀。

廣東全省，橡皮工廠和石油精製工廠很多，不過都是小規模的；電燈廠之電力在一萬瓩以上者僅廣州市一所，餘皆一千瓩以下者。

新式之製紙工廠，廣東省有兩所，福建省有三所。其餘皆係手工業製作。廣東省之潮梅、佛山兩縣為全國第一製紙地，從事製紙業者計有四千七百人，職工一萬九千人，生產額年近二千萬担。福建省之閩江流域，連城、龍巖、漳平、寧洋、泉

州等處手工業的製紙亦頗盛，曾有一時年產達五百萬元，所產者大部分係竹紙。

廣西省梧州，有年產二千噸的硫酸工廠一所，此為華南最珍貴者。廣東省之珠江下游和雷州半島，製造花筵和席頗盛其他如爆竹、傘、神香、籐竹等工場及製糖、製茶、製酒、製粉等工場亦頗多。

華南原係我國富庶之區，惟國人多不從事經營，以致受列強所覬覦，殊堪痛心。及至抗戰軍興後，華北華中，相繼淪陷，因之華南西北，已成為中華民族復興之策源地，華南有天然之資源，無限之寶藏，亦正是中國新興工業的基礎。既往未加開採經營者，政府現已竭力使之開發，其需要人力物力至巨，幸國人共同努力，藉冀早日實現，則國運前途實利賴焉。

## 「東亞協同體」批判

馮乃超

不久以前，日本法西斯主義者傳聲筒，向全世界放送出非常燦亮的一個新製的理想，據稱這次侵華戰爭的最終目的是「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安定的新秩序」所謂「暴支膺懲」以及「皇威發揚」已經悄悄地改頭換面變成「長期建設」。以日本「民族」為盟主的東亞諸民族的新秩序的建設，誠然對於日本國民是空前未有的偉大歷史使命，正因為這樣，作為「東亞新秩序」內容的「東亞協同體」這個理想，便不能不應時地急造出來。法西斯主義者的應聲蟲也獻出揚溢着無量感激的贊詞，認為這是「澈底雄渾的構圖」是「政府當局高遠而攸久的指示」而且證明這個偉大的東亞的思想，是從侵華戰爭的痛苦經驗中體驗出來的。起先日本法西斯主義把納粹的一民族全體主義，原樣拿來作侵華戰爭的最高指導理論，露骨地暴露出它的排他的大和民族主義，而在戰爭發展的過程中，經過「朝野」再三的反省，自然是因為參謀本部的最高政策碰了壁才恍然大悟，製造出以異民族連帶主義為基礎的東亞全體主義。誠如日本的「知識人」所說的一樣：「若干的參考多少的暗示，是應該向納粹主義表示謝意的。」大家都知道，納粹的「種族宣言」的真實政治觀念與意義，是日耳曼民族要指揮歐洲，還得要指揮世界。希特勒的瘋狂的種族主義（一民族全體主義）給他大日耳曼野心的理論以確實的內容。可是，這個理論和在希特勒出現之前久已存在的帝國主義政策一樣，只是一種陳舊的日耳曼的理想。那末，今天，在思想戰顯著地增加其重要性的中日戰爭的

新時期，揭開所謂從納粹主義得到靈感的，以異民族連帶主義為基礎的東亞全體主義——「東亞協同體」論的面紗，露出它的猙獰真面目，也許不是多餘的事吧。

在最近期間的現代文化生活史中，以極端的橫蠻態度仇視人類以往積蓄下來的一切文化產業的，除了西方的納粹黨人以外，就是東方的日本法西斯主義者暴徒。七八年來，在外來思想的名義之下，那已經成為日本革命工人農民解放思想的社會主義，受了極殘酷的摧殘，自由主義也變成危險思想，而備嘗無理的壓迫。年輕的進步的教授多變成了囚犯，年老持重的學者也被逐出了學園，最高學府的不幸事件層出不窮，日本國民現在連研究學問的自由也被剝奪了，日本法西斯主義者當局，已經從言論的統制進展到了文化的統制。文化人公開地被收買，秘密地被操縱，而官僚的「文化」與御用的「思想」，輔翼着警察的力量，把自愛的文化人都驅趕到窒息的環境裏面去。「解放知力」，「維持文化的獨立性與創造性」，成為他們無力的呼喊！在這種土壤上，真正為人類為民族設身處地地苦惱，感激，焦思的思想，是不會長育的，自由奔放的理想底開花也是不能夠想像的。

看來，所謂「東亞協同體」，是日本主義或日本精神，向東亞大陸的思想進攻。日本法西斯主義者早幾年已經復活了官製的日本精神——老實說只是封建時代的思想殘渣，拿來強迫其曾經一度受過資本主義文化洗禮的國民，把工錢制度下個人自由的奴隸，拖回到統治者強力意志之下同時作家奴——奉天皇為「皇祖」，而國民則為「家奴」。正如封建時代一樣，人們的心受着極度的限制，沒有選擇，禁止批評，據說「東亞協同體」下的日「滿」支，應該是立體的關係，而不是平面的關係；又說應該是家長制，日本為家長，「滿」支為子弟。這種與歷史時代逆行的思想與主義，不但為日本的有國民意識的國民所不能接受，對於受過數次革命洗禮，而今天並且手拿武器，為偉大的民族解放的理想底實現而流血的中國民族，更是無緣的。「東亞協同體」的理想，不消說也有強迫淪陷區域的中國民衆的

慾念，然而，正如東北民衆已經領略够了所謂日本謀利者，浪人，冒險家的「王道樂土」一樣，其他區域今天處在日軍刺刀下的中國民衆，也都知道了日本軍要求些什麼，而給些什麼了。那些隨軍收買日兵掠奪品的小商人，在所謂「佔領區」內把製毒機關普遍建立起來的毒販，無孔不入的小走私販，以及在各處銷售日貨，以廉價強迫買賣中國物產的小公司，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政策的觸角，也是「東亞協同體」這個思想最標本的推銷員。這使受了「東亞協同體」是自我欺騙的日本某些知識人，認識了「日本人所愛談的思想，與中國人所希望的現實內容，常有很大的間隔。」其實這不是普通的間隔，而是天南地北的距離，陰陽的兩極。正因為這樣，淪陷區域的民衆，才堅決地否認亡國奴的命運，拒絕一切的欺騙，而形成廣大游擊戰的洪流。作為「新秩序」理想的「東亞協同體」，因此，只是代表着帝國主義的慾念，既無深刻的社會性也無高遠的思想性的一種急造的思想而已。站在征服與被征服，剝削與被剝削的帝國主義社會經濟的體制之上，對立鬥爭已經採取了兩民族血腥的戰爭形態面前，在這個時候，拿什麼東洋特有的「綜合的關聯性」或「有無相通的連帶融合」來遮蓋帝國主義的面目的人，不論他們自己願意不願意，都變成法西斯主義的傳聲筒。日本的軍政當局忌諱着「戰爭」這個名詞，始終稱這次大戰為「事變」，然而，戰爭始終是戰爭；同樣，日本的論客矢口否認征服與被征服，剝削與被剝削，認為這是西洋的原理，不適用於東亞大陸，可是大陸政策却始終還是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要之，日本法西斯主義者，在要求為他們的刺刀所犯的罪惡與過失，創造一個足以眩人耳目的崇高理想，這是真確的事實。然而，在這個意義上，「東亞協同體」只是一個空洞無物的名詞而已。

正如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不是法西斯主義者一樣地明顯，日本法西斯主義者所唱導「東亞協同體」的理想，顯然不是真正結合東亞諸民族的「和平鄉」的理想。既不是要把今日正在呻吟、苦惱、互相廝殺、互相仇視的東方諸民族從血淋淋的現實超脫出來的理想，也不是可以離開刺刀也能令人自動地予以協力的信念的「東亞協同體」，反



轉來明顯地象徵着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大欲。日本的哲學家這麼說：「如是主觀的信念，就不能限於某一特定的一國或一民族，其他的民族或國家也得有同樣的信念。」然而，這一新製的理想，要成功爲日本一個民族全體的理想，事實上已經是不可能的。他進一步說：「說是信念聽來很漂亮，但它的背後是意慾。如果是意慾和意慾……的角逐，今日的民族就要回到往昔的種族與種族的鬥爭。誰也不能這麼想，『豺狼當路』這種野蠻能夠存在於現在的民族或國民裏面。」然而，我們不願意對「現在的民族或國民」一律加以過高的評價，特別是本來國民訓練不足的日本國民，近幾年來在軍需工業擴張計劃之下，勞動大眾的文化程度和體力情況，已經繼續低落，一般人民早已經在言論統制之下，蔽塞了耳目，加上軍部法西斯主義者「軍事勝利」的欺騙宣傳，一時也有使日本人民因「勝利」而頭昏，因種族的驕傲而目空一切，完全喪失了均衡的感覺的事實。所謂現代的國民和他們往昔的奴隸的祖先，實在還有許多相彷彿的地方。何況在極端殘酷極端週密的警察力量之下，日本國民已經變成十分「忠順」呢！

那末，內蘊在「東亞協同體」這個新造的概念裏面的帝國主義的大欲的容貌是怎樣的呢？

「東亞協同體」亦有稱之爲東亞諸民族的「命運協同體」的，換言之，日本法西斯主義者正在勾結德義西方的二大強盜，進行世界及勢力範圍的重新分割的計劃，世界大戰已經在國家與人民不知不識之間走上了軌道，因此把日本國民大眾和朝鮮台灣等殖民地民衆，以及中國的整個民族，在所謂「互助連環的關係」這一條鎖鍊之下，連鎖起來，共同負擔這些軍事冒險家在世界大戰中的一切消耗。「東亞協同體」因此，我們可以看得到是東亞各民族（日本國民在內）在法西斯魔王統治下呻吟痛苦的「命運協同體」在「協同」法西斯主義者推行人類大屠殺的戰爭這意義上，又可以稱之爲「負擔協同體」。這才是實踐形態的「東亞協同體」。

日本一部分的文化人也未嘗不知道這個「東亞協同體」作爲現實問題已經碰到些什麼困難，於是二三論者

主張在內部對於原形畢露的帝國主義的要求（——大欲）加以抑壓，認為過分愛好鐵與煤的「資源追求主義」對於這個「東亞協同體」的理想，是大有妨礙的。然而，這只是作繭自縛的想法而已。對於本來就是為滿足帝國主義大欲而進行的戰爭，主張抑壓其帝國主義的要求，何異於主張肉食獸不得喝血！不過這可以得到另一方面的反證。「東亞協同體」作為新的理論，出現於中日戰爭的新時期，那不是偶然的。由於中國民族全體的堅決抗戰，已使敵國的資源追求主義，乃至以此為核心的經濟集團論，因碰到開發資金問題，治安問題和長期繼續戰爭所引起敵國內經濟餘裕問題，變成昨夜的美夢了。在這兒也有「東亞協同體」應運而生的根據。

「東亞協同體」在敵國內部思想鬥爭的領域裏，發生怎樣的作用呢？

日本資本主義現狀維持派對於「東亞協同體」的理想，的確是沒有擁護的理由的。因此，在那兒，「東亞協同體」就以「理想」代替「資源」和「利潤」，強行滲透於資本家們。換言之，也許可以這麼說——戰爭沒有辦法早日完結，以前的算盤是以前的算盤，今天我們發見了「偉大的思想」，你們也得「時局協力，減私奉公」啊！

在準戰爭時期，日本的軍事費用，對於其他事業費的比率為九〇%，對於國民收入的比率是八·五%。但是中日戰爭以後，去年的預算中表示着，直接軍事費對於其他事業費的比率，竟增至三一三·三%。對於國民收入預定額的比率為三八·一%（實際上現在當然已經超過這個數字）。在這種情況之下，日本的國民生活是不能不受強力的壓迫。要從國民手裏強奪他們收入的半數，消耗於和他們的生活毫無關係的方面去，這不能不講究一種非常手段。自願的募捐也得有個名義，強行徵稅，濫發公債，縮小其日常生活的用品，是不能不有一個法寶來強迫國民全體下個大決心的。當日本國民已經痛切感到強行的戰時體制，如猛火撲身般向自己身上撲來的時候，雖說是「忠順·不過的國民」，但疑惑的眼睛總得要睜開的。「東亞協同體」在這兒，因此，也有拿大砲代替黃油的納粹黨人的氣味。——給你們這

個偉大的東洋思想，少吃幾塊醃蘿蔔！誰說這樣的話，不能出自日本法西斯主義者之口呢？

的確，在中日戰爭的新時期，武力攻略已達武器所能發揮力量的最大限度，以後要拿什麼來作戰，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爲要使那些變成了異國疆場上的枉死鬼瞑目，並且要繼續徵召對戰爭完全失去興趣的壯丁赴前綫起見，把犧牲者奉祀爲「爲東亞永久和平而殉國的人柱」是必要的，爲要防止「國家的敵人」在「背後傷害」其軍隊及人民，一種「精神上的法毒面具，使民衆不爲那種看不見的、無氣味的、使精神煥散的毒素所侵襲」是必要的。要之，日本法西斯主義者謀自身的避免崩潰，必得要繼續戰爭，並擴大戰爭，因此，也必得要把民間的物力、財力、人力都强行統制於強力政治的號召之下，「東亞協同體」正好是一種空洞漠然的理想主義，也是一種新製的強烈嗎啡針。這就是「東亞協同體」這個「最高政治理想」對於日本國民的真實使命。

「東亞協同體」對於我們中國民族，並不停留在分化我們抗戰力量的一件政治陰謀的範圍內，不消說那些民族抗戰失敗主義者，可以從這個急就的欺騙觀念，尋求「思想」的源泉，那些破廉寡恥的漢奸，未嘗不可以拿此來作遮羞的布片。誠如蔣委員長所說：「我們若精神受其威脅，意志爲所動搖，自甘屈服，急求妥協，那就是敵人的大欲。」我們應該「就要立定決心，不撓不屈，也就是說我們的精神絕對不要被敵人所脅制。我們更絕對不能受敵人的欺騙。」他更進一步以偉大革命的言詞指出「東亞協同體」的欺騙：「大家要注意他所謂『新生中國』是要消滅獨立的中國，另外產生一個奴隸的中國，世世受其支配。」「東亞協同體」只是帝國主義政策的花樣翻新而已，中國民族是完全能够理解和接受其領袖這種強有力的啓蒙的理論的。

中國拿着「低度的經濟力，不完全的政治體制，和劣勢武裝的軍隊」居然繼續了一年半以上的長期的抗戰，而且今天以後還要繼續下去，全世界人士自然是驚奇，而日本法西斯軍閥更是周章狼狽。這個謎現在已經被日本法西

斯主義者猜着了，這就是「民族問題」的秘密。今天成爲中國民族抗戰的主動力量的政治軸心是民族解放戰爭的抗日統一戰綫，全中國民族現在不分階級，不論黨派，成千成萬地羣集到這一條戰綫上來，經濟的弱點正在迅速地被補救了，政治制度大踏步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去，劣勢的軍備因新戰術的大膽的改變而加強了，贖下來的一個固有於民族解放戰爭內的革命精神與民族意識更因戰爭的發展而益昂揚。出乎日本法西斯軍部意料之外，他們發動的侵略戰爭却給了這個苦難的民族以前史所未有的自力更生的好機會，向來擺在她要现代化的道路上的許多障礙，因此得以掃蕩，一個具體的思想，因此得以更加發揚光大。爲什麼敵國本屆議會竟把三民主義當作一個重大題目來討論，這反證着三民主義在抗戰中盡了怎樣重大的責任。三民主義是在中國具體歷史時期和社會環境中產生出來的一個近代偉大的民族思想。這個偉大的思想，今天並不死藏在演講集裏，或只掛在領導者的口頭上，在中國民族艱苦的解放戰爭中，它已經融化成民族的血和肉，而變作抗戰的思想。三民主義的思想絕對不是像日本主義之類那樣狹隘的排他的民族思想，它一面承繼着中華民族的祖先所發展過的智慧，另一方面，則大膽的攝取人類在近代史中所發見的各種革命思想。日本法西斯主義者的堅甲利兵，已經碰到了這道自然科學所不能處理的，我們最堅牢的防綫了。儘管是迷信武力的日本法西斯蒂軍人，也知道所謂近代的戰爭，除了武力戰以外還有統括於和平戰裏的思想戰。作爲「東亞新秩序」內容的「東亞協同體」就在法西斯軍人的指揮刀之下，——能不能够姑且不問，——將要寫成一部作爲基礎理論體系的論理學，來補救自己劣勢的精神武裝。

日本的一位哲學家，對於以「東亞協同體」爲核心的這部「論理學」的能不能寫得出來，似乎在表示疑問。可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既然是靠小銃與書籍完成的，那末，我想，像希特勒那本「我的奮鬥」似的論理學，要在日本模造並不是不可能的，橫豎有憲兵和警察的全體系來服務推銷。但是，這本論理學是不應該談論什麼「道義性」

或「德性」之類的問題的。孟德斯鳩說：「我在共和政治稱爲德性（Vertu）者，是祖國愛與平等愛」的時候，那是因爲當時法國人民所爭求實現的共和政治的本身，天然內含着這樣的性質。但是，正如民族解放戰爭天然具備着自由平等的德性一樣，作爲進行人類大屠殺的指導理論的「東亞協同體」的德性，絕對不能夠是「純情如鴿」却只是「兇狠如狼」的，像納粹主義那樣乾脆，屠殺文化，反對理性，克服知識，我想一部和製的「我的奮鬥」的論理學，是可以寫得出來的。

但是，我相信「東亞協同體」在另外一個意義上，可能由日本人、中國人或朝鮮人寫成另一本論理學的。要是日本人來寫，那就不是今天囂張叫號的法西斯主義者的應聲蟲，而是那些忍氣吞聲，把怨恨蘊蓄在心頭，處於奴隸地位的醒覺的日本人民。他們是能夠真正爲日本民族的命運而悲而喜而苦惱，同時，從帝國主義的社會秩序所造成的民族偏見解放出來，用真正的連帶心來理解受着蹂躪的朝鮮、台灣的民衆，並且以滿腔的熱誠理解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將帶來光明給東亞諸民族的。「壓迫別個民族的民族，自己是不能自由的。」建立一個東亞諸民族的真正和平鄉，它的前提是需要東亞各民族都是自由的。今天的現實問題是中國抗戰的勝利，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與革命，朝鮮、台灣民衆的解放運動。事實上，我們被侵略被壓迫的民族和國民，正在用我們的鮮血來寫着一部從根本建設東亞永久和平秩序的論理學。這是剷除不合理的垂死的舊社會秩序，肅清那製造人類黑暗，愚昧罪惡的根源的論理學。這部論理學寫得出來的可能性，也正在醒覺了的中國、日本、朝鮮各民族在政治上爲擺脫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及剝削而鬥爭這個連帶關係之上。這樣的論理學，正是日本法西斯主義者認爲是西洋的原理而要加以迫害的。

抗戰的新時期已經到來，民族解放戰爭本來的革命性質，已日趨明顯，以中國民族的抗戰爲軸心，聯合與此有切身關係的同盟者——日本、朝鮮、台灣的人民，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這應該是目前抗日戰爭中，一個不可輕視的

重大的政略問題。不是中國人和日本人的民族戰爭，而是中國、日本、朝鮮、台灣的民族與人民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的戰爭，這次中日戰爭的這一個特性，也日趨明顯，然而我們的輿論界，對於這個問題積極性，今天尚嫌趕不上抗戰的客觀需要。讓我在這兒談談具體的事實問題。在抗戰中，儘管日本的法西斯主義軍人，拚命宣傳中國方面虐殺俘虜，然而，我們却實實在在為那些日本不幸的士兵，建立了許多使他們過着自由幸福生活的和平村。把和平代替所謂俘虜收容所的心理的準備，是值得我們贊揚的，因為和平村的建立精神，在這一點上，和設立俘虜收容所的舊有人道主義的觀點，有了顯著的差別。這不消說是在民族解放戰爭中自然生長的進步的建設，然而，和平村充分的發揮了我們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的連帶精神沒有呢？這一點在今天看來是十分不夠的。和平，今天是不能不以戰爭來實現了。經過了民族偏見的克服，法西斯主義欺騙宣傳病菌的消毒以後，和平村的居民應該變成為實現東亞永久和平而鬥爭的戰士的。他們應該和我們同樣站在戰綫上，與共同的敵人作鬥爭。他們和我們應該在鬥爭當中，加強相互的理解，相互的連帶性。我們中國民族的這方面，也同樣應該貫徹東方各民族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一戰鬥的連帶精神。為什麼說，把敵對宣傳工作應該做到使它變成一個羣衆運動呢？那因為如果我們的士兵及民衆，在今天，還不知道或者不願意握拿那些渴望着逃出法西斯蒂軍人的壓迫而參加我們的戰綫的日本士兵所伸出的手，或者對於那些因侵略戰的退化性而變成瘋狂的日本士兵不知道憐憫與寬恕，那就等於拒絕了我們的同盟者，等於無視中、日、韓、台的反日聯合戰綫。今天我們是不應該再看見這種狀態的存在的，關於這個問題的啓蒙工作，深願得到各方面深刻的注意。現在，一方面是朝鮮、台灣的義勇隊及參加我們戰綫的個別的日兵，正在前綫活躍，而各地日兵均有組織轉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日本法西斯主義者拚命挑撥民族間的偏狹感情，並以戰爭製造中日兩民族間的深仇大恨。這時候，發揮東亞諸民族革命的共同奮鬥的連帶精神，消除舊社會制度留給我們東亞各民族的民族偏見，尤其是糾正日

本法西斯主義者以欺騙宣傳及戰爭所造成的中日兩民族間仇恨的錯覺，這應該是一件加在我們肩上的重大的啓蒙工作。

只有我們才能够站在這個現實的地盤上，創造一部以自由平等爲原則，以偉大的人類愛情爲基礎的，和日本法西斯主義者的要求完全相反的，戰鬥的「東亞協同體」的論理學！

# 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的筆記

張華生譯

——譯自列寧哲學筆記——

## 蒲蒲諾夫的序言

在列寧遺稿集（主要是哲學筆錄）十二卷上載着列寧從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一書的拔萃，這顯然表明列寧在帝國主義戰爭時代因哲學上的研究而聯帶研究了克勞塞維茲。

在一八五八年一月七日的通信中，恩格斯對馬克思這樣寫道：『我現在選讀其中的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實是獨特的哲學的思索方法，本質上非常之好』（馬恩書信集）。在克勞塞維茲的著作之中，最引起列寧的注意的，就是這『獨特的哲學的思索方法』。而此種貫澈辯證法的『方法』，列寧自己也已注意到了，他在一九一五年曾指出，克勞塞維茲的思想，『由黑格爾而充實豐富』（列寧全集，十三卷，第一版，一四五頁）。

可是列寧的研究克勞塞維茲（恐怕在一九一五年）我們又可斷言是與他當時所進行的非常的大事業有關聯的。這種事業，必須充分理解戰爭的本質，戰爭與政治的關係等。

克勞塞維茲的研究，在一九一五年的列寧的著作中直接引用着。在社會主義與戰爭（一九一五年八月作）這本小冊子中，列寧引用克勞塞維茲的『戰爭是政治以其他的（即強力的）手段的繼續』的話，當作第一章上的副



題之一；並且附加如下的話道：『這句有名的金玉之言，是關於戰爭問題造詣最深的著作家之一的克勞塞維茲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者視此命題為關於一切戰爭意義之見解的理論基礎是正確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常用這種觀點觀察各種的戰爭。』

也是一九一五年，列寧又在第二國際的崩潰（一九一五年夏作）這論文中，兩次援用克勞塞維茲的話來暴露『社會排外主義的基本理論』，在腳註上，揭載戰爭論第六章的引用文。這引用文殆一字不易的載在以下列寧的拔萃錄中。

在他的全集十三卷（第一版）一一四頁上，列寧用如下的話來暴露『普列哈諾夫的粗魯的排外主義』真面目，——『普列哈諾夫為要取得資產階級的歡心，竟至這樣無恥的歪曲了辯證法的根本命題，這命題適用於戰爭之時，即為「戰爭不外是以其他的（即強力的）手段的政治的繼續。」』

以後在同卷的一四五頁上，他要暴露『考茨基的更洗練而圓滑的排外主義』這樣寫道：『考茨基的議論，如仔細研究其理論的前提時，我們會看到約在八十年前已被克勞塞維茲所嘲笑過的同樣的見解吧。』

列寧之所以非常看重克勞塞維茲的著作，這不外由於他的思想，『由黑格爾而充實豐富，』梭林在其登在一九二三年的真理報第一號上的馬克思主義·戰術·列寧的論文中，引用他親自聽到的列寧的如下的話，——『政治上的戰術與軍事上的戰術，用德語說來，就是「接壤地域。」黨的活動家研究克勞塞維茲（德國偉大的軍事理論家）的著作，其所得定是很多吧。』

列寧在和『左傾』共產主義者論爭中觸及防禦問題時，也援用了克勞塞維茲『如要認真的講究國防——列寧寫道——必須澈底準備，並且嚴密測定力的相互關係。如預知力量不足時，向國內退兵，乃是最重要的防禦手段（

如有視此僅爲適用於特定場合的公式的人，最好請一讀最偉大的軍事著作家之一的老克勞塞維茲的著作中，關於防禦的歷史教訓的結論。但在「左傾共產主義者」之中，竟至稍稍理解力之相互關係這問題的意義的人也沒有。」（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一版，二六一頁。）

列寧的從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所作的拔萃，不是克勞塞維茲這三卷著作的單純的梗概——它極明白的反映出關於戰爭與其他各問題相關的列寧自己的思想的方向。拔萃的大部分，是關於戰爭的本質問題，以及爲「以其他手段的政治的繼續」的戰爭問題。第六章（第三卷）的標題，列寧摘要地寫作——「戰爭是政治的工具」而在空白上注道：「最主要的一章。」這一章，他差不多把全部摘錄在他的筆記上。

列寧關於戰爭的性質隨歷史時代之不同而起變化之事，也有許多的摘錄。引起他的注意的，是如戰爭的社會現象的種種方面。列寧從克勞塞維茲的關於攻擊與防禦的可驚嘆的論究中——克勞塞維茲在論述上貫徹着辯證法——也有不少的摘錄。一種摘錄是關於參謀本部的問題的。此外還有關於騎兵中隊、步兵大隊以及砲兵中隊的價值的，即特別具有軍事性質的摘錄，不過列寧在其空白上寫着——「然今日則如何？」——以促注意。關於主要是軍事性質的各章，列寧差不多沒有什麼摘錄。例如第一卷上只從第三篇第五章「軍隊的武德」及第六章「胆力」摘錄一些。對於第五篇，也是一樣。

筆記的分量，從第一卷到第三卷漸次增多，第三卷的分量最多。這成於列寧之手的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的梗概，其所具的極大意義，在於列寧集中其注意之中心於克氏關於戰爭與政治之關係的學說，以及克氏對於爲社會現象之戰爭的種種方面種種問題的適用辯證法之點。因此，這包含從克勞塞維茲著作的拔萃，以及列寧關於這拔萃的各種備忘及注意的列寧的筆記，在從列寧主義的見地來研究戰爭諸問題上，是有着絕大的意義吧。

(以下爲筆記的本文)

## 克勞塞維茲的履歷

德意志人名大辭典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第四卷)——克勞塞維茲 (Clausewitz, Karl 1780-1831) 『克勞塞維茲於戰後(即一八〇六年普法戰後)數年間,在柏林聽基瑟韋特教授 (Prof. Keiserwetter 1766-1819 康德主義者) 講授哲學,以極大的興趣研究他的功課。基瑟韋特的辯證法的痕跡,在克勞塞維茲的純理論的著作中以及在他展開思想的方法中,都可以看出來』(二八六頁)。

## 關於戰爭及用兵的克勞塞維茲將軍的遺稿

戰爭論 第一卷 (柏林,一八三二年)

前一九頁……『戰爭不外政治以其他手段的繼續。』

二八頁(第二十四節——第一章『什麼叫做戰爭』——第一篇『論戰爭的本質』——) 『第二十四節,戰爭不外政治以其他手段的繼續。』

『由此,我們知道,戰爭不但是政治的行爲,實在又是政治的工具,政治關係的繼續,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實行。如說戰爭自有其特質,那也不外關於其手段的特質而已。要求政治的方向及意圖不和這戰爭手段相矛盾,這一般是軍事學的權利;在個別的場合,也是將帥的權利。此種要求,關係重大,決不可忽視,可是不管它在個別場合。對於政治意圖的影響如何重大,而其影響也只能看做政治意圖的修正。因

從主觀的東  
西區別（分  
離）客觀的  
東西的原理

爲政治的意圖是目的，戰爭不過是手段，而無目的的手段，到底是不可想像的』（第二十四節全文）。

二九頁……『爲避免讀者的誤解起見，必須指出：這裏所謂的戰爭之自然傾向，單指哲學的——正確說，指理論的——傾向，而不是指實際上互相衝突的各種力的傾向；所以不能把它解做例如鬥爭者的精神力及痛苦之意。』

〔在這之前，克勞塞維茲寫道——『戰爭的動因愈強烈，它所把握住的國民的全生存（Das ganze Dasein）的範圍愈大』（二八頁）——『戰爭的目標與政治的目的愈相一致，』『戰爭愈像戰爭，而愈不像政治。』戰爭的動機及『緊張』愈弱，——『戰爭要素的自然方向，即暴力，便愈少和政治所指定的路線一致，因而戰爭自其自然的方向脫逸出去，政治的目的，愈和觀念的戰爭之目標分開，戰爭愈益政治化』（二六頁——二九頁）（本段的旁點係列寧所加）。

這是值得注意的，假象還不是現實。戰爭愈是政治的，則看來愈『戰爭化』——政治的成分愈少，則看來愈『政治化』。

……『現在言歸本傳，某種戰爭，政治似乎完全消滅了，另一種戰爭，則政治色彩極明確的表現出來；然而我們仍可把第一種戰爭認爲也與第二種戰爭同程度的是政治的』（二九頁）。

（第二十七節，三〇頁）

一 『由此我們知道：第一，在任何情境之下，我們不可把戰爭當做獨立的东西，而應認爲一種政治的

注意 二 手段。只有站在這樣的觀點上，才不會和一切的戰爭史相矛盾。只有站在這樣的觀點上，才能對於浩瀚

注意 三 的著作（關於戰爭的——譯者）把握住理性的理解。第二，惟有此種理解，才能說明戰爭因其所引起

的動因及事件的性質而異其種類』（三〇頁）

『所以戰爭不但恰如避役（Chameleon 蜥蜴的一種，能依四周情形而自由變換體色，所以也稱變色龍——譯者）一樣——因它依各個具體的情形之不同而或多或少地變化其性質——而且在一般的形態上，自其中所支配的傾向看來，又構成奇妙的三位一體。即戰爭乃由其本來要素的暴力、憎恨及敵愾心（這些要素可以看做盲目的、自然的衝動）與蓋然及偶然的遊戲（這使戰爭成為自由的精神活動）及其為政治手段的從屬性（戰爭因此完全從屬於悟性）三者所構成的。

『這三方面中的第一方面，多關於國民的；第二方面，多關於將帥及其軍隊的；第三方面，則多關於政府的。』（三一頁）

注意！

這真是關於戰爭之政治的靈魂、本質、內容及『國民的』外貌的確當的話！

『戰爭的目的和手段』（第一卷，第二章）——為什麼要擊潰戰鬥力并佔領國土呢？這為的要使敵人喪氣屈膝，同意簽訂和約。

……『和約一經簽訂，則一直潛燃着的多數人的感情的火花熄滅了，同仇敵愾的緊張空氣緩和了；因為任何國民之中，又在任何的情形之下，願望和平的人總是不少的，而所有這些人全都從戰線退却了』（三三——三四頁）……

注意

的確如此！

『鬥爭原是敵對感情的表現。的確的，在我們稱為戰爭的大鬥爭中，敵對感情成為單純的敵對意志，至少在各個人間，普通總不見有對於單獨個別的敵人的憎恨之情。然而如無此種感情，是決不會鬥爭的。即是今日的戰爭，也大抵（只是『大抵』麼？——列寧）總有國民的感情，隨之而起，多少以代替

着個人與個人間的個人的敵對關係。但即使這種憎恨也沒有，最初什麼氣憤的感情也沒有的時候，敵對感情也會在鬥爭自身的過程中引燃起來的。暴力，即使它是什麼人基於上級的指揮而加於我們的，在我們還沒有對那命令加暴力於我們的上級權力發生逆襲的感情以前，我們之中亦已會燃起對暴力復仇之念了。這說是人性的也好，說是獸性的也好，總之，這是事實』（一二二頁。）

……國民的憎恨——在一切戰爭中都有……一四三頁。

『戰爭是一種人間交通的行爲』

因此我們說，戰爭不屬於術和學的領域，而屬於社會生活的領域。戰爭是大利害的衝突，這衝突要用流血來解決。只有這一點，纔是戰爭與其他種種社會衝突不同的地方。在技術之中，找求比較近於戰爭的，要算是商業吧。商業同樣也是人們的利害及活動的衝突。很遠地，近於戰爭的是政治。所以政治又可看做一種更大規模的商業。不但如此，政治還是戰爭在其胎內所發展的母體。猶如生物的屬性已含在它的胚種之中一樣，戰爭的外貌，也已在政治之中隱隱地形成了』（一四三頁。）

注意

一八四頁……『謝恩霍爾斯將軍（Scharnhorst, 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1755-1813,

普魯士兵制改革者——譯者）在其『必攜』中論述關於真正的（傍點由列寧所加）戰爭，比誰都透澈』（一八四頁。）

順便  
提到：

在第三篇——戰略概論，第五章『軍隊的武德（德操）』中，克勞塞維茲有如下的話——

『在同一個人之中完全發達着市民的與軍人的二種性質，戰爭則全取其國民的性質，這我們可以想見恰與從前意大利的傭兵向反對方向發達的情形。可是話雖如此說，用兵的職業的特性，到底是不能廢除的。唯其如此，用兵的人，他們在用兵的範圍之內，乃可把自己這些人看做一種團體。而戰爭的精神即固定在這團體的秩序、法則及習慣之中。事實上也是如此。所以如過於想由最高的見地觀察軍隊，因而輕視此種多少為軍隊所具有，也不能不具有的特殊的團體精神（Esprit de corps），實是大大的錯誤』（二一六頁）……

同卷第三篇第六章『胆力』

慎與重  
胆與怯

『用意周到的人們，其中大多數都是由於胆怯而成的』……（二二二頁）……

『雖是蠻幹的胆力，即無目標的胆力，也不可輕視它。此種胆力與真正的胆力在根本上，同是感情上的力，所不同的，只是它不由理性所指示，而成為一種激越之情吧了。蠻幹的胆力，只在拒絕服從的時候，是有害的』……（二二二頁）

『用兵者如以同等的知識臨戰之時，其優柔不斷所引起的弊害，也遠比有胆力所引起的弊害為大。這是用不到證明，我們的諍者也會立即首肯的吧』……（二二三頁）

『感情的力即使由明瞭的思想表現出來，或隱忍沉着而存在之時，其力的大半就被奪去。所以地位愈高，有胆力者愈少。假如說洞察力及智力並不隨地位的上升而上升，那麼對於要行種種部署的指揮官，在客觀的事實情勢，以及商酌過多而且迫着要他們解決的結果，他們對此到底不堪勝任的。而他們對於此等事情愈乏獨立判斷的能力，則他們愈難勝任』……（二二三頁）

注意

……將帥的地位愈高，則睿智、智力及洞察力在其活動上愈有重大的任務。但與此同時，爲感情屬性之一的胆力則愈退怯，因此之故，在最高地位的人，胆力極小，唯其如此，胆力更值得吾人的嘆賞」（二二五頁）

第一卷完



# 資本論讀法

高 葑

世界青年評論上登有亞爾巴利研究資本論的文章，一月號登載的是爲正確了解資本論所必需的預備知識，原文很長，一時未能全譯，但有二段，一段是說明特維耶及考次基的通俗資本論的壞，一段是講辯證法的幾條法則的，却節譯在後邊，想起是讀者所願意知道吧？

對於把資本論通俗化，已經有過幾次企圖了，其中最熟知的有特維耶（G. Deville）及考次基（K. Kanarsky）的著作，前者是用法文寫的，後者是德文的。考次基的著作因爲譯本很多，幾乎全世界比資本論更廣泛的被閱讀。

特維耶與考次基的著作直到今日還被推舉爲資本論的導言。但我們決定警告讀者，不要讀它們。它們沒有把馬克思的教義正確地揭出來，事實上甚至把它們歪曲了，所以它們只有發生混亂。至於列寧，在給格拉那脫百科全書寫的馬克思教義的綱要裏，把三本資本論的一切主要思想，在差不多十面裏，就說明白。考次基的及特維耶的著作，有二百五十到三百五十面，甚至於第一冊資本論的基本思想也不能夠正確的表示出來。考次基正在做馬克思通俗化這工作的時候，恩格爾斯寫信給他說：

「你當能避免特維耶的錯誤。主要點是他把馬克思論綱當作絕對的，馬克思則以爲只有在某些條件之下

才真確，特維耶沒有把它指出來，分明是不真確的。」

這封信上寫的日子是一八八四年二月五日。七個月後，九月二十日，恩格爾斯對考次基指出，他沒有把握住馬克思的價值說。考次基雖然間或受恩格爾斯的幫助，但他的通俗化工作沒有比特維耶的好。有幾點甚至於更壞。他常常引用馬克思的話，接着就是他自己的庸俗的意見，因此引起全部的混亂。戰前奧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即熟知的V·亞特勒常說，他知道有一本考次基著作的良好解釋，就是資本論第一冊。

把這二種熟知的通俗化著作的主要缺點略加說明是有價值的。把這等缺點暴露出來，對於了解資本論上是一個好消息。

主要的錯誤有二重，特維耶和考次基都被馬克思的公式：二十碼麻紗——一件衣服，或——十磅茶葉，或——四十磅咖啡；商品——貨幣——商品，C——M——C等；商品的變化——貨幣的流通等；所弄昏。他們以為解釋這等公式是獨一無二的工作。於是他們落在受馬克思強烈指責的那班為最粗率的現象，假如這樣說，巧為解釋的庸俗經濟學者的錯誤裏，正如這等庸俗的經濟學者寫供給商業高等學校及大學校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使資產階級了解商業的普通現象一樣，考次基與特維耶也這樣做，寫下他們的書，以供無產階級採用。馬克思很尊重古典經濟學者，他們和庸俗的經濟學者相反，講述人們的活動和活力，但他在第一冊經濟學著作，即一八四七年寫的哲學的貧困裏，已經指出他們怎樣只把在某種關係下面如何生產解釋給我們：

「經濟學者們說明在上述的關係之下怎樣生產，但他們不曾說明這等關係是怎樣產生的，使它們產生的  
是歷史的運動。」

資本論的先驅者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版於一八五九年。馬克思給賴沙爾（Lassalle）的一封信裏說：他在那裏

第一次指出社會關係的實際的科學的情形，恩格爾斯在評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時，說明馬克思的經濟學不是在講事件，却在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後，歸到階級之間的關係；不過此等關係常常和事件相結合，作為事件表現出來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文中說明道：

「本著作的最後目的是把近代社會的運動之經濟定律明白指出來。」

然而特維耶和考次基只看到商品市場和勞動市場；他們只看到公式和圖式，他們努力去求解釋。

他們的第二個重要缺點是完全不顧到辯證法，這是「運動的一般定律的科學——外界和人的思想的。」（恩格爾斯）

先前馬克思寫的二冊小書，工錢勞動和資本，及價值價格及贏利，是常被推為資本論的最先的導言書。事實上，研究資本論以前，每個學者必須熟讀，但先得一些辯證法的基本觀念，即辯證法唯物論（正確地叫，可稱為馬克思的辯證法）也同樣重要。因為資本論是應用辯證法的最偉大的著作之一種。「即使馬克思不留下邏輯（赫智爾的主要著作）然而他留下了資本論的邏輯，在資本論裏，把辯證唯物論應用於學科（研究的分科）」列寧在「赫智爾的辯證法（邏輯）」裏寫着。（培爾納。一九一五年。）

然而特維耶和考次基的最大努力分明在清除辯證法，他們認為辯證法是了解資本論的障礙。

辯證法的知識實在是了解資本論的鑰匙。

辯證唯物論，在恩格爾斯的反杜林，自然辯證法及列寧的唯物論與經濟批判論和他的哲學筆記裏都講的極詳細。但是研究這等著作差不多需要研究資本論同樣的精力。我們不能簡單地對喜歡研究資本論的人說：你在企圖研究馬克思的主要著作以前，須先通曉這些科學的著作的

幸而並不需要這樣，有着若干著作，比較的容易懂，可以得到辯證法的各項基本概念。新近出版的聯共黨史有一篇辯證唯物論的優美的導論。馬克斯和恩格爾斯的著作裏，有幾段文章，對於自修的讀者並沒有什麼困難，可當作辯證唯物論的導論。關於這些，我們當先指出資本論第二版的跋。馬克思自己鄭重說明，那是用在資本論裏的辯證法的一個解說。恩格爾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的第二章，及費爾巴哈的第四章，給我們一個辯證法的基本概念的比較容易的說明。

要正確的了解資本論，一點辯證法的學習是不可缺少的。我們如要作一個辯證法研究的導言，就不得不對於辯證法略加說明。即它的本質的特點之一，在資本論第一章裏盡着重要的任務的有對立物的同一。

只知道「或者」(Either—Or) 是稱為健全的常識的。

假如我問自己，醋是酸的嗎？我可以確切回答說，是的，醋是酸的。酸是醋的顯著特性，或者我們再舉出一個應用否定回答的疑問：水是酸的嗎？我只能否定：不，水是不酸的。這種思惟的方法，煩瑣哲學叫做邏輯的思惟，聖經裏也是常用的。

在平常的日常生活裏，人們就常用這樣的推理方法。然而較深刻的想一下，馬上覺得這種思惟方法完全不夠。醋只有放在舌上才酸；放在鐵上，它有溶解的效力。至於飲料水，還有各種礦泉水；有許多地方，飲料水都從礦泉裏去取。所謂思惟的邏輯方法的基本是：他叫彼得或保羅，就終身是彼得或保羅。這是正確的嗎？人們當然會即刻回答：是的，然而，到底，這回答是不正確的。

迪慈更 (Dietzen) 的哲學的果實上說：「彼得和保羅雖然一生是這樣的二人，實際上却是每時每日在改變的，和他們二人相像，世界上的一切東西都沒有恒久的，都是十分善變的數量。數學的點，線，圓，只是理想的東

西。在事實上，各個點是延長的；每條直線，如拿放大鏡來看，是無數曲線的連接；最圓的圈，據數學家說，實際上是無數的直線。

「辯證法，第一段裏便告訴我們，怎樣同樣的物有一個又是許多的矛盾性質；怎樣一切物，各種過程和遭遇，沒有例外，並不是各種物，却像絲的各種色，雖然它本身仍為同樣的一個，然而在多變化的陰影裏，閃光是極多變化的。」

辯證法的特性，和聖經上常常被引用的話：是，否，否，是，直接相矛盾。

今日為是，（階級社會的統治階級，）明日會成為否，（被打倒，）今日為否的，（被壓迫階級，）明日會成為是（得到勝利。）

所謂常識，是把一切遭遇從現出的瞬間去觀察的，只從一方面去把握，並且認這一面的表現為永久的現象。在實際上，自然中，社會中及心理中的一切遭遇，有各種方面，並且是不絕運動的。

辯證法是此種運動的通律的科學。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的跋裏說：「辯證法雖在赫智爾手神秘化了，但綜合地，意識地，敘述辯證法一般運動形態的，仍須以他為第一人。」雖然馬克思並不單純地把赫智爾的辯證法拿過來應用，因為馬克思的辯證法不特和赫智爾的有別，而且簡直直接相反的，然而在資本論裏，關於價值論及在各節文字裏，馬克思採用赫智爾的表現方法的。所以我們說明資本論的辯證法時，可引用赫智爾的例，並且一部分應用他的表現形式的。

馬克思把赫智爾的「神聖公式」（Weihungsformel）在哲學的貧困裏說明如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用別的話來說，各種辯證的運動包括三階段：「正，反，合。」赫智爾在他的心理現象學的序上舉例如下：

「花開時，花蕾消滅了，我們可以說，花蕾被花所否定；同樣的，結下果實時，花也可解釋為植物生存上的虛幻形式了，因為果實代替了花而出現。此等階段不只是分化；他們是不兩立的相更替的。但是他們的固有本質不絕的活動性，使它們同時成爲一種有機統一體的各契機，它們不但並不互相矛盾，實互相需要；從全體的生命開始起，一切契機是同等的需要的。」

生命的表現是多樣性的。在發展的形式方面，在自然裏並不在社會裏完全相同，但各種發展都是辯證法的發展，並且馬克思的簡單的辯證法界說（在哲學的貧困裏）對於各種發展都可應用：

「構成辯證法運動的是對立的兩方面之共同存在，它們的鬥爭和它們轉化成新範疇。」  
我們相信這是對立物同一的解釋。

列寧的著作裏有若干條對立物同一的優良式子，例如下面的一則，我們從他的論文「論辯證法的問題」裏抄來的：

「對立物的同一（或者更確切的說，對立物的統一）意思是自然（包括心理及社會）的各種過程和一切現象裏的對立的傾向，互相排斥及矛盾的認識（發見）從它們的自己運動，自己發展，真實生活裏去了解一切世界過程的條件，是把它們作對立物統一看的知識。發展是對立物的『衝突』。」

列寧說明各種事情時都是這樣的，他不肯把別人的思想復述一遍便滿足，他必須使它變爲更豐富。他不單講辯證法的運動，他又說明自己運動，說明自然發展。列寧把這意思說明得極詳細。他在同一篇論文上說：

「自己運動，它的驅策力，來源，動機，還是不明白（或者把這力量變爲外力，就成爲神，主觀等等。）辯證唯物論者是集中注意在認識此種運動的來源上的。來源是對立物的互相衝突。」

所以運動的驅策力不是什麼神或神秘的力量，驅策力包含在事物裏，在過程自身裏，就是內部矛盾的衝突，——鬥爭。

列寧在同一篇論文裏，說明發展概念的各種不同。不懂辯證法的人把發展看作增減，反復。辯證法的唯物論者看作「發展是對立物的統一（即一物分析為互相排斥的对立物及互相關聯的東西）」

把握上述的話，在正確的了解資本論上是極其重要的。古典的經濟學者只看到不同，馬克思却指出尖銳矛盾的對立；古典的經濟學者只看到彼此有不同存在，馬克思指出它們的密切關聯，即對立物的統一。

古典經濟學者只知道一種生產統系，而且古今一樣的。他們認為原始的漁人或原始的獵戶是商品的生產者，當他們冬季貯藏起來時，也就是資本家了。充其量，他們認為只有程度上的不同罷了。他們的發展概念，完全和列寧所指出的非辯證的概念相當。他們認為只有增減，多少，但常在一個系統裏。馬克思却不然，他明顯地區別出各種不同的經濟系統。他說明：那系統逐步運動着終於變成爲新東西，變成爲對立物，量變了質。

這定律又是辯證法的一種特質。但是這條辯證法只在資本論的後幾章中有重大的任務（資本的界說，相對的剩餘價值的生產，合作，分工和製造業，機器和大工業。）這裏用不着細說。我們的主要目的是在把辯證法的發展簡單的說一說，對立物的同一，在資本論的前幾章裏有重要的任務。

# 城市陷落對民族經濟的影響

公論叢書第十輯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全書十二輯每月十五日出版一輯

定價每冊三角預定半年六輯

一元六角全年十二輯三元

編輯者 公論社

出版者 譯報圖書部

發行處 譯報管理處

愛多亞路一一七號

經售處 本埠各大書店